

书面题字：高 怀

廈門文史資料

(选辑)

第八辑



廈門文史資料

(选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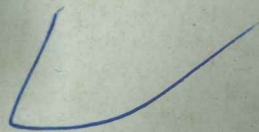
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厦门市

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厦门市郊区印刷厂承印

工本费：壹元伍角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
厦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厦门文史资料

(选辑)

(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厦门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五月

中央档案馆

(编数)

(编入卷)

目 录

- 厦门海堤史话……………张维兹 (1)
- 解放战争时期的反美风暴…………… (8)
- 忆厦大嘉庚阅览室的斗争…林文治 樊建平 陈炳章 (19)
- 一九四九年春季厦大学生救饥运动……………陈寿松 (24)
- 党领导的厦门大学学生的护校斗争……………樊建平 (29)
- 黄奕住先生生平事迹……………黄笃奕 张镇世 叶更新 (31)
- 忆巴宁……………曾冠英 (46)
- 回忆“时光社”……………吴雪痕 林纯仁 (52)
- “三点会”在同安马巷……………陈延庭 (56)
- 闽南佛学院之创设和经过……………觉 星 (60)
- 日伪时期的厦门基督教……………张子权 (67)
- 回忆日本侵略厦门的罪行……………廖昆维 (74)

日本的对岸政策和厦门的《新全闽日报》……林其泉(84)

厦门沦陷期间的鸦片和赌博……洪玲 叶更新(91)

厦门的角头流氓……默君(105)

“中兴轮”惨案纪实……许国仁(119)

第七辑更正……(127)

作者·编者……(128)

厦门海堤史话

张维兹

厦门海堤的建设

很多青年同志问我，厦门海堤是不是陈嘉庚先生投资兴建的，我告诉他们，不是。但陈先生起了很大的倡导作用。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一九四九年冬(或五〇年春)陈先生从新加坡回到厦门，梁灵光同志代表党和政府(当时任厦门市市长，后任市委书记)，几次去拜见陈先生，有一次回来对我讲(当时我任副市长)，陈先生建议在厦门的海峡修一条石头海堤把厦门、集美连接起来。陈先生说，英国人修了一条长石堤，把马来西亚与新加坡连结起来了。英国人能修成，为什么我们新中国不能呢？梁市长很赞成这个意见，他认为建海堤就地开山取石，还可解决很多人的就业问题。当时厦门被国民党封锁，失业严重，群众生活极为困难。我完全拥护陈、梁这一利军民的倡议。叶飞同志当时为抓军事工作，常驻厦门。当梁市长向他汇报后，他极为赞成，叶并找了一些学者技术人员讨论，都认为集、厦海峡是潮水从金门、鼓浪屿两个方向涌来的结合缝，退潮时也是两个方向退去，建堤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所以当一九五〇年秋，陈毅同志来厦门视察时听了汇报，立即表示完全采纳这个建议。后来知道，陈毅同志曾

三次上书毛主席，建议修建厦门海堤，且都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赞同和批示。

一九五二年七届三中全会前后，陈云同志主持中央财经工作，他把海堤作为国家预算外的基建投资拨了一千三百万元专款，由叶飞同志（书记兼省长）和梁灵光同志（副省长、工业厅长）组织领导这项工程。由我承担在厦门组织施工（我任市长），中央交通部建港局和省水利局派来大批干部，且由常驻这里的苏联专家沙士可夫指导这一工程。当然这期间也有同志持不同意见，如“在沙滩上建海堤是否有把握”啦，“筑堤还不如建桥”啦等等。嘉庚先生用大量事实对他们做了有力的说服。海堤施工中几经国民党飞机的扫射，死亡的干部、工人近一百五十余人（有一次工人回家过春节渡船被炸沉，就死了九十余人）。当时陈先生在重新建设厦门大学 and 集美学校，以实际行动鼓舞了海堤建设员工。

在初步设计完成以后，叶、梁要我向陈先生汇报，请他指导。陈先生认真听后，又看了图纸，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堤宽为二十一米（实际使用宽度只有十六米半），陈先生提议加宽为二十五米，要留有铁路线，而且应是双轨的，这样可以使铁路、公路都拓宽两米。第二条意见是在厦门一侧，铁路与公路应搞“立交”，以适应厦门形势的发展。这些意见我带回后，遭到苏联专家的坚决反对，他认为原设计的二十一米已经太宽了，坚持要改为十九米。去了胸墙和人行道，余下十四米半，公、铁路各七米，按设计规模足够了，至于“立交”设计专家说每天要通过两千辆车的地方才必要搞“立交”。当时厦门军民共拥有车不过几百辆，为什么要“立交”？后我带着这些意见，与专家一起向省委请示。是

时正值叶、梁去京开会，主持工作的曾镜冰、刘培善两同志，考虑到当时财政不足，同意了苏联专家十九米宽的意见。陈先生两条意见都未被采纳，我回去后未再向陈先生汇报，直到海堤做成了，陈先生才知道堤宽是十九米，极为生气！他一再批评我们没有远见。今天才看清楚，陈先生的意见“不幸而言中”了，造成今天要再拓宽或架高一层公路桥都极为困难的局面。实际上，这条堤共花了九百四十万元，如采纳陈先生意见，只要再多开支约二百五十万元，中央拨的专款已经足够了。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常以未听陈先生的话，以致给国家造成损失而感到内疚。

还有一件事，原设计这条海堤是未留航道的。在施工中，粟裕同志来厦视察，听了汇报后认为应在深水处留一航道，于军用和民用，都是需要的，尽管工程有难度，还是可以克服的，陈先生知道后，也竭力主张这样做。叶、梁两领导采纳了这个建议，技术上采用了沉箱法，做成了现在这条航道，证明是合理的。

杏林海堤和杏林湾围垦

在集美至厦门的海堤将竣工之际，中央批准了修建鹰厦铁路，铁道部选线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苏联专家到厦门，研究铁路如何从漳州入厦门的线路问题。原方案是漳州进厦门，而不是漳平。这回带来的方案是从角美向东北延伸，再沿杏林湾东岸向东南经集美进厦门。陈嘉庚先生知道这些情况后，要我去他住处。在我陈述了前面的初步意见后，陈先生认为不妥，他建议应从角美经灌口向东，修条杏林到集美海堤进入厦门。陈先生说：这条海堤应修成不透水的，它的经济效

益，一是铁路不用向东北去绕大圈，可缩短里程近二十公里，还可围垦四万亩良田。我带着这一意见与修海堤、修铁路的苏联专家共同研究，他们都认为陈先生的意见是行不通的。理由一是这条新堤是从一个方向来潮，冲击力大，不可能使用原海堤的修建经验；二是要不透水，就要使用钢板桩，这在钢材供应上和投资额上都是难以解决的，因此这一意见是不可取的。我又去陈先生处，说明技术上和钢板材料上有困难，陈先生反问我：“你读过《福建通志》没有？莆田有位钱四娘，修了木兰陂，形成了莆田的南北洋，你知道不知道？”我讲“知而不详”。陈先生讲：钱四娘是宋朝人，传说她是一位被遗弃的宫中妃子，回家后把带回来的全部资产来修木兰陂，后又得到一位孀妇的资助，修成后，她们二人也以身殉职了，共得良田四万亩，使这里成为全省有名的富庶之乡。陈先生又讲，一千年以前的宋朝两位女流用自己的财力把四万亩荒坡海滩变成良田，难道今天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以国家的财力还不能把杏林湾围起来？而且缩短二十公里的铁路里程，节煤节时间，长远看，它的利益都是不可估算的。听陈先生讲的，我真是愧怍交集，以后我也常以陈先生的话来勉励我自己和一道从事建设的人，克服困难，从事一些较大的建设工程。当时我回来向苏联专家讲了陈先生的意见，专家问我，修这条堤是陈先生拿钱还是国家拿钱，我讲自然是国家，专家说，这样，为什么听他的？我无言可答了。

以后王震同志为修鹰厦线到厦门，他已知道陈先生这个意见，亲自与一些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进行了反复研究，认为陈先生意见是有道理的、可行的。再后彭德怀同志又与王

震同志一起来厦门，同叶飞同志一起研讨，认为就节省时间一项来讲，于军用民用，都是划得来的，就这样确定铁路走杏林线。即以修原堤的人员和设备移修杏林堤，以四百万元的造价，由厦门市政府向铁道部承包，结果以三百万元修成了。这两条海堤，共节余四百余万元，经叶飞、梁灵光决定，拨作厦门发展轻工业和安置完工的海堤员工就业的企事业，对厦门五十年代的工业建设，是有力的推动。

应当说，杏林至集美海堤和杏林湾的围垦，完全是陈先生倡导建成的。这几年有人指出，杏林堤建成后影响纳潮量，造成港口的淤积，因而建议拆掉重建。我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纳潮量，但拆掉重建是不能苟同的，权衡利弊，这条堤绝不同于以后建的马銮、筭筳两堤，利是大大超过弊的，陈先生对这事功绩，是永远存在的。

铁路从永安经漳平到厦门而不经龙岩和漳州，也是从时间观念考虑的，是彭德怀、王震和叶飞同志一起确定的，陈先生知道后也是支持的。

在鹰厦铁路线要经杏林、集美两堤进入岛内市区方案定下之后，厦门市的终点车站和商业码头的布局就成为市政建设的重大课题了。铁路和建港专家们（都有苏联专家参加）和市的主管人员曾一起作了反复的研究比较，认为原来的太古码头（后改称和平码头）只能停泊三千吨的船，太小了，要搞万吨轮泊位，可供选择的地址有嵩屿和东渡。嵩屿的优点是水深，有一定设施，但风向不很好（冲向东北风），且跨海到市区，不如东渡。东渡的工程量大，但水深、避风，是理想的万吨级商业码头。确定后，则火车终点，应靠近码头为好，所以选在筭筳的北岸，东渡港的东南方。为了便于

车站与市区联系，又确定修一条筓筓海堤来联系市区（位置在现筓筓堤内约一公里处，即美仁宫至新感光厂之间）。

方案定下之后，叶飞同志到厦门。请他审定，他认为布局适宜，但为了近期的使用，车站先建在梧村为好，从梧村再引线穿过虎溪岩风景区，打一山洞到和平码头，虽有破坏风景区之弊，但可利用现有的码头，东渡则作远一步的规划，筓筓可以晚做。叶飞又指示：这些意见，要征求陈嘉庚先生的意见。

当这些方案向陈先生汇报之后，他对港、站及叶飞意见都表示同意，但对围筓筓港持反对意见，他狠狠地批评了我们。陈先生讲：你们要看得远一些，厦门通商后，港池太小便是个重要问题。筓筓港是港池重要组成部分，背山避风，将来船运发达后，那是台风季节重要的避风锚地，为什么要把它围起来呢？千万不能干这种蠢事！以后我们国力强大了，用机械加以疏浚，南北两岸可建很多码头。

我们尊重陈先生这些意见，又作了研究，为便于与车站码头联系，应把海堤建在梧村方位，即现在的堤内约四公里处，还可以扩大部分市区。还要说明的是，中央交通部建港局刘总工程师，始终是坚持不能修筓筓海堤，认为得不偿失，与陈先生的意见吻合。

“文革”期间，这一切规划都被打乱了。厦门市也要“以粮为纲”，把中山公园破坏了，改成蔬菜基地和“革命”广场。筑起了筓筓海堤，说是要把港内变成万亩的“大寨田”。东渡商业码头不要了，说对外通商是很遥远的事，是修正主义的设想，要建成万吨轮的渔业港，福建吃鱼就解决了。不但这样说，而且在有关领导人的支持下，也这样做

了，它的后果就是现在大家所看到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厦门公园恢复旧观了，东渡码头也在方毅、粟裕同志过问下，纠正了要建万吨渔港的错误决定。可是筓筓海堤则是“生米做成熟饭”。它大大缩小了厦门的港池，减少了港湾内的纳潮量而形成淤积，失去了一个很好的避风锚地，也阻塞了市区污水出口，使海堤内外臭气熏人。虽然有人说它也扩大了市区范围，但它的损失，将是永远难以补偿的了。假如陈先生九泉之下有知，定会更严厉地批评我们一些后人的愚蠢。

厦门的三条海堤（对马銮堤，知道不多，我讲不出什么来）——集美、杏林和筓筓，它们的功过得失，还有待人们评说。我只是把它们始末写出来，一方面是对陈先生在海港建设上高瞻远瞩的决策思想表示敬佩，另一方面是为了向今后从事海港建设的人们提供一点借鉴。

（原载《福建日报》一九八四年
十二月四日、十一日、十九日）

解放战争时期的反美风暴

一、解放战争期间美帝在厦门的侵略罪行

从厦门“光复”的第一天起，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触角就伸进了厦门。一九四五年八月，“劫收”厦门的第一批国民党军队，就是“中美合作所”在漳州地区华安县训练出来的“别动队”（厦门人称它为“华安班”）。“别动队”全套武装配备都是美国式的，有美帝国主义的军事“顾问”几十人。随着“别动队”的“劫收”厦门，美军“顾问团”也跟进了厦门，占住虎头山军事要地，并在鼓浪屿西仔路头“海滨旅社”设立“俱乐部”。从此，厦门、鼓浪屿经常出现一群如醉似狂的美国兵，把这个惨遭日本帝国主义蹂躏八年、满目疮痍、支离破碎的小城市，闹得天翻地覆。他们光天化日之下在热闹的大同路、中山路、海后路和鼓浪屿的龙头路酗酒，沿街狂叫，调戏妇女，追逐小孩，肆意侮辱人力车工人和三轮车工人，踢翻小摊贩的货担，简直就是一群疯狗。美国军事人员的吉普车横冲直撞，辗毙辗伤路人的事件，也时有所闻。

美帝国主义对厦门的侵略活动是多方面的。一九四六年，先后有驻华美军上校甘约翰、魏懋龄由上海乘专机来厦，和从台湾到厦门的所谓“中美农业合作团”的纳士必、王仰康等人，进行军事和经济的阴谋活动。随后，美帝国主义在菲律宾、冲绳岛的“军事剩余物资”，从枪枝、弹药、军装、

被服到罐头食品、医药用品和日用杂货，大量输入厦门。每一次从菲律宾开来的外国轮船，都装运这些东西。美帝国主义又打着“联合国救济总署”的旗帜，把它们的剩余农产品，如面粉、奶粉之类，倾销到厦门。这些东西都得到国民党海关的优待，免税进口，沉重地打击厦门及其附近地区的工农业生产。至于美国军火带来的祸害，那就更加严重。厦门各角头流氓，大多数带上美国的“大曲七”手枪，动不动就开枪打人，危害厦门的社会治安。霸占码头，进行封建割据的“三大姓”头子，还用这些美国军火，掀起了好多次械斗。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挤掉英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头把交椅，充当帝国主义阵营的元凶首恶。这种情况，也反映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差会”这方面来。过去，“英国伦敦差会”、“英国长老差会”在闽南教会中拥有较大的势力，也办了较多的“教会事业”。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归正差会”的势力远远超过英国，并“接管”和“经营”原来属于英国“差会”的一些“教会事业”。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中华基督教会闽南大会在晋江的金井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美国“差会”急派抗战前早就在厦门进行宗教罪恶活动的卜显理，从香港赶往参加，把闽南基督教会常务委员会控制到美帝国主义手中。一九四六年冬，基督教闽南大会在漳州创办“闽南神学院”，也由美帝国主义分子给益恩充任院长。美帝国主义就是这样地操纵了闽南基督教会，把教会作为它的侵略工具。例如派夏礼文到闽西的老苏区上杭、永定、龙岩和闽南我游击队根据地晋江、安溪、南安、永春一带，表面上是“巡视教会”、“布道”实际上是窥探搜集游击队的情报。又如掌握厦门女青年会的

美帝国主义分子夏路得、斐蓉恩，经常利用宗教集会，散布恐美、媚美、崇美思想，宣扬美国生活方式，公开进行反苏、反共的宣传，毒害教友。

美帝国主义还在厦门设立“美国新闻处”，派遣文化特务，大肆活动。美国的海淫海盗、打杀抢劫的影片，独占了厦门的电影市场，又利用它的飞机走私“大钞”，捣乱金融，榨取厦门人民的血汗。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淮海两大战役的胜利，并在年底发动了巨大的平津战役，国民党反动派兵败如山倒，中国人民夺取全国胜利的军事、政治条件都已成熟了。美帝国主义力图挽救它被赶出中国的命运，加紧对华东、华南地区的侵略，也更加露骨地在厦门进行罪恶活动。十一月二十四日，美帝的中国海军顾问团团团长欧德和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专机到厦。紧接着，又有美国国会经济合作委员会特派来华调查“中国问题”的专员蒲立德由南京来厦。他一下飞机，顾不得休息，立即驱车到“国际联欢社”（今“中苏友协”）天台眺望鼓浪屿和嵩屿的形势。接着，渡海登上日光岩，眺望厦鼓及其附近岛屿的形势。一九四九年三月，美国西南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中将，率带旗舰“亚尔拉多”号、驱逐舰DDR876号从青岛不经任何手续，直驶厦门，比他们回珍珠港还要自由。和白吉尔一起来的除了他的参谋长白斯少将等人外，还有一九四八年同桂永清来过厦门的欧德。美帝国主义的这些“大人物”接二连三地“光临”厦门，是怀有卑鄙的侵略目的的。他们的阴谋诡计是什么？不到半个月，就由上海的美国总领事董远峰揭底了。三月底，董远峰匆匆来厦“拜会”伪市长李怡星，向他表明华

盛顿非常重视厦门的地位，並提出了一个由数名美国海军专家拟定、经过美国军事当局核准的计划书，主要内容是要把厦门建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大美国海军基地；在经济方面，也作为一个要点提出来。

包括厦门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是不能容忍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卖国阴谋的。一九四六年初，一群美国水兵从中山路“高亭咖啡室（今“华侨公司”）喝酒出来，拦住两位妇女调戏，立即引起群众的愤怒，把美国水兵围住痛打。那些疯狗饱尝厦门人民的拳头，举起双手，表示求饶，群众才让他们狼狈逃去。一九四八年三月三十日，美国驱逐舰“汤玛逊”号的水兵到海后路“雨池舞厅”（今“外贸大厦”）饮酒取乐，把空酒瓶从四楼扔下，击伤了行人。几位三轮车工人看到了，激于义愤，守在“雨池”楼下，等那几条疯狗出来后，出其不意，把他们揍得乱叫乱喊。这时，适有臂上带着“MP”的美国宪兵路过，三轮车工人才放手蹬车逸去。类似这种自发性的惩罚美军的事件，几乎每年都有好几起。而规模浩大的反美爱国运动，则有一九四七年初的抗议美军暴行和一九四八年五月的“反美扶日”运动。

二、抗议美军暴行的怒潮

一九四六年九月下旬，中国人民强烈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内战政策，许多城市的人民举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周”。接着，十二月二十四日，发生了驻华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的暴行，更加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各大中城市的学生掀起抗暴怒潮。厦门的青年学生继北京、上海等地之后，也组织了大规模的抗暴示威

游行。这是解放战争时期厦门人民反美爱国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厦门学生的抗暴怒潮，是一九四七年一月三日从厦门大学开始的。厦门大学的进步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剪辑有关揭露美军暴行的新闻，以壁报的形式出版，点燃了学生们的抗暴怒火。国民党反动派看到了剪报，又看到学生们反美爱国热情的高涨，暗中命令反动的三青团骨干分子于当晚偷偷地把剪报撕掉。反动派的这种卑鄙手段，更加使学生们感到愤慨。

第二天上午，进步同学为反动分子撕掉剪报事，呼吁主持正义，立即得到广大同学的热情支持。几百个同学和各学会、社团的干部签名要求学生自治会理事会召开学生大会，讨论开展抗暴运动的问题。广大同学的爱国要求，迫使控制在反动三青团手中的学生理事会于一月六日中午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这次大会，当场通过了七日罢课游行，组织“厦门大学抗议美国暴行委员会”，并通电北京大学学生会，声援他们的正义斗争；通电全国学生团体，表示抗暴的决心，建议把抗暴运动进行到美军全部撤出中国为止。大会还打电报给美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严惩凶手；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美国迅速离华，以杜绝暴行之源”。这次大会，反动三青团骨干分子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进步同学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抗暴委员会的成立和罢课示威游行的决定，使得反动派惊惶失措。伪市长黄天爵当晚召集党、政、军、宪、警反动头子举行秘密会议，讨论制止学生爱国运动的措施，命令伪宪兵团和警察局加强防范。反动三青团厦门市分团干事长郭

薰风也连夜召集厦大的骨干分子开会，面授破坏爱国运动计划，并指使骨干分子殴打进步学生，挑衅滋事，又命令厦门大学的三青团员学生，一律不能参加游行。

隔天早上，伪警察局出动大批警探，并在中山路、思明南路、大同路等主要街道增加临时警哨。当厦大同学的游行队伍准备集合的时候，反动青年军分子按照他们头子的指示，居然行凶殴打进步同学，企图制造流血事件，破坏示威游行。厦大校方当局也出面阻挡，召开所谓“三长会议”，责令教授要照常点名上课。

但是，反动派的一切阴谋诡计都挡不住同学们的抗暴怒潮。上午八时二十分，连敲三下的集合钟声响起来了，同学们冲破学校当局的阻拦，奔向大操场集合后，浩浩荡荡地向市区进发，联合厦门各中学举行抗暴示威大游行。队伍从大学路、民生路到达同文路时，在鼓浪屿上课的厦大新生院一年级同学七百多人也渡海前来会师。队伍由同文路进入双十路，又有双十中学的学生参加示威行列。队伍经过公园南路、中华路、中山路、海后路、大同路、思明北路、思明南路，最后在双十路口分开回校。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们不顾反动警探的威胁，振臂高呼“抗议美军暴行”、“为受侮辱同学报仇”、“美军滚出中国”、“打倒亲美无耻政府”、“全国学生团结起来”等口号，并沿途分发厦门大学学生抗议美军暴行委员会的《为抗议美军暴行告全市同胞书》，指出“美军驻华是一切暴行的根源，是丧权辱国、危害人民自由的根源，是独立民主的绊脚石，是和平统一的大障碍，所以我们严重抗议美军的暴行，要严重抗议美军的驻华”。它最后呼吁全市同胞“在争取独立保障自由的目标下”，“紧紧

携起手来！”当天下午，厦大抗暴委员会还在梅兴咖啡室招待各界人士，报告该会的组织动机和游行的意义，把抗暴运动扩大到各个阶层，赢得全市人民的声援和同情。

游行过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厦大学生的抗暴委员会团结了大多数爱国同学，继续开展反美爱国运动，而反动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也千方百计地继续捣乱和破坏。抗暴委员会出版《抗暴导报》，报导各地抗议美军驻华暴行的情况，反动分子也出版《剿鼠》、《海风》等壁报对抗。还有当时在厦大政治系当系主任的特务教授×××之流，也在他们创办的《灯塔》半月刊发表评论，大谈美军暴行是所谓“法律”问题，应依照法律程序解决，厚颜无耻地为美军的暴行辩护，並公然指责学生的抗暴示威游行是“目无中央、目无党国”，对学生的反美爱国运动进行威胁、恫吓。学校当局也更加严格实行了他们搞的所谓“言论公约”之类的东西，故意举行《青年的恋爱与婚姻问题》等无关紧要的讲座，以冲淡政治运动的气氛。训导处还企图以“抗暴的任务基本结束”的荒谬论调撤销抗暴委员会。但是，学生们没有屈服，坚持斗争了两个多月。就在这时候，闽粤赣边区闽西南地下党和闽浙赣省委城市工作部，先后在厦大建立和发展了组织，给予学生运动以坚强的领导。

三、反美扶日运动

继一九四六年底一九四七年初的反抗美军暴行之后，一九四八年五月下旬，全国各地又开展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军国主义重新复活的运动。厦门人民身受日本军国主义者糟蹋了八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又目睹美军的种种暴行，深深感

受美帝国主义侵略的痛苦。自从上海、南京、武汉、成都、昆明等地举行“反美扶日”示威游行的消息传来后，青年学生也立即起来响应。这是解放战争期间厦门人民反美运动的第二次高潮。

这次最先投入“反美扶日”运动的，仍然是厦门大学的学生。五月二十四日，厦大的民主墙上首先出现“反美扶日的剪报，报导各地反抗美帝扶日的情绪和舆论，继而“春牛社”出版了漫画，“壁报联合会”举办“反对美帝扶植日本”的笔谈和专刊。此外，还有华北学联寄来的《宣言》。一时民主墙上五光十色，琳琅满目，学生的情绪极为激昂。二十五日晚上，国立侨师学生会召集十六个单位的壁报负责人开会，讨论扩大宣传和通过罢课两天的决议；集美中学发表了《反美扶日抗议书》；其他中学也纷纷集会，酝酿罢课示威游行。“反美扶日”运动开始后，厦门党的组织把在厦大的外围秘密组织“南方社”改为“五月社”，负责这次运动。

五月二十七日，厦大同学在东膳厅发起“反美扶日”的签名，提出四项意见：一、扩大宣传反对美帝扶日政策；二、联合本市各中学一致行动；三、罢课两天，全体同学出动宣传；四、致电美国国务院，反对扶日政策。签名的人非常踊跃，共达四百六十四人。学生自治会理事会根据签名同学的建议，于当晚八时半在东膳厅召开临时会员大会，英华、侨师两校也派代表参加。大会一致通过上列四项意见，並决议：一、组织厦门学生联合会；二、罢课两天，联合各中学在二十八日下午举行示威游行。当晚，厦大学生漏夜赶工筹备游行事宜，侨师、英华两校代表也于会后赶回原校，报告开会结果，分别准备第二天的大游行。

二十八日上午十时，伪市政府特地召集各中学校长、训育主任共二十多人开紧急会议，由伪市长黄天爵亲自主持。伪市长指令学校当局加强管理和约束学生，不许学生示威游行，並密令伪警察局转饬各分局“及早防备”、“严密监视”，布置流氓、特务进行破坏。校长、训育主任会后回校，立即贴出紧急布告，以“违反戡乱法令”威吓同学，要同学取消游行。

反动派的威胁一点也起不了作用。二十八日中午十二时许，侨师学生由曾厝垵整队出发，抵达厦大大操场，会同厦大学生组成壮大的队伍，在“厦门大中学生为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大游行”的大横幅引领下，向市区进发。队伍在同文路与厦大新生院学生会师后，转向双十路，双十中学学生也热烈参加。继而大同中学、省立厦中、市立厦中等校同学，陆续加入行列。大队由双十路经公园南路、中华路到中山路，沿途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美国兵滚出中国”等口号；张贴反对美帝扶日的漫画、通俗壁报、标语，散发宣言、传单；厦大同学还用柏油在马路上写上反美扶日标语。宣传队在十字路口用厦门话向市民进行宣传；歌咏队沿街高唱反美歌曲，情绪十分热烈。一时万民空巷，途为之塞。市民中有的鼓掌欢迎，有的露出衷心的微笑，对学生们寄予热烈的同情。当时游行队伍的歌曲有：《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义勇军进行曲》、《你是灯塔》、《反法西斯进行曲》、《五月进行曲》、《游行进行曲》等。《游行进行曲》的歌词是：

前进，一起向前进！

前进，一起向前进！

看敌人挥动明晃晃的刀枪准备再屠杀。

一世纪来耻辱堆得比山还要高，

百年仇恨比海还要深。

同胞们，惊醒吧！

在示威游行过程中，反动派布置特务分子、草仔垵流氓集团的头子苏草包，带领一批流氓、特务，有的身怀利刃，有的腰插手枪，有的手持铁尺，预先埋伏在后路头一带，准备滋事行凶。国民党的武装特务和宪兵、警察，准备在流氓行凶以后动手抓人，进行血腥的镇压。但由于学生反美爱国的示威游行，大义凛然，而且游行队伍秩序井然，流氓、特务始终不敢动手，也没有机会动手。

示威游行的队伍继续勇往前进，到达轮渡码头时，因为要等待英华中学学生渡海前来参加，暂停前进。这时候，细雨霏霏，队伍一点也没紊乱，大家精神奕奕，毫不畏缩。等英华中学学生进入队伍后，行列继续前进。当大队转入海后路进抵大同路时，暴雨倾盆而下，宣传队临时喊出了“救国不怕雨打”、“雨打算什么”的口号。大家的情绪益见兴奋，英勇坚毅地冒雨前进。就在这个时候，伪市长黄天爵乘小包车路过思明南路，也被游行队伍拦住“宣传”一番，並把他的小包车贴满标语，才让它灰溜溜地开走。参加这次示威游行的共有二千多人，游行历二个小时，最后在中山医院附近广场停步，举行一个简短隆重的集会。学生们身上的衣服虽被雨淋湿，但都露出胜利的笑容。在广场上，队伍排成“营横队”形，由主席团报告，大意说：“我们已完成反美扶日示威游行的壮举，但是这只能算是我们胜利的开始。记得去年曾经有过一次游行（按指“抗暴游行”），可是没有雨，

而这次游行，却有了雨。这个雨正足以说明我们每个人都从暴风雨中站起来。我们厦门大中中学生要团结起来，在这暴风雨中要站得更紧”。接着又通知两件事：一、请各校选派代表两人，当晚到鼓浪屿厦大新生院开会，讨论组织成立厦门学生联合会问题；二、厦大学生自治会定二十九日晚上八时在大操场举行营火晚会，欢迎各中学同学踊跃参加，并希望带精采的节目来表演。报告结束后，全场同学高唱《一家人》、《团结就是力量》，歌声响彻云霄。各校队伍由领队的同学在歌声中踏着雄壮的步伐，有秩序地离开广场。

在这场斗争中，厦大学生发表了《为抗议美国扶植日本上南京总统府代电》和《国立厦门大学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抢救民族危机宣言》。厦大的王亚南、卢嘉锡、熊德基、林惠祥、方锡畴、吴兆莘等十位教授，也先后发表了“反美扶日”笔谈。《星光日报》应读者请求，出版“美国扶植日本问题”笔谈专辑。短短四天，就收到稿件五十多篇，投稿者包括学生、教师、新闻记者、工人、农民、店员、学徒、伪公务员和商人。《星光日报》编者在“笔谈专辑”的编后语说：“我们征稿时一再表示，来稿无论对‘美扶日’赞成或者反对，均所欢迎，但征稿的结果，却没有一篇赞成美帝扶日的”。这也可以看出厦门各阶层人民是一致反对美帝扶植日本的。

“抗暴”和“反美扶日”运动，锻炼和加强了知识青年的革命斗志，团结了广大的爱国青年，也给全市人民普遍受到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认清美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在党领导下的这两次大规模反美爱国运动，也为发展党的组织、支援农村游击战争打下很好的基础。

忆厦大嘉庚阅览室的斗争

林文治 樊建平 陈炳章

一九四八年夏，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节节进攻，厦大命运经过“反美抗日”高潮后继续向前发展。厦大地下党为广泛深入地传播马列主义真理，从根本上去教育与发动群众，决定创办一个以进步书报为主的阅览室；为了尊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校主与便于进行合法斗争，把室名定为《嘉庚阅览室》。地下党派出一批党员，参加学生自治会的阅览室筹备工作。

当年六、七月间的一天上午，阅览室筹备会议在同安楼二楼召开。出席者有谭成祖（学生自治会学术股负责人）、邹永贤、黄志贤、廖开治、陈求学、樊建平、林文治（均为地下党员）等。会议决定成立嘉庚阅览室工作机构。阅览室按书报收集，书籍目录号码编定，书刊借阅管理三方面工作设组：即收集组、编录组、管理组。公推林文治负责阅览室，樊建平、毛涤生负责管理组，审定管理人员（共廿余人）。会后，我们赶办了以下几件事：（一）进步书报的收集，除地下党大量供应外，一方面发动同学们捐借，另一方面由黄志贤等同志借用，设信箱写信请香港新民主主义出版社（化名为沈明珠小姐）源源寄送；（二）把阅览室布置得具有民主战斗的气氛，黄秦（即赵秦）同志为此赶画四幅党外

名人画像：即共产主义者鲁迅和爱国民主人士陈嘉庚、闻一多、邹韬奋；（三）建立一套为读者服务的管理制度，规定每天开放半天（包括星期日）必要时延长开放时间，安排管理人员轮值名单，每天一班两人，强调方便读者与注意安全两不误。厦大暑期一开始，我们向学校办理登记手续后，嘉庚阅览室便正式对外开放了。

《嘉庚阅览室》设在同安楼二楼（现鲁迅纪念馆）左侧的一间大教室里，室内摆放着分属哲学、经济、政治、法律、历史、文学等七、八百册图书和廿多种报刊，其中大部分书报是左或中间偏左的，也有少数由学校图书馆订购转来的，右或中间偏右的报纸和杂志。为了迷惑敌人，我们把国民党没有查禁的进步书刊（包括一部分马列主义的书和解放区文艺作品）同中间的、反动的报刊一齐公开排列，并把极端反动的《中央日报》、《救国日报》和《灯塔》放在比《文汇报》（香港出版）和《时与文》等更显著的位置，对被查禁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著作和其他革命书刊：如延安文献、群众、正报、华商报、新华社电讯等，则放在内部，书皮伪装，不盖图章，由党员发动积极分子来室秘密借阅。当时阅览室对外宣传是“兼容并蓄”，提倡学术研究自由。

嘉庚阅览室的开放，打破暑假后厦大校园的寂静。同学们来阅览室的由少至多，先是文、法、商同学来得多，后来理工同学也多了，讲师、助教、工友和校外的人也来了。阅览室内人流拥挤，争先阅读，我们就把开放时间延长至晚上。当时好几套的进步书刊都周转不过来，我们便再想法多供应。进步报刊有限，人多看不到，我们在过后一段时间就

剪贴在室外供阅。《文汇报》上面曾经登载关于嘉庚阅览室前进情况的报道（黄志贤等投稿）一剪贴出去，同学们立即围观不绝。当时同学们常看的公开报刊是《文汇报》、《大公报》、《星岛日报》与《世界知识》、《时与文》、《观察》等。公开借阅较多的书有《大众哲学》（艾思奇）、《官僚资本论》（许涤新）、《中国怎样降到殖民地》（钱亦石）、《土改手册》与《鲁迅文集》、《南侨回忆录》（陈嘉庚）、《延安一月》（赵超构）、《西行漫记》（斯诺）、《小二黑结婚》（赵树理）、《李有才板话》（解放区作家）、《李家庄的变迁》（同上）《母亲》（高尔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斯特洛夫斯基）等作品。航空工程系林龚亮同学谈自己思想变化时说，他看过《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等书后，才认识到旧中国的性质与反动派必亡，革命必胜的科学道理。因此，在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厦大学生自治会改选中，一个右的竞选团请他代写竞选宣言时，他不仅拒绝，且进行揭露。他说：“象他那样转变的人，当时是不少的”。

约近九月，嘉庚阅览室走过两个多月的战斗历程，真正成为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的阵地。这时，市里传说厦大有共产党图书馆，校内有风声，说训导处要搜查阅览室。外地有消息，说浙江大学的进步阅览室遭受特务破坏，书被没收，管理人员失踪。厦大地下党密切注视校内外各种动态，立即对嘉庚阅览室采取进一步的安全措施。接着廖开治等同志驻室加强夜班力量，陈寿松等同志连夜转移内部革命书刊。果然不久，训导处就借口“开学需要教室”，下令阅览室停办。继而徐世玉等人，不顾群众反对，在室门上贴“勒令停办”的封条。我们遵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一方面和同学

一道揭露训导处一些反动家伙的蛮横无理，一面让出教室，另迁新居。新居系在大膳厅后面的一间石砌而破烂的房子里，经过我们自己动手修整后，陋室显精神。冲过第一个恶浪的嘉庚阅览室，又以新的战斗姿态出现了。

九月初，厦大暑假结束，在外同学陆续回校，嘉庚阅览室拥有更多的读者。训导处的一些反动家伙，一次扼杀不成，又搞第二次阴谋了。一天上午，徐世玉等三人乘同学们上课，管理人员猝不及防的时候，突然冲进阅览室，抢走几本马列书籍。他们威胁说：“违反勘乱法”，要查封。学生自治会主席丁连微等闻讯后，立即赶到现场。丁反诘：“阅览室的书有盖图章，看看你们拿的书”。这些家伙一看没盖章，就大叫：“你们要抵赖”，丁严肃地说：“那是你们带来的书，你们企图陷害”。当在场的同学群众喊要把他们的暴行拍照时，他们慌得溜走了。为了使这场斗争进行得主动些，事后，邹永贤、陈启修二同志以学生会代表身份往校长办公室说理交涉，要求校方保护学术研究自由环境，嘉庚阅览室在广大同学的舆论支持下，又胜利通过了第二个恶浪的冲击。

一九四八年秋后，人民解放战争迅速发展，我军已把蒋军分别牵制在东北地区的沈阳、华北地区的北平、长江以北的徐州一带。国民党军队疯狂挣扎，加紧控制白区。进行恐怖统治。九月中，厦大地下党根据上级指示的“积极隐蔽、广泛深入联系群众”的方针，决定把工作重心转入院系。这时，训导处的反动家伙，还对阅览室叫喊：“要查封”，我们根据地下党的部署，退一步，进两步，主动停止《嘉庚阅览室》的对外开放，并把革命力量转到大办院系阅览室上去。除林文治、樊建平二同志兼负责把内部革命书刊在“映

雪”、“博爱”两楼的积极分子中继续传阅外，各院系党员团结所在同学进一步发动捐赠进步性和学术性的书刊。不久，厦大又涌现出经济、历史、中文、生物、海洋、商学等十多个嘉庚型的院系阅览室。它们以学术研究的名义，坚持隐蔽斗争一直到解放前夕。

厦大地下党领导下的《嘉庚阅览室》及其后继的院系阅览室，依靠群众，运用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斗争策略，充分发挥革命教育阵地的积极作用，提高了厦大广大学生的政治觉悟，使厦大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一九四八年冬季以后，党依靠着这个基础，胜利地领导“要求配售平价米”、“助学自救”、“护校”等各种斗争，使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地蓬勃开展起来。

一九四九年春季

厦门大学学生救饥运动

陈寿松

1949年2月，正是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前夕。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国民党反动派154万主力军之后。百万雄师，直逼长江北岸，随时准备渡江，解放全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国民党反动统治已经是土崩瓦解，达官要人如鸟兽散，争相逃命。国民党的经济已经彻底崩溃，伪金元券信誉扫地，物价一日数涨。工人和公教人员发薪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伪币买粮食或许购买黄金、银元、外币。国统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日夜盼望早日解放。

厦门地处东南沿海，历来为祖国东南重要门户，是解放台湾的前进基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党组织预计到敌人在大陆溃败前，必然要在此负隅顽抗，因此，当时党组织的重要任务就是依靠进步力量，团结教育中间群众，壮大自己队伍，揭露敌人阴谋，孤立打击少数反动分子，迎接解放。当时厦门大学地下党组织，经过1947年反对美军暴行，1948年反美扶日，“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等斗争，党组织得到锻炼壮大，成为一支有相当战斗力的队伍，团结

了广大师生员工，孤立了少数反动分子。

1948年冬厦门正逢大旱，水源枯竭。市自来水厂无法正常供水，市民饮水大部分靠集美等地用船运水供应。国民党反动政府还是变本加厉搜刮民财，物价飞涨，广大市民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厦门大学学生同样遭受伪币贬值，物价狂涨之害。当学生接到家中邮寄来钱时，金元券已经贬值几次。因此生活极端困难，特别是一部分家在北方解放区的同学，因国民党反动派切断和解放区的一切联系，经济来源断绝，处于断炊困境。同学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懑情绪，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当时敌人在厦门只有宪兵、警察，没有正规部队，统治集团之间勾心斗角，惊慌万状。中共厦门市委分析了这种形势，认为应当抓住这有利时机，以厦门大学学生为主体，发动一次救饥运动，走向社会，向广大市民揭露国民党腐败统治，给敌人一次狠狠地打击，为解放厦门准备群众基础。

一九四九年二月间，当时厦门市委负责人王毅林同志约见了我们，说明要在厦门大学发动一次声势浩大的救饥运动，成立救饥委员会，由我担任主任。王毅林同志还指出，这次斗争的方针是团结教育广大同学，揭露国民党腐败统治，孤立打击少数反动分子，争取学校教职员工的同情，斗争要走向社会，教育社会各阶层，斗争的策略是以经济斗争为手段，达到政治斗争的目的。救饥委员会成立后，马上得到绝大部分同学的支持，纷纷参加到救饥运动行列。我们在同学中宣传“国民党政府一心打内战，不管学生和人民的死活，现在相当一部分同学经济来源断绝，生活无着，有的同学虽然能得到家中的一些接济，但物价一天数涨，金元券一钱不

值，生活也很困难，现在要生活，要活命，就得靠我们自己。同学们，大家组织起来，卖苦力自救”。我们以党员和进步同学为核心，把参加的同学分成小组（每小组3~5人不等），有的给粮店拉米、拉黄豆，有的把学校的自来水拉到市里去卖。同时我们又和厦门两家纸烟工厂商定，以较低的价格批发香烟，由同学运到市内去卖。一时厦门市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厦大学生。二、三人一个小组，手拿着小纸旗，上面写着“物价飞涨，我们无法活下去”，“要活命，要生活，只好来拉车”，“贪官污吏横行，生活没有保障，被迫卖水卖烟”。（当时我们是集中力量，打击国民党反动统治，所以不提奸商）。一边卖，一边向各阶层群众宣传学生的困难处境，控诉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这次运动，组织严密，敌人事前毫无所知，这突如其来的声势浩大的救饥运动，弄得敌人措手不及，只能眼巴巴的看着我们。社会上的同情也在我们这边。市民看到这种情景，感慨地说：“物价天天涨，连大学生也被迫上街卖烟，这是什么世道？”当救饥运动蓬勃开展时，王毅林同志约见了。他说“这次救饥运动，打得敌人惊慌失措，现在要趁敌人来不及采取对策前，迅速扩大声势，给敌人以更有力的打击”。我迅速召开救饥委员会会议，总结前一段工作，并提出下一步救饥运动的重点要放在扩大宣传、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争取社会的更大同情，把斗争深入一步。此后几天，在街上活动的厦大学生义卖队，实际成了一百多个宣传队，通过他们的活动，有力地揭露了敌人的腐败统治，激起了社会各阶层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强烈不满。三月初，王毅林同志再次约见我时指出“这次救饥运动，行动快，声势大，有力地打击了敌

人，团结了广大群众，社会上反映好，已经达到了我们的目的，现在救饥运动可告一段落，下一步你们要把重点放在竞选学生自治会的领导上”。我们在最后一次召开的救饥委员会上，宣布委员会已经完成自己的任务，胜利结束，紧接着就是组织竞选团、竞选学生自治会领导的活动。

这次在中共厦门市委和厦门大学总支领导下的救饥运动，是解放前夕以厦门大学学生为主体的一次较大学生运动，由于党提出的口号“要活命，要生活，依靠自己救自己”符合广大师生的要求。因此参加人数达到在校学生80%以上，在斗争中锻炼了党员和党所联系的积极分子，团结和教育了广大师生，有不少平时只埋头读书，从不参加政治活动的同学，也纷纷参加救饥运动。他们逐渐觉醒，认识到光埋头读书不行，不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国就没有希望。因此，我们党所联系的进步学生队伍迅速壮大；校内的少数青年军、三青团、基督教青年会反动分子，由于在救饥运动中阻挠破坏，煽风点火，引起广大学生的不满，他们的丑恶面目更加暴露，在同学中更加孤立。以致在学生自治会竞选时，平时嚣张一时的少数头面人物不敢出来组织竞选团。其次，这次运动面向社会，对揭露国民党腐败统治，教育社会各阶层，争取他们的广泛同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特别是工人、中小工商业者，因为他们对国民党苛捐杂税、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同样深受其害，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由于我们采取以经济斗争为手段，政治斗争为目的方针，我们的呼声，也就是他们的呼声，因此得到他们的同情和共鸣，激起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强烈不满。我们向一位开铺子的商人讲述学生的困境时，他深有同感地说：“唉！我的处境和你们学

生一样，国民党‘万税’加在我头上，东西一天涨几次价，铺子快倒闭了！”一位工人向我们买烟时说：“我干一天活累得半死，养活不了一家五口人，这世道不改，我们都没法活啊！”这正是解放前夕国统区广大人民的心声，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怒情绪，已经快爆发了！在天将破晓时，期望人民解放军迅速渡江，解放全中国，解救他们。这次救饥运动，全部实现了市委所提出的目的，为迎接厦门解放做了组织准备。

党领导厦大的护校斗争

樊建平

八月卅一日深夜，毛森组织了特务、宪兵的大队人马包围着厦门大学师生宿舍，逮捕了党与非党的护校师生员工十多人，进行了威吓、毒打、坐老虎凳等残酷刑罚。九月十四日后，杀死了厦门大学地下党员修省、张逢明、周景茂、陈炎千、陈绍裘五位烈士，白色恐怖浓浓地笼罩着厦门大学。但是留校地下党员林云程、陈在正、樊建平，依靠了一批留校地下团员，并在全体留校员工的共同努力之下，动员大量学生骨干，进步同学留校，继续开展护校斗争，以迎接厦门的解放。国民党宪兵、特务白天黑夜闯入宿舍，以查身份证为名，监视学生护校活动，零星逮捕了同学。地下党员樊建平同志仍然根据陈人庄同志撤退到闽南内地游击区之前所交代的任务，向学校当局领出一笔款，积极大胆地组织了一些学生深入各地采购大量大米、柴火、副食品，保证留校护校同学的吃饭问题，安心地坚持下来开展工作。经过党组织同志的酝酿，在厦门临解放前夕，十月十五日前后由樊建平同志出面秘密地召开了二次八位学生院系骨干会议，商讨着迎接解放工作事宜。

十月十七日，拂晓，炮声、枪声稀少了，天没有亮，看见了人民解放军登陆先头部队，在学生宿舍（鼓浪屿博爱宿

舍)附近摸索前进中,留校同学天翻地覆地欢呼起来,轰动了博爱宿舍。学生们蜂涌而出,有组织地配合登陆作战部队,开展打扫战场工作,收缴和集中战场上大量的枪枝弹药战利品,收容一批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个别地给解放军介绍地形和攻打要点;根据老百姓的密报与要求,抓了一些国民党军官;并向他们宣传俘虏政策,解除顾虑;打捞收埋了在海上和战场上英勇牺牲的烈士遗体。少数学生骨干带上部队临时发给的红布条,别在左手臂上,以便与作战部队联络,并且负起开展社会治安,安定人心工作,解决了厦门鼓浪屿之间通航问题。国民党飞机还在头上丢炸弹、机枪扫射、街道上空还有流弹,厦大留校同学,按院系组织宣传队伍,冒着生命危险,打起腰鼓,扭起秧歌,大声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宣传队在厦门市、鼓浪屿重要街口,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等,驳斥“共产、共妻、共匪”的谣言。使市区商店开门营业等。我们按上级党的指示,将厦门地下学联活动公开展开,立即召开会议,组织各中学开展迎接解放宣传活动。厦大同学们,白天干、黑夜干,越干越有劲,没有一点疲劳感觉,迎接厦门解放。

过了不久,厦大师生员工克服了种种困难迅速地恢复正常秩序,厦大上课了。这时厦大留校师生员工的英勇护校,迎接解放的胜利斗争才结束。

黄奕住先生生平事迹

黄笃奕 [张镇世] 叶更新

一、凄凉身世

公元1868年12月7日(清同治七年十月廿四日),黄奕住出生于南安县十四都金淘区楼霞村的一个贫困的农民家中,乳名阿住,父亲黄则华,世代务农,依靠租种的五亩公田,养妻育子,勉度生活。以后两个弟弟奕孙、奕送相继出世,一家五口,生计窘迫。母亲肖氏,能织布,但家贫无力购置织机,不得已为人纺纱,起早摸黑,挣些微薄工钱,弥补家庭的艰难生活。

当时奕住年龄虽小,但深知自己是两个弟弟的长兄,家庭生活发生困难,自己有责任体贴父母,帮助耕种,但粮食收入缴纳田租后所余无几,青黄不接时,告贷无门。奕住遂弃农学艺,央求乡中一位剃头老师傅,收留他为学徒。学成出师后,每天挑着理发担沿村窜门,或到邻近的安溪县为人理发。虽收入微薄,但对家庭生计不无小补;且赢得邻村王家的赏识,愿将自己的闺女过户作为他的童养媳。

二、被迫出洋

奕住为人诚恳,剃头手艺又好,业务兴旺,詎料横祸飞来,迫得他不得不离乡背井,出走外地。

在封建社会里，素有强弱房，硬软角之分。所谓强弱房硬角，乃房亲中的官家富户和他们的近亲。这些人往往仗势欺凌弱房、软角的远亲。有一次，奕住为乡中某豪绅理发，正在修容之际，该豪绅突然咳嗽，头部摇动，剃刀微伤额角。奕住当场赔礼道歉，豪绅却大发雷霆，谩骂斥责，还扬言日后要找他算账。奕住怕父母受累，潜逃厦门，在南安乡亲的垵栈暂时棲身。垵栈老板获悉他的处境，颇表同情，鼓励他往南洋群岛谋生，并借给船费。这时是1884年，奕住才十七岁。

当时出国到菲律宾群岛，路程较近，但入境手续较麻烦。英属新加坡、马来亚和荷属印尼等埠头，路程较远，但在大量吸收苦力，入境手续又简便，只要买张船票，即可入境。于是奕住决定去荷属印尼，途经新加坡三宝垅。

三、初到壑川

三宝垅（简称垅川，厦门话叫三吧壑）在荷属中爪哇省北岸，早为印尼贸易及制糖业的中心，又为蔗糖、咖啡、菸草的输出港。奕住初到这里，暂在乡亲店里“弄帮”（伙计），几天后即重操旧业，出门为侨胞剃发。虽可维持生活，但他想：万里奔波，所为何事？于是把所有理发工具，全部抛入海中，发誓要干出一番事业。

四、摆摊设点

奕住抵达三宝垅之初，就留心体察该地的风俗人情和市情。他看到三宝垅的华侨商店和居民，每逢主顾光临或亲友探

访，就在街上咖啡摊叫几杯咖啡，配些糕饼待客，感到摆咖啡摊，既免店租，又有利可图。于是向乡亲借了本钱，买点咖啡、白糖、糕点和杯碟、炉灶、桌椅，在繁华大街旁摆起咖啡摊。每日得利，少则几盾，多则二、三十盾。在家乡和南渡之初饱尝贫困滋味的黄奕住，勤俭诚实，博得一位同行华商蔡缙的爱慕，不但愿意和他合作经营，互相关照，而且愿意和他结为伉俪，奕住不敢相欺，直言不讳地告以“唐山”已有父母订配的童养媳，予以婉言辞绝。不意竟得蔡姑娘的更加敬重，自愿降格为妾。奕住以盛情难却，禀告父母并征得王氏同意后，才与蔡氏结为鸾凤。

五、开行坐店

奕住虽幼年失学但赋性聪颖，排咖啡摊时，即学习印尼语，在与侨胞和印尼人的频繁接触中，建立了密切联系。经过几年积蓄，就改营小贩。他深入村镇，一边贩卖杂货，一边收购土产，以后又由小贩逐渐发展为批零兼营的“黄日兴”商店。“黄日兴”的生意蒸蒸日上，资本日益积累，到1897年奕住刚满三十岁时，已拥资近百万盾。这个日日兴隆，名副其实的“黄日兴”商店，即进一步在繁华的三宝垅市衢扩展为两层五个店面的商行。

六、扩大经营

奕住孝敬双亲，自到南洋后，家书侨汇，从未间断。1892年，奉父母之命回乡与童养媳王氏成婚。婚后数阅月，身虽在家园，心却系海外，即匆匆重返印尼，继续经营。

奕住在三宝瓏，初期端赖自己与蔡氏共同经营，后来人手不足，雇用的职工日渐增加。随着日兴商行的日益发达，先后在吧城、泗水、棉兰、巨港、北加浪等埠，设立分行。各分行营务，归三宝瓏总行指挥。1910年直接在英属新加坡开设分行。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估计他的资产约为五百万盾。

七、险 度 难 关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区主要在欧洲，南洋群岛的荷属，英属殖民地，远距欧洲战区，开始影响不大，商业依旧繁荣，货远畅通无阻，行情虽有涨落，商人还是有利可图。当时统治印尼的荷兰殖民政府，为增加税收，鼓励商人，规定凡购买期货票单，经律师事务处登记证明后，即可持货单付本向安达等银行抵押单面贷款百分之十，但对货方只须先付百分之二十五，其余分期，待货物售完时才结算还清。商人往往以银行押款作为购货之一部份货款，比如货单金额为十万盾，可向银行押借壹万盾、自己支付壹万伍千盾，即可成交，其余的柒万五千盾，可以随着有货物的逐步出货而分批还清。

有一次，奕住开了一张十万盾现金支票交付货方，却被银行拒付。银行经理对他说：“住兄，你我都是老朋友、老主顾，你若没有现款，尽可向我说明，难道你我不通融吗？何必开这张空头支票使我为难。”奕住一听，气得二话不说，收回支票，大发雷霆说：“我黄某在贵行的存款，至少还有五十万盾，为什么贵行拒付这十万盾的现金支票，撕破我的面子，损坏

我的信誉，贵行该如何赔偿？”可是银行经理却心平气和地说：“住头，你不用急，冷静地听我说，现今食糖行情，你是知道的，你存在银行的现款，虽然还有五十多万盾，可是你向敝行抵押的货票数量，细算起来，对抵之外，起码还欠本行三百五十万盾以上，所以十万盾现金无法交付，请你原谅！”奕住这时才想起他向银行作价抵押时，每包糖价二、三十盾以上，而现在每包仅值七、八盾，看来行情还会下跌。于是立即晕倒，幸亏银行职员请来医生，抢救后，送他回店。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年又一年地延续下去，1917年秋后，战局日益紧张，英、荷各船运公司，奉本国政府之命，征用所有大货轮、应付战争需要，英、荷所属的南洋群岛的土特产商品无法转运出口。三宝瓏的食糖，受影响最大，价格惨跌，每包从七、八十盾跌到十二盾，还没有人承顶。奕住不久前买进的一批二十万包古巴糖，其跌价损失已超过一千万盾，濒临破产。三宝瓏的食糖，既不能出口，公私仓库及栈房，堆积如山，无法容纳，各货主就在火车站旁、大马路边，租用临时搭盖的简易仓库，以免受日晒雨淋的损失。

1918年初，糖价益跌，奕住有大宗存糖，近期应付糖款迫在眉睫。他心急如焚，象烈锅蚂蚁，坐卧不宁。有人劝他脱身远走，去新加坡或暂回“唐山”，还不失为一个富翁。但他严守商业信誉，宁愿破产，也不逃赖，千方百计筹划应付，并果断决定将新加坡所置店屋及橡胶园证券向富侨黄仲涵押借现金，以济燃眉之急，最后才得度过难关。

八、因 祸 得 福

由于航运不通，三宝瓏糖积如山，大小货栈无法容纳，

得再搭临时简陋仓库。有一天，一个大货仓失火，波及邻近仓库，保险公司为防止火烧和雨淋的更大损失紧急招标拍卖。每包由三盾降到二盾半还无人承标。奕住和他长子钦书前往失火的糖栈察看，发觉着火的是糖堆的外围，中下层的糖包完整如旧的约占60%。奕住装模作样地讨价还价后，以每包二盾承标。但他当时已债台高筑，那有向保险公司交纳承标的大笔糖款呢？恰巧日本正金银行在三宝垄开设分行，为招揽业务，树立银行信誉，竟自动邀他透支，埠上其他银行因欧战，资金没有出路，也互相竞争，放宽贷款限额。奕住得此机会，化险为夷，渡过难关。

奕住把买下的全部糖包，重新整理加足秤重，本想早日脱手出售，以偿还各银行的大批借款。可是直到1918年11月初，食糖行情仍然疲软不振。当时三宝垄有糖商四家：黄仲涵的黄建源（有自己的制糖厂）、郭春秧的郭锦茂、张永福的张盛隆和黄奕住的黄日兴。每家手中各屯数十万包食糖，无法脱手，资金不能周转。奕住对大战何时结束，航运何时恢复、银行的信用透支又很难按期清还，不得已与女婿许春隆及老友叶源坪商量，带些现金，搭上前往英属新加坡的轮船，作另谋出路的打算。

1918年11月11日，奕住在前往新加坡的客轮上，忽然听到无线电波传来德国投降和协约国胜利的喜讯。战争一结束，航运一恢复，糖价必然逐步回升，奕住立即电告春隆、源坪二人，嘱他们在糖价回升到足以偿还银行债务时，立即脱售。不久，欧美买主纷纷捲土重来，争相提高糖价收购，行情一日数涨，由十余盾升到二十余盾，还在扶摇直上。奕住迫不及待，即买掉返三宝垄，时糖价已升到每包七、八十盾，恢

复战前正常行情。奕住所买糖价，绝大部份都是在二、三十盾左右，承标买进的那一批，每包只有二盾。到1919年四月间，他离开三宝垄回国时，据传除清还银行债务外，获利在三千七百五十万盾左右。

九、携资回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荷属爪哇各埠商业开始复兴繁荣，荷兰殖民政府，即迫不及待地决定，所有工商企业，须补缴自1914年至1918年五年的所得税以及其他因战争影响而停征的税收。这样一算，奕住该补交各项税款总数达一千五百余万盾。殖民政府又三番五次要求他加入荷兰国籍，因为荷兰籍民可享受减轻税收的权利。日本领事馆也要他加入日本国籍，说是可以为其籍民出面交涉减税。奕住自知如果加入外籍，减税是没有问题的，但都婉言谢绝，既不加入荷籍，也不加入日籍，而当时的中国政府，又懦弱无能，不敢为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向殖民政府交涉。奕住过去五年，每年均已照章完税，这次无端又要补缴五年税款，而且要累积计算，款额之大，令人吃惊。但身处异国，华侨处处受外人歧视和压迫，只好忍气吞声设法缴纳，现金不足，再从新加坡调款凑付。此后，他左思右想，自己在国外经商又不入外籍，照此税率，将来辛苦经营所得，必然尽充外国金库，自己徒劳无益。因此他与钦书、浴沂两儿商量，不如将南洋商行改组或收盘，把现金汇归祖国，投资建设，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助一臂之力。既可聊表华侨爱国之心，又可耀祖荣宗、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经过多次商量以后，立即结束商行业务，遣散大部分职工，日兴行向当地政府注册改换经理，三宝垄所有不动产的

产权,全部移交蔡氏及女婿许春隆,钦书、浴沂二子,暂留爪哇,协助许春隆料理日兴行业务,自己携巨款回国投资。当时爪哇盾汇率是一盾等于中国大洋二元多,据传奕住携带回国的资金,约为银洋一千七百多万元,也有人说是四千多万元。

十、报答亲恩

1919年4月,黄奕住由三宝瓏启程回国,途经新加坡,逗留数天,视察日兴分行,并和该地友好酬酢,29日始返厦门。时南安匪盗横行,地方不靖,乃选择风景幽美,治安较好的公共租界鼓浪屿,购置许许多多的楼房店屋和连片地皮,作长久定居之计,一面派人到南安楼霞故乡扶迎母亲肖氏来鼓浪屿安享晚年(黄父已去世)。

奕住甫抵厦门,首先在鼓浪屿洋人球埔(即现在的人民体育场),南侧购买一大片旷地,内中包括前德记洋行“二舍”(相当副经理)的一栋二层半住宅楼,及明德女学一幢校舍,准备兴建南北两楼及正中大楼。是年六月十二日,欣逢其母七秩晋四大寿,奕住决定为她举行盛大的祝寿仪式。闽厦官绅商学界代表,合撰寿文,赠送寿帑,以及登堂祝寿的,不下五百人,连演祝寿戏剧几近匝月。寿堂设在旧楼地窖上临时搭盖的一座大木棚内,堂内招待亲友宴饮观戏,堂外施舍乞丐。讨赏的乞丐每人可得大银洋一元。

十一、兴建家园

举行寿庆后,大规模地兴建家园。把德记洋行和明德女校的旧楼,全部拆掉,以十万两白银,给上海西门子公

承建一座大楼。大楼南北的另外两幢楼,由本地包揽建筑的公司承包。1919——1920年间,又购买田尾海滨地皮,建筑“观海别墅”,与其亲家林叔臧的“菽庄花园”互相媲美;并拟架筑一座“亲家桥”使“菽庄”“观海”两园相通,但因受其他方面阻挠而未能实现。

他还为他的子女,分别在鼓浪屿三丘田、东山顶、梨仔园、新路头(现漳洲路)、旗山路,购筑住宅、园林,为其母营造墓园。

此外,奕住另在鼓浪屿濒临鹭江的东侧坞内购买大片荒地,开辟一条街道,两旁筑起一排排的两层楼房出租,并以他在厦门所开的钱庄黄日兴店号,命名为“日兴街”。

十二、创办实业

1. 中南银行

奕住借为母庆寿酬酢的机会,擘划经营一系列实业。翌年,他通过关系,前往上海拜访知名人士史良才。(时任上海《申报》董事长)由史介绍与中国银行董事胡筠(笔江)认识。胡是浙江政客江苏镇江人,曾任前北平交通银行总经理,与当时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和其他北洋军阀有联系。双方洽商筹办中南银行,预定股金二千万,黄奕住负责75%,其他人投资25%,筹办时先交款半数。

由于北洋军阀想笼络华侨,知悉黄奕住是拥有巨资的归侨,在海外素孚众望,有一定的号召力,且总经理胡筠,与北洋军政界头目颇有交情,北京政府财政部就破例准予该行发行钞票,与官办的中国、交通等银行发行的钞票,同样

可以在市面流通。中南银行钞票发行数额一千万，这样该行资金无形中增加一倍，即共有二千万。

中南银行总行设在上海汉口路，各大中城市设有分行。总行由黄奕住任董事长，每月享有车马津贴等费，他除安插排行第三的儿子黄浴沂为总行副经理外，其他都不管事。因此，总行以及分行的人事、业务大权，都落在胡筠手里。以后中南银行又与金城、大陆、盐业等银行，组成四行准备库。在厦门、香港、苏州、天津、北京、汉口等重要城市，设立中南银行的分支行，成为国内华侨金融业之首。

2. 黄日兴钱庄

黄日兴钱庄设在厦门镇邦路自建的中南银行分行大楼上，聘请戴森然为经理，月薪一百元。在钱庄界，他的工资算是最高的。

黄奕住在印尼三宝瓏经营黄日兴行，早已闻名于华侨界。因此，当黄在厦开办钱庄后，南洋一带华侨认为可以信赖，就纷纷把他们国外的游资汇来寄存，准备在家乡建筑房屋或兴办工商业。印尼华侨李丕树就曾经一次汇寄银洋三十万元。因此，日兴钱庄客户存款，相当可观，银行容易周转，业务日益兴旺。

1937年战争爆发，厦门时局日趋紧张，有人建议黄奕住加入外国籍，可以保持钱庄业务不受影响。黄的自尊心很强，断然拒绝，不肯加入外籍，依赖外人，但终因深恐一旦厦门被日帝占领，日兴钱庄必受影响而使海外华侨的存户吃亏，于是他与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筠商量，（时中山路的中南银行新厦早已建成使用，但总行仍在镇邦路黄日兴楼下）

以自己在厦的业产，向中南银行抵押借款，来支付华侨客户存款；并登报通告，凡有在日兴钱庄存款，不论定期，活期，限日领取本息，准备结束业务。日兴钱庄职工，认为老板这种做法，存户必然会来支取本息，而贷户都不一定要偿还所借款项。事实也是如此，存户一见启事，都纷纷向钱庄支领，却即转存楼下的中南银行，结果并不产生什么困难。可见黄奕住及其所创办的企业，还有卓著信用。

3. 自来水公司

1921年，厦门商会会长洪鸿儒，中国银行厦行经理陈实甫，英商汇丰银行买办叶孚光和一些归侨集资筹建自来水公司，股金110万元，每股一百元。黄奕住以“黄聚德堂”四字为股东名，每名认500股，共二千股，金额十万元，又以其子名义，每人认购100股，共占全部股份的半数以上。1923年向北京农商部注册，定名为“商办厦门自来水公司”，以月薪七百银元，聘请林荣森为总工程师。在曾厝垵附近上里村建贮水池，在南普陀附近赤岭建滤水池，在鼓浪屿日光岩和梨仔园建高抗压水库。

4. 电话公司

黄奕住亲家林尔嘉于1907年12月，在厦门寮仔后（今晨光路）创办电话公司，原名厦门德律风（TeLePHon）公司，采用磁石式话机四百门。后来日本人在鼓浪屿洋墓口（今晃岩路）设川北电话公司，采用的也是旧式话机。

1921年4月16日，黄奕住以十万元收购林尔嘉的厦门德律风公司和日本人的鼓浪屿川北电话公司两处设备，把日

本人在鼓浪屿的电话权收回在中国人手里；又以三十万元，改换美国开洛洋行新式机器，并着手铺设厦鼓海底电话电缆。在鼓浪屿龙头街建起二幢钢筋水泥洋楼，一幢为他创办的中南银行与金城，大陆，盐业合办的四行准备库；另一幢楼下租给邮政局，楼上就作为电话业务所。1923年十月十一日，厦鼓正式通话。这就是黄奕住独资经营的商办厦门电话股份有限公司。

除上述外，黄奕住还投资创办海通船务公司，购置顺昌、顺利、顺兴、顺庆等汽轮，川走内河；又投资全禾汽车公司，与菲律宾侨商李清泉等，合办中兴银行厦门分行；还拟筹建漳龙铁路，开采煤矿，后因时局动乱不安没有实现。

十三、黄聚德堂

黄奕住仿照外国大家族、大财团的做法，以部份资财存入银行为基金，取息作为经费，组织“黄聚德堂”家族机构。这个家族的经费来源，除基金利息外，还有他投资自来水公司的二十万元的股金和股息，以及房租的大批收入。

黄聚德堂不干预其他各企业的任何行政业务，仅仅处理家族内部事务、如住房修缮、婚丧应酬、家庭费用（包括生活、教育、医疗等），聘请专人职掌。早期是黄省堂，洪山仰，后期是龚鼎铭。堂址设在中德记北楼一侧靠近福音堂的路边的一座楼中。

黄奕住用人重视德才兼备，所聘高级人员，都给予高薪。如中南银行经理，自来水公司工程主任，月薪高达五百元，还有奖金，花红，总共起来，比之当时教授薪金的三百

元，超过一倍。他很少任用亲朋，也不干涉各主管部门内部的事务。

十四、热心社会公益和文教事业

一、在南安楼霞故乡创办斗南小学独资支持学校经费二三十年，不收学生学费，发给学用品。

二、在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兴建校舍时，捐助十万元。

三、设立慈勤中、小学于鼓浪屿，以纪念其母亲。

四、先后捐助巨款给印尼三宝瓏华英中学，新加坡华侨中学，爱同小学，鼓浪屿英华中学，厦门同文中学，广东岭南大学、上海复旦大学。

五、1928年，鼓浪屿中山图书馆开办之前，黄奕住提出捐献图书馆的办法：即凡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每种购买一套或一册，赠送给中山图书馆，共捐款近三万元。

六、捐助巨款救济南北各省受灾难民。

七、捐款一万六千银元。修缮宋代所建的泉州著名的开元寺东西塔。

八、成立厦禾汽车公司，开拓通往禾山，五通路线，衔接集美、五通、高崎，形成水陆联运。

九、投资上海新裕纺织公司，天津北岸纺织公司，上海德丰毛纺织公司，天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广州矿务公司，上海诚孚工厂。

十五、众望所归

奕住在海外披荆斩棘惨淡经营所获取的财富，全部携回

祖国和家乡投资，促进祖国和厦门的经济事业，赢得了海内外人士对他的赞赏。

1929年，国民政府海军总司令兼福建省督军杨树庄聘请他为福建省府委员兼建设厅长，他谦辞不受。后由陈培琨、杨树庄留榕礼遇接待，报界记者纷纷采访就职新闻。奕住与陈培琨、洪晓春三人原为金石之交。在鼓山寺以“岁寒三友”摄影留念时，培琨和晓春进一步劝他屈就，他终于婉言辞谢，推荐一位留美学者黄孟珪担任建设厅长。

1924年以后，他迭次受到政府颁授宝光嘉禾章的褒奖状。厦门商界各行业公会，因奕住兴建各项公益事业，改变市容、造福桑梓，在欢呼声中一致推选他担任市政会长和市商会会长。鼓浪屿工部局也推选他担任华方的董事。国都南迁之后，聘任他为院部委员和侨务局的高等顾问。

正当奕住感于政府和故乡各界人士对他众口赞誉，满怀激情地更想为爱国爱乡的事业，多多做出积极贡献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日寇攻陷金门，威胁近在咫尺的厦门。时局紧张，人心惶惶，厦门居民纷纷外逃。有人劝奕住加入外籍悬挂外国旗帜，以保生命财产的安全。可是奕住的民族自尊心愈老愈坚，又一次拒绝加入外籍，毅然离开厦门鼓浪屿，乘飞机转道香港抵达上海。以后长期蛰居上海，不幸于1945年6月5日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八岁。弥留时还念念不忘祖国的抗战胜利与河山光复。

他谢世的时候，膝下有儿女二十人，孙男孙女五十二人，曾孙男女九人，可谓儿孙满堂。黄奕住一生爱国爱乡，艰苦奋斗，善始善终。遗憾的是他不能多延长几个月的寿命，亲眼看到抗日战争胜利，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和祖

国人民庆祝抗战胜利的无比欢乐。他的哲嗣，目前健在的第三儿子浴沂仍在印尼经商，第十的儿子世哲、第十二子世华在美国、第九的儿子德坤、第十一的儿子世禧在香港，只有第七的儿子德隆现仍住鼓浪屿。现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的长溪同志是他的孙子。

忆巴宁

曾冠英

《忆巴宁》一文接语：丘巴宁同志是缅华文化界的一位杰出战士，他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即浴血奋战在缅华文坛上，直至他为之奋斗大半生的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二年，才病逝长辞人间。他为人耿直、爱憎分明，不论是在黑暗艰苦岁月里、或是在日本铁蹄下、或是在穷困潦倒的日子里，他始终旗帜鲜明地紧握手中的武器——笔杆子战斗。他的战斗精神和革命气质为缅华侨胞所敬佩。曾冠英同志是巴宁同志的故友，他写的《忆巴宁》一文是比较翔实可靠的。

· 林 竹 ·

巴宁，这位对缅甸华侨社会的文化，有起着进步作用的人，竟鲜为外界所知。

为了让人们认识他，兹就记忆所及，介绍其梗概。

巴宁十七岁时，他读书的学校，突然闹风潮，全校学生罢课退学。待风潮平息后，同学都重新进校念书，祇有他一人实行退学。

为了家境清淡，本来他退学后，有一位族亲答应赞助他到外地升学，后来由於那位族亲有事他往，他的升学希望也

就告吹了。一九二一年他十八岁离开原籍福建省海澄县新垵乡，途经厦门去缅甸过着流浪生活。偏在这时候，他母亲死讯传来，因此他也发发牢骚，以泄悲愤。当时在他自己的照片上，写了一首诗。

“禽兽充途鬼满邻，频年落魄此吟身！

会当独上高峰顶，白眼看他世俗人。”

其后有人介绍他到山芭教书，空闲时间学会了记账，成为后来转入商场谋生的工具。也练习书法，（仰光华侨商店店号招牌他写的不少），还经常看一些书，他喜欢看鲁迅的杂文和小说，郭沫若的史诗剧，茅盾的小说，也看外国的如高尔基、托尔斯泰作品，所以他的作品，多少受上述作家的影响。后来还向万慧法师学习拉丁文，也向友人学习日文，他曾以小霍笔名译过一篇日本武者小路笃实作的对话《贼》。

谈到巴宁写的文章，他写过杂文、小说、剧本、诗歌，並以通俗笔调写哲学及经济问题如《思想杂谈》和《经济漫话》。他用许多笔名写文章，除用筱儒及巴宁笔名较为常见外，还有曼谛，巫明、司徒尧、上官无名等二十多个笔名，他在家乡原名丘银盖，这个名字未曾用来写文章，所以很少人知道他的本来姓名了。

巴宁从山芭回到仰光去当商店书记，（缅华会计员的别称）加入了〔书记公会〕该会出版《新芽小日报》巴宁是书记公会的台柱，书记公会演出的白话剧，剧本多系巴宁写的。一九三〇年间《新芽小日报》一出版，为了开展新文化运动，巴宁以丘筱儒名字，担负起总编辑兼总经理的重任。

新芽编辑人员是：汤道耕（艾芜）、郭荫棠（郭公）、

林环岛（云涛）、吴怀世（景新）王思科（锡戈）等人。艾芜同志负责校对工作，林环岛同志还兼着管理文化促进社的业务，那时仰光华侨的精神粮食，文化促进社介绍的最多。

小日报也像大报一样，有专电、新闻、副刊。报上还有《问答信箱》，为当时其他华文报所无。小日报出版还没有几天，就举起了反独裁大旗，批评蒋介石的假仁假义的行为，因此引起了在仰光的一些国民党人的不满，而致发生笔战。小日报是摆事实讲道理，而另一方则是用谩骂、诬蔑、造谣，企图中伤书记公会诸同仁，他们以此丧失在侨界的信誉，终究无法招架。他们不甘心，利用金钱买通殖民统治者的有关人员，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汤、郭、林、吴、王诸人。並予以出境之处分。

《新芽小日报》一时失了几个助手，巴宁还是独自支撑，把报纸继续出版四十多天，后来由於印刷条件的苛刻，因而不忍痛向读者告别。《新芽小日报》出版时间虽不很长，它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它是起了在缅华社会播下了进步种子的作用，是大大地推动缅华社会朝向进步的动力之一，而巴宁的贡献是不可泯没的。

一九三四年，缅华学术团体相当活跃，有《野草》《椰风》等副刊。一些爱好文艺要求进步的业余青年跟巴宁商谈之后，成立励学社，出版《卜间》（市场的意思）旬刊，这些年青人因跟巴宁在一起，当时被看做是“新芽余孽”。

《野草》以小品文为主，《椰风》的内容是纯文艺，而《卜间》，就标榜杂文。《卜间》每期总有一篇开头语之类的文章发表，大都是由《卜间主》，巴宁执笔的。他的作品，曾被当地仰光的福建女师选作师范生的读物，《卜间》有些

文章，也曾被艾芜同志纳入他的小说《南行记》。

一九三五年八月，祖国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缅华青年深受鼓舞，就在八月十七日成立《仰光青年学会》，这是缅华有史以来的青年大团结，巴宁是该会主要发起人之一，该会会刊《明天》就是他拟定的刊名。《明天》周刊只出版了十七期，因受殖民统治者施加压力，有的怕事退会，会务慢慢停顿，其后无形解体，巴宁独力难支，至为恼火，《新芽小日报》停刊了，《明天》又停刊了，他就在《卜间》连载他那长篇创作“失败”，以泄其极端愤慨。

巴宁后来又在马寒冰同志在《仰光日报》主编的《文艺周刊》，发表关于他那篇描写缅华救运的创作没有完成，写了“关于、失败”的失败的声明，这篇文章是在抗战后第一年作出的。

一九三七年八月，巴宁与被看做是新芽余孽的诸同志和许多爱国青年，成立缅华文艺界救国后援会，他被选为常务理事。文教会成立不久，就送会员马寒冰同志回国从戎。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一日，又送许金荣等同志乘轮返国，入延安抗大学习。文教会因募捐陕北公学基金，被当时仰光救灾总会的当权者，藉国民党政府命令捐款须统汇为辞，企图迫令文教会把所募捐的钱缴交蒋政府报功。文教会以陕公基金与一般捐款性质不同，自无需“统汇”。因而引起那些人不满，煽动各华文报不准刊登文教会活动的消息。文教会的宣传刊《华侨呼声》，也被迫停刊。至此，巴宁又和一些同志，转入了王金鹤同志负责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缅甸支队，并出

版油印刊物《熔炉》。並继续公开作救国活动。后来大家认为文艺界有重新成立团体的必要，巴宁仍努力从事，扩大了组织了缅甸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文协”，並在缅甸大中城市成立分会。巴宁在总会仍选为常务理事。出版方面，接编规律周刊社的《规律》稿件的编辑和修改，多半是巴宁主持的，他的“思想杂谈”、“经济漫话”，就是在《规律》发表的。

日本侵缅战争发生，仰光沦陷，巴宁避难山芭，靠着教几个学生的微少收入维持一家大小生活，家贫营养不良，影响他的健康，但他刻苦支撑，度过无情岁月。他也曾发表於后来的《新仰光报》，消极地记述流亡的情景：

“一对愚夫妇，忽逢乱世时。

安家无担石，绕膝多婴儿。

烽火频传警，萑苻遍地悲！

楚囚空对泣，回顾欲何之！”

巴宁蛰伏山芭三年，直到仰光光复，才重返旧地，当即接受《新仰光报》的邀请，出主该报的笔政兼编副刊《三年》。他於穷愁潦倒之余，能重新从事文化事业，也从而振作起来，他在《寄友》的那首七律写道：

“旧雨相逢悲乱世；穷愁无奈到中年。

家贫儿女偏知饿；满腹文章不值钱！

范子逃亡甘入秦，苏卿守节愿吞毡。

感君知己拳拳意，好教他时着祖鞭。”

假如当年巴宁也同着艾芜等同志一道被押出境，以他的写作能力，至少在祖国文坛也可以和艾芜有着同等发展的机会。他继续居住缅甸二十多年，为人平易近人，爱护与奖

掖用功的青年人，他告诉年青人学习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並要有韧性的战斗耐力，对邪恶则口诛笔伐。

中国人民翻身了，巴宁的精神更为振奋了，正想再干一番事业，没想到就在这时候病魔老是缠身作对，天不假年，於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一代缅甸文坛巨子去世了，终年仅四十七岁。在缅甸他第一个棺木上盖有五星红旗，（按第二个是曾顺延烈士，可谓极尽殊荣。时人有不计工拙在报上写吊联。联云：

“躯壳离去；一杯黄土。

革命精神，永在人间。”

回忆“时光社”

吴雪痕 林纯仁

厦门“时光社”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曾为厦门文坛起了一定的革命作用。

记得一九二五年的春天，符护身等在霞溪街林同隆的住宅，杂凑了一些响应新潮流的青年作话剧的演出。演出的剧本，是用当时陈涤虑所写的《我的心肝肉儿》。这个剧本，护身等曾在禾山的云梯中学，和该校附近的枋湖乡演出过。这个剧本内容，是描写封建家庭的黑暗，揭露当时新旧潮流的尖锐矛盾。这是作者陈涤虑的现身说法，因为他的婚姻被其母亲包办，夫妇毫无感情，造成他一生痛苦。话剧演出后，博得当时男女青年的同情。演出剧社叫“时光新剧社”。演出后，有人建议实现剧社的组织，结果没有组成。这一个希望直到护身在武荣中学毕业后才实现。护身在武荣中学念书时，每个假期都召集同学出版校刊，大概出过两集，刊名是《秋月》和《晨曦》。

一九二七年四月以后，护身等看到国民党右派分子李××等同漳厦海军警备司令林国庚和各方面反动势力勾结，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罗扬才等同志不幸被捕，为党牺牲。乃邀集一班人，在《全闽日报》的副刊，出版了不定期刊物。刊名是《微光》，由“时光社”出版。《微光》出版五期后，

参加的人逐渐增加，最初是七个人组成。分工是两个编辑，写稿和校对则由大家负责。出到十期以后，人又增加了很多，曾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为了掩人耳目，“时光社”改为“时光学社”，内分剧社、球队、口琴队等组织。当时的社员增加到五十多人。

这时的《微光》编辑由护身、许栋梁负责，后来改由高云览、陈以专负责。《微光》出版二十期后，二十一期扩大到全版，大家认为《微光》名称不适合，乃改为《朝露》，以符合新时代潮流。《朝露》每期有一篇序幕的献诗，这在当时各报副刊《芳草》和《飞翔》都是没有的。《朝露》出版后又在《思明日报》出版了《彤云》。出了两期，因为《思明日报》要钱，才不得已停刊。

一九二七年的厦门，虽然蒋介石叛变革命，国民党屠杀共产党员，但是厦门文坛的气象并不因此而受影响，还是起了很大的变化，原因是受了上海“创造社”新兴文学旗帜的影响。一般青年和大中学生，看到国民党压制舆论，屠杀共产党员的客观事实，思想上产生重大的转变。当时“时光社”出版《微光》时，“芳薇社”也出版《芳草》，附在《江声报》的副刊上。还有“飞翔社”出版《飞翔》也附在《全闽新日报》的副刊上。十三中学的《红旭》和《掀潮》等都在这个时期出现。因为当时厦门的新文学在沉寂的鹭岛掀起了阵阵涛声。可是缺点也是有的，如《是耶非》和《同安创作选》等都是为文学而文学的。当时与“时光社”唱同调的有《飞翔》、《掀潮》、《火花》和处女社的《处女》，以后《微光》改为《朝露》时，就有它的作者参加“时光社”。我还记得，在这个新文学刊物象雨后春笋般出现时，为着捉

获文坛扒手，在当时文坛上也发生了几场恶战，並因为冤家打成亲家。象当时的《芳薇》和“飞翔”两社，本来是与我们《时光社》对立的，后来他们知道高云览在编《商报》副刊，士珍、絮絮、幻铃竟和云览到《时光社》来。后来连《掀潮》、《红旭》的同志也都与我们有了来往，和从前对立的形势完全不同。

当《朝露》出刊到三十期以上时，“时光社”有的社员因思想觉悟提高而走上革命道路，有的为个人生活而到处奔波。《朝露》就一期不如一期了。继《芳草》和《飞翔》停刊以后，《朝露》出到四十多期也停刊了。停刊原因是宣传马列主义比较露骨，《全闽日报》受到国民党政府的警告和申斥。该报曾将警告和申斥给我们看，我们不得已才停刊。可是我们的一些不怕死的同志，还在继续努力。当时各报，曾出现一二次《鬼火》和《铄星》等副刊。董农华编的比较温和，在《思明日报》副刊出版《绿洲》。他们都是“时光社”后起之秀。

当年“时光社”的集合场所，是在厦港火仔垵“寿山学校”。社员有的是该校教员，有的是该校代课教员。大家做着共同的工作，过着共同的生活，当该校发放薪水时，大家就进行聚餐和开展各种娱乐活动，大家意气风发，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很受鼓舞。后因栋梁写的文章太露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寿山学校也受了警告，校长吕春修怕受累而下逐客令。当时纯仁在鸿山寺“闽南佛化新青年会”工作，张芝英等口琴队就转到鸿山寺去。云览、护身先后到南洋去。雪痕等也转去南安教书。张芝英改名张德秀在《思明日报》当记者。陈以专在《江声报》当记者。杨浚泽在《商报》当记

者。吴沙零也转到报馆工作。以后，高云览写了《小城春秋》，解放初逝世。张芝英到漳浦活动，为党光荣牺牲。许栋梁在厦门沦陷日寇时，到《同安日报》工作，在三秀路被日机炸死。陈醒鹤为国民党政府拘捕七次，最后一次在三元监狱病死。吴沙零在解放后因被划为右派后“文革”初期被斗而跳井自杀。董农华因病逝世。现在回想当年“时光社”许多同志的革命热情和后来的坎坷遭遇，真是感慨万千！

三点会在同安马巷

陈延庭

明季郑成功於1646年因其父郑芝龙在福州被诱降清，隆武帝移驻汀州，旋被清兵所掳，乃移师南下，保有漳泉二州和厦金两岛，从事抗御清兵，随即於1650年九月出兵收复广东潮州城，声势颇壮。明鲁王和其从事光复的旧臣，自舟山群岛移驻金门岛，共相赞襄大计。1655年其部下大将黄语，受清军的诱降，举兵叛郑，断绝漳潮二州的领地。郑成功愤而攻下海澄城，掳得黄语，焚戮之以洩愤，並示戒於众。旋於1657年8月率兵攻浙江台州府，越年五月略取平阳、瑞安两县城，呼调浙东诸义军奋起，共同攻击清兵。后受张苍水等的建议，谓欲举大功，恢复明室，必须出师长江，窥取南京，传檄长江两岸民众，必能使忠於明室的父老奋起，率其子弟义兵来响应，共同讨伐，襄助大计。乃於1659年7月自率偌大舟师及数万师旅，北进长江，攻取瓜州，窥取江宁。不料长江左右的民众，並不如张氏所幻想的有许多义军揭竿而起，牵扰清兵后方，形成两方夹击之势。而是袖手旁观，形成孤军深入，粮秣难继，京口一役，大将甘辉死之，损兵无数，潜师於镇江，而返厦门岛。

因此郑成功下定预言，欲从事恢复明代的社稷，须要有严密的“一粒民族的种子”即秘密会社的组织。把这思想深

藏和团结於军兵和人民心中，才能有固定的自己的主力军，並且才有自己把握的地方军，乃能达到恢复的希望。于是援引朱元璋的洪武帝号，称为“洪门会”，以“反清复明”的主旨。凡是入会的均是道兄弟辈，其中秘密事项，绝对不许宣扬於外人，以巩固其同一意志和统一步伐。惜他於向荷兰侵略者恢复台湾岛以后，越年五月即以壮年逝世於台湾岛，不及见“一粒民族的种子”的发展。

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有戴名世者詠“紫牡丹”诗中，援引四书中的“恶紫之夺朱也”和谚语“牡丹为百花之王”中的一联是“夺朱非正色，异种亦称王”。为谄媚清代的臣子所讦发，自是掀起雍乾间的文字狱，诛锄半中国。凡是文件含有朱明洪三字的，均为满清辑捕的对象，为避免敌人的注目，即取洪字的起笔三点水，改称为三点会，为更加深入民间而扩大其组织。1853年五月间，同安灌口的“小刀会”即三点会的一分系，由马庚、黄伍、黄志信等聚集会众数百人光复厦门岛上的政板达六个月之久。同年十一月厦门为清兵所收复，会员几尽被诛戮，有的会员奔至南洋群岛。在新加坡的，分裂为两派，各以其所住居的地址，对外称为“我兴”和“建德”，以号召其会众。因在殖民地的政治环境中，反清复明的思想逐渐淡薄，乃改为联络贫穷人为兄弟，對於有资产的抱有仇视的心理，有时加以掠夺或杀害，成为社会上的一派势力。但因两系不能团结，时常冲突，引起英殖民政府的积极镇压，故此时兴时息地秘密维持下去。其中以义兴会的主持者“乌脚令”，较为严肃公正，会众信服其为主体。

1923年四月奉军廿四旅旅长王永泉自江西入闽，驱逐北

洋军阀李厚基出福建，代其主政。王欲统领全闽，派其团长傅席珍率队到马巷驻扎，窥伺厦门，並袭用北洋军阀的伎俩，在马巷派收烟苗捐以自肥。其士兵因语言不通，对於农民商户甚为暴虐。适有自厦门返马巷的商人陈剑经，因为献媚於傅团长，遂继续组织马巷商会，自任会长，供给军队以各种军需。他自恃有傅团长为靠山，对已任马巷烟苗捐处长四年的东坑洪春如，当面侮辱，夺其地位。洪之乡人洪印心怀怨怒，倡设三点会，召自南洋回国的潘涂林做“军师”（参谋）遍招会员。每一个入会的，须缴纳会费四元五角（由炉主、军师、看门分享）。因反清复明的口号，不适用於民国时代，乃改为劫富助贫，诛锄异己，所有入会的人，不管是祖孙或父子，均称为兄弟。其入会的仪式是聚合数十人，在乡外的荒埔上开会，叫做“开香”；中间写着“洪门老祖”即朱洪武，前燃二根蜡烛，供着一盆清水。凡入会的人，第一次须钻进刀门，即行宣誓：自此以后，不向外人透洩会中秘密，犯者受着宴诛並要被昆第杀害；然后跪在洪门老祖的炉前听军师即僻语为“群”的宣读此会的宗旨，和其他僻语和禁忌、迷信及其进行手段；然后刺取指血放在清水盆中。入会者均要饮一杯，这就叫做“出生”即入会完竣也。若是富户或经会员的指摘不许入会者，即须由介绍人代为说项，备多金供给会中，名为“插炉钱”始许入会。因此林在我在马巷获得多金，即返潘涂，在同美汽车路的东侧红墩建筑一座二落双护的华丽大厝。林氏去后，接任者系自新加坡回国的洪厝洪文胃。徒众既多，事端频繁，昔日黑夜抢掠，现则在光天化日之下，聚众临村劫掠。洪塘的新厝村人被掳；溪边前村被其掳去男孩和牛只等。这两村的民众，

即四散逃居，而荒废其村。到1925年夏间，进而攻打大宅乡，抢掠陈要的布店，乡人鸣锣声援，越日即有数千徒众临乡攻打。该乡五六百人，受其抢掠，一时散而之四方。所以驻马巷的北洋军阀周荫人部吕树棠营长，接该乡的控诉，带队到吕塘乡搜捕洪匡勉、胡涂豆、叶浅、叶安等四人，置之於法。因之他姓和别村，均觉不安，巷西数十乡遂实行自治。巷北一带有股会之盟，各以保存该村的安全和财产为职责。而巷南各村，遍有徒众，不事农耕，日以攻村劫舍为事。到了冬间，地方扰乱，治安堪虞，民不聊生，村无宁日。所以驻马巷的营长张文魁带队到后村、新店等乡，逮捕郭琴堂和洪姓数十人，以儆其馀，器风略静。但各村的家长假辞退盟，备款赎人，后仍纠集各村的盟员教百人，持械肩枪於十二月十六日，进至马巷市郊，意欲包围市区，驱逐部队，抢掠商店，饱分资财。营长张文魁得巷西北的声明和保证，不参加徒众的扰乱行动，使张得以专力对付巷南等乡的民众。在三培仔口对抗，双方枪击一时，因枪械不敌，徒众有的失火受伤，三点会挫败，退回原村。

越年国民革命军起於广州，北伐中原，路出福建，民心转向，军阀徐肇，闻风而溃，会社联盟，消声匿迹。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民得安居、鸡犬繁育，前后相比，有如隔世。嗣后民众心怀盟誓、思想上不能解除，行动上有所顾忌，尤其家属们更为着急，惧为宴诛。不知何人倡议，自1927年起，每年值十一月十七日城隍诞辰的前后旬日间，男妇都到庙中，备鸡蛋线面在神前，请庙祝代祝，借以解誓，以慰心愿，而释思想上的负荷。庙祝得到一笔意外的资财收入，称为三点会徐风之所赐予。

闽南佛学院之创设和经过

觉 星

一、闽南佛学院的开办缘由：

南普陀寺在一九二一年转逢和尚为住持时，感觉子孙承传制度，流弊很多，毅然改为十方丛林，选贤住持，一切规则均依浙江宁波天童寺十方常住的规约章程实行。及至事已实现，他才安心自慰引退让贤，由寺中公请会泉法师为本寺的首届住持。以闽南佛教，道风虽善，而研究教理者极少，当时国民党统治时代，企图没收寺庙财产，兴办学校之风声，响彻全国，厦门市国民党部甚至提议标封南普陀寺之意图。会泉法师坐卧不安，焦虑非常，临时招集厦鼓各寺住持会议。众意以为自家创办佛教教育，培养僧材，是当务之急，徵得转逢、会泉二老人之同意，又因处在新形势和新潮流的冲击，非办僧教育就不克振兴佛教。遂派广津、瑞徵二师到江苏安庆佛教学校请常惺法师来厦门，负责开办闽南佛学院事项。当时由会泉法师任南普陀寺主持、常惺法师负责闽南佛学院院长一职。就於一九二五年秋开学（教务、事务由觉三、广津等法师助理之）。当时的学僧籍隶江南的居多，岭南和闽南的较少，共七十四人。因为学僧程度参差不齐，才分为专修部和普通科部；还有小学程度的，就将这一部分人转到漳州南山寺办的佛教学校去就读。当时也有和尚参加教学，例

如：达如、顺吉、观海、观平等八人，因一九二六年间红军入漳州时，就参加红军去了。解放后陶铸同志来寺中曾向会觉法师查问“达如”等人之下落。

当时第一批的教职员有常惺、蕙庭、觉三、达如、自安、满智、粹华、广箴、叶长青、丁山、邵尔章，以上是厦门大学教师；还有藏贯禅是第一届教师。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二年，因会泉法师三年任期已满，引退后才请常惺法师去迎接太虚大师任南普陀寺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

第二届的教职员有：太虚、常惺、转逢、觉三、大醒、芝峰（以后还俗在中国佛学院讲课，改名为石鸣珂）笑溪、亦幻、寄塵、广津、含虚、谈玄、慧童、宏渡、度寰、墨禅、但怀、映霞、西莲、默如、宝忍、戒德、应体。陈定谟（自然科学、伦理学教授）、徐诵光（英、算、社会学教授）、神田惠云（日本西本愿寺）教日语。

一九三〇年又毕业二十人，选十人进入研究部，由芝峰任研究长，大醒为副研究长。研究员：宝忍、宽苍、默如、西莲、华清、慧童、戒德、今怀、心道、道闻十人。

一九三三年夏天，太虚大师第二任期满后，再请常惺法师继任南普陀寺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教职员也有更动。

院长常惺法师。教师：寄塵、觉斌、戒德、静贤、默如、寂颖（日语课）、窥谛、止安、雪生法师等。虞愚（教伦理学、国文、常识）、神田惠云（教日语）。

一九三六年，常惺法师这一届任满，要召到南京担任中国佛教会重要职务，才再请会泉法师继任南普陀寺住持。会

泉老法师因在万石岩开办佛学研究社，无法分担兼顾，请性愿法师代住持兼院长之职。

住持人会泉法师兼授大乘起信论，代住持兼院长性愿法师兼授楞严经，守一法师任教务，教师有慧云（授佛教史）、慧童、仁性、仁开（授佛学课）。这一期没有日文课，因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入东三省，各地战云紧迫，以后国民党军一五七师占住南普陀寺，学院到夏天被迫停止了，大部份教师、学员都星散，性愿法师应聘到菲律宾。南普陀寺会泉法师重挑此任，内外事务由瑞枝监院担任之。因为南普陀寺尚有基本金白银二千元。一五七师得知后，逮捕瑞枝监院，诬他为汉奸，就在今之蜂巢山下华侨博物馆界内枪杀，抢走二千元银元，给南普陀寺僧众带来非常困境。

当时办学院的经费来源，大部份是由南普陀寺香火、添油、捐献、经忏佛事及养真宫部分香火收入。学僧考入学院时，膳宿学杂费，书籍费都由佛学院供给，学员每人每月可领取二元作为零用之费用。这时都无收入，只好停办。

闽南佛学院自一九二五——一九三七年，经过十二年的时间，培养学僧共二百余人。有心来下种不怕无收成。它是一个大冶炉，所锻炼出来的人材，遍及海内外，大都成为主要寺门的栋梁。弘法人才，确为中国佛教里的一个学府。

二、当时佛学院对学僧之教育目的

（一）思想：认识佛教为人生之唯一归路，认识佛教为指导民众之佛教，应该为社会谋利，做济世事业；打破一切封建思想，根据佛陀的“慈悲喜舍”的精神，建设合时代及人

生需要的新佛教。

（二）行动：养成有目的、有方法、有步骤的行动，破除自私自利安乐尊荣个人把持地盘（寺院）的恶习，养成“和谐相聚”，有纪律的团体（即僧团之义）。

（三）生活：革除旧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之懒惰习惯，养成“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勤苦”的生活；锻炼刻苦耐劳的体魄，做“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劳动工作。

並定章程十八条，共住规约二十一条，礼堂规约十五条，自修室规则四条，门禁规则四条，会客规则三条，告假规则五条。劝惩规则：记功四条，记过二十八条，功过之赏罚四条。出院十五条，礼仪六条。严格地，培养优秀的僧才。

三、日伪时代复办的闽南佛学院

一九三六年全国进行抗日战争，教南佛学院就此停办了，学僧避难四方。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二日厦门沦落于日本手中。他们就利用日本僧人，台湾僧人，台湾浪人，汉奸等人筹组“佛教青年会”，后又改名“大乘佛教会”。筹备人有：日僧神田惠云，日人藤泽教师，台湾人辛慧音（辛清波），施范其，和尚有觉斌、慧童、伪维持会长张鸣，於一九三八年九月一日在东本愿寺内开成立大会。当时人选议决如下：名誉会长：谢长祺，顾问神田惠云和觉斌。会长施范其，副会长蔡慧诚，庶务部长辛慧音（辛清波），教化部长释慧童，计划部长马乞经（马乞骅）没有参加，由周鸣志代理。社会部长林川田，妇女部长吴锁云，宣传部长释广印，会计部长陈春亭。

他们第一次首先创办“佛化小学”，並筹备“复办闽南佛学院”得到伪市政府李思贤，兴亚院日官庄司部长的同意和拨款照办。派觉斌前往上海聘请大醒法师莅厦为院长，掌理一切；又向华北、华中方面招募高中毕业程度之僧青年二十四名；並在广东汕头及本市招募优秀学僧九名，共三十三名入学。

学僧有：圆明、悉明、照明、大云、六念、宗如、仁俊、宏悟、了明、大根、果证、冶愚、圣缘、贤悟、演藏、通摄、能静、绍融、高严、惟解、照宽、能忍、宗密、志贤、妙解、灵光助吾、绍通、瑞绿、开泉。

教师：会觉、文涛、块然、慧童、宏宽、印明、日语会话神田惠云、日语佛经岩崎闻号、日语文法野川三郎（兴亚院院长）。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五日在南普陀寺举行开学典礼那天参加出席的有：

日本兴亚院厦门连络部官代表庄司政务部长。总领事代表，石川付领事土屋。

陆军机关长：田中，

调查官：铃树丸尾，

囑託：佐佐木，横山中野；副所长：佐野，

共荣会主事：木村，野村教谕。

《全闽日报社》社长泽重信。

日伪市府人员代表：伪市长李思贤。

教育局长：张重信

建设局长：卢用川

财政局长：金馥生

还有张各局长，刘高等法院长，萧部长。

张秘书、陈科长、陈股长。

大乘佛教会长施范其，和厦门诸山负责人。因为一九四一年日本发动珍珠港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学僧无心就读，草草二年就第一届结业了。而大醒法师也因事返上海去了，不得已就再筹办第二届的佛学院，定名大学预科班。适因会觉去日本东京，由日僧神田惠云陪同参观，来到上海就再招收学僧十六名、厦门二名、汕头一名，又招收在家教徒六名，共二十五名，办到一九四五年春因日寇投降而告终。

当时的教职员名单如下：

院长：释会觉；教务主任释文涛兼教佛学（天台宗）；佛学教师慧童教印度佛教史，大小乘佛教史；宏宽法师教大乘起信论；圆明（第一届学僧）任监学兼教净土大意教师，日语教师神田惠云，佛经日语教师岩崎闻号，日语文法教师野村三郎。国文教师：前是杨少东，后是王云峰。还有一位体育教员黄××（忘其名）。

这一期的经费来源，是由大乘佛教会每月支来伪储备券八百元，分给教师月薪，学僧每人每月二元作为零用费，三位日语教师不领月薪。

复办闽南佛学院第二期的学僧及学生二十五名。学僧：了愿、世通、普瑛（杭州佛协工作），月现（解放后参干），有成（宁波佛教学会）、今行（福建省商业厅储运股，文革时下放华安未调回）。性学去台湾、明扬被日本诬为爱国者，坐牢被迫害死，觉星（市佛协会工作）。还有，了然，另有五人，忘记其姓名了。

学生：有在家教徒学生：林锦宗，曾在厦禾民办中学教

书，以后在一小学教书，现已退休。林敬济：日本投降后去台湾任育哑学校总务，不详其情。林金虎，现在星加坡，法名德仁，听说行医又教书，参加佛教居士林青年部工作。李清泉，至今未婚，现为深田内服装厂职工。还有一名已忘其名，查已死亡很久了。

在这短暂的时间复办闽南佛学院，也取得一点成绩，解放后在寺门中社会上也有点表现，但在立场观点上个别的也有背道而驰的。

“四人帮”倒台后，党和人民政府落实宗教政策，关心佛教未来之继承人才。赵朴初会长也重视再恢复闽南佛学院之举。省宗教局、省佛协都关心这一件事。因目前南普陀寺里面有一东澳小学未迁出，政府已拨给五十万元另行买地建小学，现只好先恢复弘一法师所倡办的“佛教养正院”，培养基础人才共五十多人。现在闽南佛学院又再开办了。分男女两班，男班在南普陀寺上课，女班在万石岩上课，经费由新加坡宏船法师负责一部份。

日伪时期的厦门基督教

张子叔

一、日本基督教访问团访厦缘由

一九三八年五月厦门沦陷不久，日本基督教即派来“访问团”。“访问团”团长为上与二郎牧师，团员有日本真耶稣教会的须田和日本基督教青年会一个干事，由台中基督教会牧师刘振芳担任翻译。

日本基督教访问团来厦后，住在施耐劳家。他们即刻召集厦鼓教牧人员开“座谈会”。开会地址由陈秋卿牧师向美国传教士卜显理商借“国际救济会”办公室客厅，但遭卜显理的拒绝，最后只好假鸡山路英国伦敦会洋楼客厅作为招待地点。日美教会矛盾由於政治关系初见端倪。

开会时，上与二郎首先查问谁是国民党员，然后大讲“中日亲善”，並说“东亚人的事要由东亚人自己管理，我们都是东亚人，厦门教会要由东亚人负责，无须外人干预”。接着又宣传说：“大日本皇军为打圣战，站岗放哨，不分晴雨日夜，非常辛苦。这样，老百姓经过皇军的岗哨，向皇军鞠躬敬礼，是对皇军的敬意和致谢，只是礼貌的举动而已，大家应当没有意见才对”。极力为日本的侵略行径辩护。接着，日寇又下令教会在聚会前不能敲钟，说这是“高音响管制”，免得有人以“钟声”与外边联系。他们的这一套，说

穿了就是要严密监视和控制厦门教会，为他所用。

二、配备日本教牧以图控制厦门教会

日本兴亚院文教部的中野是日本基督教牧师。他在厦门基督教会中大肆兜售所谓“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的货色。后来从台湾把庄丁昌等人调进厦门，在厦门市成立“日系”教会，其人事和一切活动都服从兴亚院的调度。

一九四一年日本侵略者正策划发动太平洋战争，扩大战火，向东向南进犯。兴亚院把日本牧师大川正夫妇从台北神学院调来厦门市。其目的有二：一是控制和利用厦门基督教会，二是以厦门为跳板向南洋扩展。大川正说过：“我的目标是南洋群岛，我到厦门是为打开南洋这把锁准备钥匙”。

大川正夫妇受兴亚院的“囑託”，一方面大搞“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东亚新秩序”，另一方面严密控制厦门基督教会。如厦门教会在银行中的存款须经兴亚院的中野和大川正的批准方许办理提取手续，以图从控制厦门教会经费入手进一步左右厦门基督教会活动。

大川正还组织“厦门基督教联合会”，用“以华治华”的手段来进一步控制厦门教会。起初大家选举台籍牧师庄丁昌为会长，因这不符合日本侵略者的意图，未得大川正的同意，只好另选杨怀德老牧师为会长，以实现他们“厦门牧师管理厦门教会”的图谋。

为笼络社会上的“高等华人”，大川正於每星期日下午在鼓浪屿国际礼拜堂举行英语礼拜，他亲自用英语“讲道”，以扩大日本在社会上和“高等华人”中的影响。他们还用小恩小惠的手法拉拢厦门市教牧人员，如有一老牧师生了病，大

川正派人用布床把他送往日人办的博爱医院免费治疗。用大川正自己的话说：“西洋人做得到的事，我们也做得到”。

“教会的人过去长期对西洋传教士很有感情，我们也必定要做到中日很好地亲善，树立中日更加亲密的感情。”

大川正很注意青年教徒的工作。他利用沈省愚夫妇在青年中的影响，叫他们在青年基督教徒中展开活动。一九四二年夏沈省愚夫妇在大川正住宅举办“第一届基督教青年夏令会”，一九四三年夏又在怀仁女中举办第二届夏令会。大川正夫妇特请兴亚院文教部的中野到会“训话”，与会者必须端坐肃穆地听训。中野大讲所谓“中日友邦”、中日亲善，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大东亚新秩序”。大川正装出很关心教会青年的样子，用精制的点心，可口的饭菜招待。按当时厦门的老百姓生活是很苦的，每人每月才配给二斤碎米，而大川正的点心和饭菜却使一些人“念念不忘”。大川正又指使沈省愚夫妇搞“厦门基督教青年团契总集礼拜”，要他们只顾“灵修”，不问政治，过修道士式生活，以便更好地做日本的“驯服羔羊”。

大川正在他的家中每年还举行一次厦门教牧长执“联合退修会”，以窥察他们的动向。有一年夏天，日本副领事丸尾从南洋回来，大川正下令所有教牧人员必须到他家听丸尾“报告”南洋情况。天气很热，大川正却不许大家煽扇子，以示对领事官的“尊敬”。丸尾在讲话时大讲“皇军圣战”的“威力”，並说“南洋侨汇不久可通”，“厦门一定繁荣”。为日军侵略辩护。

三、派来台籍牧师为日侵略效劳

一九三九年以后，日本侵略者先后从台湾派来两个台籍

牧师，一个是台北教会的庄丁昌，另一个是台南教会的赖炳炯（后来赖主要在金门一带活动）。

庄丁昌来厦后，在内武庙街办了一所“日本东亚宣道会厦门教会”，受日本兴亚院文教部的中野和大川正指挥。为掩人耳目，庄丁昌旋即把“日本”两字去掉，又精心地在“厦门”两字后面加上“中华基督”四字，便成了“东亚宣道会厦门中华基督教会”。而该会的印鉴则是“内武庙中华基督教会”，把“东亚宣道会”五字也去掉了，更是别出心裁，老谋深算。当时，不管那个教会的信徒或慕道者均可来此礼拜、聚会，以“共同事奉独一真神”为名，扩大他的“日系”势力。庄丁昌本人还想方设法到厦门教会信徒家中探访，参加他们的“家庭聚会”，扩大活动范围，说什么都是“一家人”，大家“都一样”。庄丁昌有时还身穿和服，手执拐杖，到郊区农村“布道”，并把情况随时向中野汇报。

庄丁昌的教会只在星期天上午聚会，下午庄氏则轮流到别的堂会参加“礼拜”，美其名曰“听道理”、“受造就”，事实上到各教会去刺探情况，监视各教会的活动，以便把各方面动态报告兴亚院。

“家庭礼拜”本是基督教的传统习惯。当时较有名望的信徒家中常举行“家庭礼拜”。原大乘佛教会妇女部长吴锁云家也搞“家庭聚会”。在她家聚会时常有花生汤、日本芝麻、甜包等招待，吸引信众，因此到她家聚会的常有五十至六十人之多。庄丁昌对“家庭礼拜”是很感兴趣的，不管是厦门教徒或台籍教徒的“家庭礼拜”，他往往去参加，以更能起到“临监”的作用。

按吴锁云在抗战前及抗战期间在厦门开新南旅社，贩卖

鸦片、军火，“七·七”事变后回台。日军侵占厦门后不久返厦，在升平路弄到一座大楼（现团市委），在那里集合一些和尚、尼姑，天天诵经礼佛。后来在日人指使下，突然“信主”了，在庄丁昌手下受洗入教，并在定安路购得一栋楼房（现思明区委所在地），扬言“得天父指示要在这里建一礼拜堂”。为此，她在这新住所盖了一个可容几百人的大厅，办起了“基督教女徒灵修园”，凿有“灵修园”石碑，建立一个“家庭教会”，把在庄丁昌教会任传道的许××拉来这里当传道。吴锁云常请厦门各堂会的一些牧师、传道来“灵修园”讲道。她利用小恩小惠的办法，如设茶点、送红包等吸引信众，特别是青年信众到她家“灵修”，鼓吹“超政治”、“纯属灵”，叫大家“服从天父的安排”、“忍耐今生的遭遇，追求来生的永福”。说穿了就是要大家服服贴贴忍受日本侵略者的奴役。吴锁云活跃于佛教和基督教之间，既在大乘佛教会中任职，又搞基督教“灵修园”。有一次她请客，一桌是佛教界，另一桌是基督教界，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庄丁昌在内武庙教会中大搞合二而一。到他教会礼拜的台籍教徒和厦门教徒各占其半。兴亚院日人中野也常去“礼拜”。庄氏公开宣称：“你们厦门教会喜欢搞这堂那堂的分别，彼此少有来往。我们就不爱有这样的分别，不论谁来参加，我们都欢迎。大家都是一家人嘛”。

内武庙教会的长执不少是跨堂的。庄丁昌把新街、泰山、关隘内等堂会一些长执拉到他的教会兼任长执，说他们本来就是“我们”（指日本人）的人。他又把台籍长执分插在厦门的一些堂会中，这样，中野、大川正、庄丁昌对厦门教会的情况就更加了如指掌了。

庄丁昌特别注意在青年中发展势力。他首先想法把三一堂歌颂团的名指挥和教练请到内武庙教会领导歌颂团，这就把厦门一些堂会的歌颂团和青年信徒吸引了过来。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青年团契”。他把沈省愚夫妇请到“青年团契”担任名誉顾问，常去主领“青年团契”活动。“青年团契”主席是王宝玉（往台）、副主席林雪娥（往港）。凡到内武庙教会来的教会青年，都须登记姓名、住址，说是要加强“联系”，其实是要固定地把他们拉到内武庙教会来。庄丁昌对服务於其教会的主日学教员（王宝玉兼校长）也很“优待”，每逢节日常给他们送红包，以便通过他们拉拢青年信徒。

为扩充势力和影响，庄丁昌每逢春节都举行一年一度的“布道大会”。如一九四二年春节前夕赖炳炯从台来厦，庄丁昌与中野商定布道大会，由赖炳炯与许××主讲。会上，由赖炳炯讲“神救恩”，许××则讲“人犯罪”。厦门有的教牧各自带着自己的教友、慕道友来赴会。庄丁昌和中野在会上大讲“中日合作”、“中日亲善”，影响很坏。有的信徒说：“日本人也不坏呀，灵性供应很丰盛呀”。庄丁昌的教会起到日军用枪炮起不到的作用。

四、厦门设教百年纪念会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四日闽南大会常委会於厦门小走马路基督教青年会召开。厦门区会提议“基督教传入厦门至一九四二年适足一百周年，於今后五年中，我教会应将福音普传於闽南各城镇各乡村，务使家喻户晓，俾届期举行纪念，以此为礼品奉献主前”。这一提议得大会常委会赞同。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第十七届闽南大会在同安县双圳头启悟学校举行。厦门因受日军侵占，教会亦受管制，未能派代表出席大会。

百年纪念会於一九四三年一月三日星期日在双圳头礼拜堂召开。上午由会正益和安主理崇拜，黄卫民演论教会之地位与使命。接着由吴炳耀简述闽南教会开设与发展。然后由各区会代表报告五年来的工作进展情况。下午由会副许声炎讲前代教会建造之基础，继由礼振铎主领圣餐。晚上在礼拜堂开感恩会。厦门设教百年纪念会通过了“闽南教会第二世纪开始五年推进计划实施细则”五条：第一条推进宣教事工；第二条推进教会自养；第三条推进教会工作训练；第四条推进培植儿童青年事功；第五条推进教会干部组织。按这次决议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如第二条自养问题规定：“甲、各区会应负责督促该区各受补助教会筹备自养。泉厦漳惠及北溪各区教会，应於一九四四年完全自养，其无力教会，尚须补助者，由该区有力教会，自行想法补助。汀州、永德大两区会未自养教会，亦应尽力自养，並自一九四四年逐年减少所受补助，至一九四七年完全自养。乙、请西公会将补助传道公会款项，於一九四四年以后，每年拨出一万元为大会延聘干事经费，其余款项全数用为各区垦荒布道、或新设支会之用”。由此看出，闽南各区会还是要接受西差会经济资助的，不能达到完全“自养”之目的。

回忆日本侵略厦门的罪行

廖昆维

日寇如何利用流氓大量走私

日本对中国，不但在军事、政治、文化方面进行侵略，在经济上也用尽阴险手段进行侵略。其侵略方式是走私。因为既可逃避关税，又避免烦琐手续，货物随到随售。所以流氓很有兴趣而乐为之。这类流氓部份是台湾浪人，也有少数本地人，他们多数开店铺。私货价格比较低廉，很容易出售。有的事前出售期货，随船直拨汕头、香港。一个走私户的营业数字比本市“郊户”更多，其货品种类有呢羽、百吱、布匹、味素及鲍鱼、沙丁鱼等海产品，日用杂货也应有尽有。以上货品都由台湾运来。运货船只是大阪商船会社（公司）的二艘。每星期日由基隆出帆，星期一晨到厦，同日下午三时开去汕头，星期二早晨抵汕，同日下午四时开往香港，星期三到香港；星期日由香港开帆，星期一到汕头，星期二又到厦门；同日下午二时又返基隆。由港走来的私货是欧美的呢绒、百吱、高级罐头、烟酒、洋参、燕窝、杂货及其他药品、毒品等。另有一部份浪人专门走吗啡、鸦片等麻醉品入口，又将白银黄金私运出口。这一类的走私贩要比一般走私贩较有资力和势力，才能做得到。日本对华经济侵略是有计划有步骤的。航行的起终地点是基隆——香港，同是星期日

开帆。由香港开帆，星期二可抵厦门。这艘船是要便利星期一到厦门的走私贩隔一天就能回到基隆。星期三到基隆的走私贩有这三天的准备，星期日的船就可再运私货来厦门。可见当时日本对华南的走私重点就是厦门。当时虽然有海关及缉私船，但是海关人员常被走私者殴打。除基隆出帆的两艘以外，高雄、淡水在需要时也常开帆到厦，另有无数的帆船专运私货到内地沿海小港，如遇缉私船时就双方开枪火拼，双方时有死伤。以上的罪行完全是日本造成的。

日寇如何以华制华（在台湾、厦门地区）

中国是世界大国。日本欲称霸于世，必定灭亡中国。他们在东北以满洲为中心，在华南以厦门为重点进行侵略。台湾爱国人士前仆后继、掀起不断的抗日运动。他们就利用不顾民族的利益的台湾败类作为鹰犬，经常逮捕抗日的台湾同胞，如能破获抗日组织的人就会升官发财。当时在厦的台湾流氓都是在台湾犯罪，日本要逮之入狱的人。他们逃到厦门后就託入引见“十八大哥”。由大哥向日领说情，保证悔过和忠诚于帝国，才得日领馆允许其住厦。从此后他们就放心在其“大哥”处服务，有的在赌窟当打手、有的在鸦片间当管理员或推销员，有的在妓寮当保镖。这类流氓又勾结厦门流氓同流合污，到处为非作歹。日领因擅自在厦设立警察署，若单靠自己的日警，力量单薄，就利用这批流氓作为助手，加强其力量。每逢事故发生，出动的流氓比日警多数倍。厦门流氓依靠台湾流氓的势力，台湾流氓以日领事馆为背景。归根结蒂就是日本用离间的政策，使这类流氓不但不务正业，且到处吃物不付钱，强买强卖，稍不称意，就开口骂人打人，

受其受害者不仅厦门人，就是善良的台湾人也同样受其损害。这个时期的厦门人，对在厦台湾人的印象非常不好。不仅如此，就是厦门人与厦门人之间也时常闹不团结。如角头流氓三大姓宗族时常拼斗。善良的台湾同胞和台湾流氓之间也互有成见，界限森严。厦门人误会以为没有看见一个好的台湾人，其实并非如此。在当时的形势下，善良的爱国的抗日的台湾同胞不会给人家随便看出；如果被一般人看得出是爱国的台湾同胞，他一定会被日本抓回台湾坐牢。因此厦门人只能看到坏的台湾人这一面，很不容易看到好的台湾同胞的另一面。例如厦门人都说他们是在厦门的台湾工商业者，免缴中国的营业税。其实很多的台湾正当工商业者，不但加入各途商公会负担会费，并且缴交营业税。日本因怕闽台合作，不但在厦施展侵略政策困难，而且会影响他们在台湾的统治。因此他们不得不采取以华制华的卑鄙手段来巩固在台的殖民统治。

台湾同胞在厦门的正当工商业

厦门市台湾人的最盛时期（约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人口约壹万余人，持有日领的营业牌照的壹仟余户，实在营业的不过式百余户，这中间最少有壹百户以上兼营走私的。为什么有牌照而不经营呢？有的没有资本，有的不会经营，所以将牌照租给人家，每月取一定的牌照租维持生活。当时的洋行不用缴税金，又免受军警和流氓的干扰，因此厦门人愿意挂洋行牌。不到壹佰户的台湾正当工商业者，分布在本市各街。其中经营手工业品的拾余家、工业品七、八家，其余的经营杂货、经营海产的最多。这部分台湾正当

工商业者不但缴纳日领的税金，还有很多人缴交中国的营业税。因当时正当的台胞工商业者和厦门工商业者有密切的感情，中国的营业税是由各途商承包，台胞缴交营业税都是提交给本途公会，这就减轻了同业者的负担。台胞的这样做法就结下了闽台工商业者之间的感情和如兄似弟般的友爱，抵制了日寇的离间政策。厦门沦陷日寇以后，从前挂羊头卖狗肉的各国洋行牌照，就全部消灭了。因为经营那种商品要注明在牌照内才能经营，没有鸦片牌照的决不能卖鸦片。这个时期可以说是厦门台胞正当工商业者最多的时期，大约有六百多户，有的拥有雄厚的资金，但受倭寇的限制不能经营顶盘商，只能做二盘商及一般小商小贩和小手工业而已，实际上是日本垄断资本的分店和推销员。

台湾同胞在厦门的反日志士

台湾在甲午战争后受日本的统治。日本用殖民政治和奴化教育加于台胞身上，竟无耻地谓日皇是神圣的，居民应诚恳地尽忠报国，残忍地利诱台胞互相之间时常角斗，借此巩固其统治政权，企图永远奴役台湾人民。台胞在台好似井中青蛙不知天地之大，不谙世界之发展，任其驱使；一旦跳出井外，就感到在台的同胞的生活不如人。特别是具有理智赋有爱国观念的台胞，一到厦门就感觉到日本如何利用台湾流氓和厦门流氓，怎样地欺压厦门的善良人民，用反间计制造厦门社会的惶惶不安。这类爱国人士不但不随日寇的行动，反而叫喊台湾同胞应该要和祖国同胞站在一起，反抗帝国主义，打倒共同敌人。当时日寇的压迫很严，爱国反日的台胞不能公开活动更不能有大规模的组织，只能秘密组织，分散

活动。要知本市台胞反日组织的全面情况，是困难的，应从各方面零星汇集才能较为全面。我仅以我所知的部分，录为参考。当时在台湾公会里工作的游振煌、王文杰、吴添火、刘水树、陈锦火这五位台胞，眼看日寇对台胞哄骗、利诱、歧视、压迫的情况，都非常愤慨，坚决地反对日本施行的政策，时常到我家里密写反日的文章，在《江声报》、《星光日报》发表。对于日寇侵略东三省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万分不满。一闻马占山孤军抗日，不管马占山的生平如何，说他既能这样勇敢抗拒强敌，就值得我们信仰，而且很高兴地说，台胞既有爱国思想，总要有爱国的表现，来支持抗敌的将军，就募集几十元款，捐给马占山；同时在报刊上以爱国台胞名义发表了反日文章。当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时，他们也做过好几次捐献。在台湾沦陷纪念日，日本在厦门《全闽日报》发表台湾始政纪念刊，歌颂日本统治台湾的功绩；这几位台湾同胞则在“星光”、“江声”两报发表文章，说这一天是台胞受屠杀的惨痛忌辰，并大力地唤醒台胞要对日本讨还这笔血债，要和祖国的爱国同胞团结起来才有力量。这五位台胞之中游振煌、王文杰的主张最强硬，每年一次的宣传作用较小，便用小型的传单经常在旭瀛、台湾公会、日本分署附近墙壁糊贴，使日本晓得台湾人的反日是有组织的，游振煌常说台湾既惨沦于倭寇，中国政府又这样无能，真是有苦无处诉，若是共产党来执政，一定不会这样糟。我感到老游大约已经参加了共产党，和他关系密切的朋友也有同样的猜测。但是否系正式的共产党员，就不得而知，可痛惜的是一五七师到厦后，老游被抓去杀害了。

日本帝国主义如何企图泯灭台湾同胞的民族精神

日本帝国主义占据台湾以后，想尽一切办法，企图磨灭台湾同胞的民族精神，将台湾人固有的风俗、习惯、文化、信仰等生活方式都希望改为和日本人一样的，使二百万台胞泯灭民族观念。例如禁止台湾同胞使用闽南语，禁止念中国书，写中国文，穿中国装。这一系列措施，都是要泯灭台湾同胞的民族精神。他们的手段毒辣，但是收效不大，于是改换手法，采取利诱方式，规定台湾人若改为日本姓名，生活方式和日人一样。得批准为“国语”（日语）家庭，其子弟就可入日本小学。其中的区别是：台湾籍儿童的小学是公学。课程也有区别；日本小学是免费的，公学却要交校费。投考中学时的歧视点很多，如考题从日本小学课本内撰出来的占多数，台湾籍的子弟得被录取的人数很少。当时在台湾的日本人只有二十多万，台湾人却有一百多万，台湾同胞的人数多于日人三十倍。中学生的录取数，日人却占百分之八十，台湾人仅占百分之二十。能上大学的台湾子弟真是凤毛麟趾，侥倖中考的所学的科目是：医学、工业、法学、政治；高精科学，日籍子女才能学到。即使被认为“国语”家庭的台籍子女，也仅得学习日籍子女的一些科目。这一切的歧视政策，就是要泯灭台湾同胞的民族精神。因为不实行这样的歧视政策而让台湾同胞和日人享受同等教育，台湾同胞的智慧和学识必能超过日本人，要求平等待遇，反对歧视和压迫的力量就会高涨，就会很剧烈。这与他们的殖民政策是不相符合的。当时在厦的日人称厦门人为支那人，在厦门的台湾同胞对厦门人则称中国人。中国是一个国家整体。台湾同胞当

时对厦门人的这种称呼，是日寇企图泯灭民族精神的恶果，但毕竟很小。广大的台胞对大陆人民还是亲如同胞的。

文化侵略与《全闽日报》

日寇用尽军事、政治、经济侵略政策之后，又不惜重资在厦建起旭瀛书院，用奴隶教育的教材以奴化台湾同胞的子女，甚至以免费手段吸收厦门人的子女入学，到毕业时如被看中的，还可以免费保送到台湾或日本的大中学校学习。这就可以看出日本的深思远虑，他们希望这批被培养的人回到中国，能得到政治地位。就比较容易作他们的傀儡。这种文化侵略比前述的军事、政治、经济侵略既省力又高效。在厦门的台胞子女也有不少到祖国创办的学校学习的。日寇虽不正面干涉，但其父兄便成为日领注意的人物，稍有不慎犯了轻微错误，就强加罪名，予以重处。相反的，当时在台湾和日本侨居的中国人不少，要设中国学校，日本不容许，以后中华会馆据理力争，才同意创办小学，但要兼念日本书。当时在台的中国人不但念中国书有困难，就是要看中国报刊、杂志也是不可能的。日本人却能在中国大都市到处出版各种报刊，不受中国政府的限制，大力宣传其殖民地政策。当时，日本在厦门的《全闽日报》，专搞吞食中国的宣传，经常煽动台湾同胞和厦门同胞互斗，对于中国政府内部的人员也常常刊出某官员与某官员不睦的挑拨性新闻，使中国政府内部人员互相猜忌。该报用很低的报费广收定户，每年亏损几万元都由台湾总督府给予补贴。该报的背景及祸害如何于兹可见。不仅《全闽日报》社社长泽重信是台湾总督府的特派员，就是报社的上层职员也都在搞间谍工作。其重点就是唆

弄闽台双方的同胞不时发生墙斗，借以削弱反日组织，煽动中国政府的内部矛盾，以达到他们逐步并吞中国的目的。

日人在厦的工商业

日本财阀当时依靠其较为先进的工业品，以航行中国各大通商口。日本货运入祖国。日本商人还到处横冲直撞，不但以其国内很大部份的商品倾销中国的上海、天津和东三省各城市；还设立大中型工厂，既利用中国原料，又剥削中国劳力，而且苛待中国工人。以其低成本商品在中国各地和中国工商业者竞争市场。在厦门的日人工商业者也很猖狂，如三井、三菱日本洋行以外的日人，大多数是经营顶盘商。如果资本困难，台湾银行就尽力支持。所以他们经营的资金和货源都能事事如意。这批人都是政治经济方面侵华的先锋队，也是中国工商业者的劲敌。当时有一部份较小的日商，例如隅田、日龙、玉井、柏原这四家日商，未来厦以前都学会了一口很流利的厦门话，经常去内地招揽生意，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侦探内地的地理形势。他们的工作实际上是间谍。特别不惹人注意的便是古董商鬼冢、森田。这两人说的厦门话比上述那四个日人更流利。当时跟他们到内地、山区、农村、乡镇、县城收买古董的厦门人说：鬼冢、森田这两个人收买古董的手腕很好，一开头就对其他的事询长问短；有时人家拿出值不上五角的货叫价五元，他也照数付给；有时还带很多的糕饼糖果送给老人和孩子们。跟他的厦门人常说这两日人这样装痴作呆，是要人家指报他的货源，其实这两人都是间谍。他俩借买古董为名，到内地搜集情报，窥测山川形势为实，以便到台湾或东京汇报。古董

虽然是厚利的营业，但货源并不那么多。他俩是接受了经常活动费才能这样阔气。在沦陷时间我曾问过森田：你买不多的古董到东京是不是得不偿失？他说：东京的大古董商託我在台湾做些事，每年都有津贴给我。厦门沦陷期间，日人的工商业者比前增加数十倍，各途都有很多日人经营。入口贸易的货源除台湾日本以外，也有由满洲、天津、上海、广东、汕头运来的。北货配运汕头、广州，南货配运上海、天津和东三省。又有专门经营鸦片的福裕公司，名义上虽然以台人为经理，由伪市府专卖局领导，但实际上都是日人掌握实权。除小部份鸦片供应厦门以外，大部份运去漳泉等地换来粮食及副食品，既获重利又毒害漳泉同胞，其恶毒甚矣。

日寇怎样要组织华南国

日寇自甲午战争以后，割据台湾还感不自足，时时都在阴谋侵吞福建，可与台湾相呼应。当时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曾经密写一道奏章，计划要吞并世界。其内容说：要吞世界必先吞中国，要吞中国必先占满蒙，然后进而取华北、华中；要南进必先取华南，要取华南必先取福建；要取福建必先占厦门为基地。福建入手以后，乘胜取广东。今天取了广东，明天就可得香港，南进之船就一帆风顺矣。果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军阀循用田中的政策。当时日本虽然否认田中奏章之事，但从后来的事实看来，证实田中奏章确有其事。一九三四年间日寇利用台湾流氓和几个较有势力的“十八大哥”，並勾结内地土匪合作，拉拢当时南京国民党派来福建的巡察官员杜起云，组织华南国。杜起云亲当首长，命台湾

流氓向万来为秘书长兼人事主任。办公室设在思明北路“海陆春”二楼，对面就是东南洋行，联系利便。东南洋行是“十八大哥”谢阿发经营的旅馆，内设赌窟，又是内地潜厦的土匪窝巢。因此华南国的办公地点设在它的对面。华南国的筹备除“海陆春”二楼是比较公开的以外，还有东南洋行专门联系土匪兼民军叶定国的阴谋活动；又有柴桥内的陈春木、布袋街柏原洋行的中津，棋杆巷《全闽日报》的泽重信。他们三人是鼎足而立，呼应甚便的人物。较谢阿发的东南洋行的活动面却大得多，漳码龙岩属莆田仙游，这几方面的阴谋活动都是他们联络和策划的。日人认为中国的地广人众，若一口吞噬，恐咽不下喉，所以用分散吞食法。在我国东北成立满洲国以后，无时无刻不在华北华中再物色傀儡，在华北华中未成熟以前，迫不及待地先行组织华南国，就是因为厦门与台湾仅一水之隔，又有厦门的台湾流氓和内地土匪可以利用，台湾的物质和人力要来接济厦门是很容易的。但事被国民党获悉，暗中派人来闽，将杜起云押回南京处死。华南国的命运也就此告终。及至日寇占厦的第二年，又拉拢郑旭，请他到台湾、东京后，要请他重组华南国，但郑旭毫无此意，阴谋才破产。闻郑旭系郑成功的后裔，所以日本要利用他。

日本的对岸政策和 厦门的《全闽新日报》

林其泉

日本侵占我台湾期间，在残酷地压迫和掠夺我台湾同胞的同时，还试图通过实行“南支政策”和“对岸政策”，进一步侵略我国南部大陆，进而侵略南洋各地。日本在台湾的总督府，考虑到“闽台一体”的历史背景，极力采取各种办法，加强对我福建省进行渗透，早在日本侵占我台湾不久便开始了。到了本世纪初，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对我福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进行操纵；他们通过派出日本浪人和台湾籍的无业者到厦门等地进行活动，搜集福建的各种情报，操纵报刊和各种舆论工具。这些，当时在厦门人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日本对厦门报刊操纵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

本世纪初，厦门报刊中有两家报纸尤其引起日本的注目，一家是《闽南报》，一家是《全闽新日报》，前者是反日的，后者是亲日的。日本在台湾的总督府，千方百计操纵亲日的《全闽新日报》，以对抗反日的《闽南报》，压制和攻击反日舆论，加强日本侵略政策的宣传。

《闽南报》原名《厦门日报》，先是作为厦门铁路局的机关报，经常刊登揭露日本侵略阴谋的消息，反对日本的侵

略政策。因此，多次受到日本驻厦门领事馆和日本浪人的刁难。1910年9月，《厦门日报》改名《南声日报》继续刊登许多不利于日本报道，自然受到日本人的阻挠和破坏，办报工作遇到种种困难。那时英国驻厦门的领事馆，想拉拢一批地方势力为自己服务，便于1914年3月出面“保护”这家报纸，要它改名为《闽南日报》，继续办下去。只是这家颇有民族气节的报纸，并不报答英国人的“恩情”，对于那些不利英国的消息也照登不误。这就引起英国驻厦门领事馆的不满，多方给予为难。因此《闽南日报》处境更加困难。但是这家报纸，并没有因此停办。这年10月，《闽南日报》又改名《闽南报》继续发行。只是人们没想到，这份反侵略的报纸，最后竟被勾结帝国主义的封建势力所枪杀。《闽南报》因反对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款，反对袁世凯在中国恢复帝制，前后两度被北洋军阀政府所封闭，最后于1917年被迫停刊。日本自然会感激北洋军阀政府的，因为它替日本拔掉了一根“钉子”。

《全闽新日报》台湾籍人士江蕴和创办于1906年8月，开头由台湾基隆出生的江保生独资经营，后由林维源孙子、林尔嘉儿子林履信等人亦合资参办。而林氏一股单独投资额占总投资额的一半以上。这可见当年林家在这份报纸中的地位了。林维源系台北富绅，1895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台湾时举家内渡迁回大陆，择厦门鼓浪屿居住。不但是林维源自己一家人，就连日本人都把林家看成是台湾籍的。当然居住厦门的台湾籍人士不仅林维源一家，本世纪初在厦门居住的台湾籍人士约有二千人。在日本帝国主义看来，台湾成了日本的领土，台湾籍的人也就是日本人，日本人是受日本政府

管束的。所以台湾籍人士在厦门的事业要受日本政府控制乃是理所当然的。就因此，他们认为要通过日本驻厦门的领事馆，对这份由台籍人士筹资经办的报纸加以控制，加以利用。那不但要使这份财务基础薄弱又屡生弊病的报纸，不致于倒闭，而且还要使它成为日本政府的机关报，并把它利用来作为“探求或调查当地外交上的秘密。”总之，要使这份报纸为日本侵略者的“南支政策”和“对岸政策”服务。

然则如何达到这目的呢？日本所采取的办法是，首先通过财务关系来控制它。为此，日本驻厦门的领事馆，除了“督促”林履信等台籍人士增加支付给该报社的费用，还要求台湾总督府或者日本政府外务省，从机密费中抽出一部分（开头计划是每月融资二百元）支付给该报社，以作为经费上的补助。然后再在这基础上改造报纸的内容，使之完全适应日本的“南支政策”和“对岸政策”的要求，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舆论工具。

关于全面、完全控制这份《全闽新日报》的办法，日本驻厦门领事馆的领事补森安三郎于1909年（日明治四十二年）11月6日提出一个具体方案，该方案的要求是，《全闽新日报》先做到能吸引中国人订阅，然后从中培植日本的势力。所以日本领事馆对于这件事要在背后作严密的监督（但要避免公开指挥），为此，日本政府要在在驻厦领事馆与报社之间安排可暗中斡旋双方关系的人——这种人必须有丰富的学识，精通当地（厦门）的情况，并会方言（厦门话）与洋文，以发挥其作用。这就是说，要找到一些能充当日本帝国主义走狗角色的人，以帮助日本操纵这份报纸。这真是想得周到极了。

只是这种人并没有物色到手，也难以物色到手，这不免使日本政府感到遗憾了。

在经费补助方面，开头时台湾总督府提出有困难，一时难办到，后来由日本外务省从1914年11月起每月补助100元。经费补助总算解决了，这种补助共发给一年零九个月时间，后来《闽南报》被封闭，日本政府便以厦门再没有与之抗衡的报纸为由，取消对《全闽新日报》经费上的补助。提出，等以后如有“对抗之报纸出现”时，或“其他需要补助之因素出现”时，再恢复补助。这自然没有什么讲不通的。不过，这只是表面的，日本政府所以取消它对《全闽新日报》的经费补助，另有一个重要原因，那是因为该报并没有完全听从日本的指挥，日本并没有完全达到对它控制的目的。在办报过程中，日本人曾发现，报社社长、厦门出生的台籍人士江保生并没怎么按日本指挥的办。因此，想安插日本人或日本通的人到报社掌握情况，但又由于江保生的反对而没实现，这样只好改从经费上断绝补助以卡它，叫它尝到苦头后能乖地听从日本的安排。

停止经费补助的结果，不免使该报社发生困难，一时几乎办不下去，于是有人想把它让出去，让给别人去办。

日本的台湾总督府得知《全闽新日报》这个动向后，即派出民政长官下村宏赴闽洽商，欲将它加以收购，变成完全是日本的一份报纸。

这种举动自然同下村宏的出谋献策有关，下村宏于1915年11月出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一开始就十分强调台湾的重要性，强调台湾作为日本南进基地的重要意义。同时，他并提出设法增加华南、南洋设施费，计划在福建、广东地

区发行多种报纸杂志，以与中国发行的报刊相对抗。在计划中，厦门要先办二报一刊，以后有必要时再增加。《全闽新日报》是受日本所控制的现成的报纸，把它收购到手，变成日本的报纸。这当然再省事不过了。只是由于各种原因，后来对《全闽新日报》的收购工作没有办成，台湾总督府另安排日本人山下江村在厦门创办周刊杂志，以应日本的南进政策和两岸政策的需要。

对《全闽新日报》的收购工作，其中所以没有办成，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1917年11月有台湾总督府附属机构“善邻协会”的成立。这“善邻协会”就是由总督府民政长官下村宏发起成立的“善邻协会”在其宗旨中明白规定，策划台湾与华南地带之亲善，同时对本地区之通商贸易或其他事业予援助及调查，等等。那表明，这“善邻协会”是为配合日本南进政策服务的。就因此，在台湾总督府看来，“善邻协会”可以帮助《全闽新日报》，能让它重振旗鼓，继续办下去，办成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的报纸。

果然不错，“善邻协会”成立后，给《全闽新日报》每月以300—400元的补助，使它支撑下去。也就因此“善邻协会”成了《全闽新日报》的新的“主人”，由于“善邻协会”是受台湾总督府评议会直接控制的。因此，此后台湾总督府对《全闽新日报》的控制就来得方便了。从此以后，《全闽新日报》除记者由社长选任外，其他主要人员如主笔等均由“善邻协会”任命，同时规定主笔必须选用与日本“亲善”的人。

这里需要提一下，1919年4月，日本外务省曾订出新闻改革计划。计划中提到，日本在中国地区的报社的经营及操

纵，要全归日本外务省统一办理，其他各政府机关以后必须避免在中国经营报社，已经营的要尽可能移交外务省处理；提到日本应在中国增办日本势力可控制的报纸，尽可能把目前的由中国人及外国人经营的有力报纸，拉到日本操纵圈之内；还提到，在1919年实施的事项中，把福州的《闽报》（注）移到日本外务省经营，把厦门的《全闽新日报》加以收购，也归外务省经营，等等。它这样做，不免引起台湾总督府的不满，这就加深了台湾总督府同外务省之间早已出现的矛盾，不过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此项新闻改革计划并未付诸实施。《全闽新日报》的经营方式亦未更改，仍在台湾总督府及其附属机构“善邻协会”的直接控制之下。

在“善邻协会”控制之初，《全闽新日报》虽有林尔嘉及其儿子林履信前后出任过社长的事，只是因为办报方向却在主笔手中。不管林尔嘉、林履信怎么考虑，日本人控制的办报方向，是无法改变的。但是，那些日本人和亲日分子，把《全闽新日报》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工具，肆意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处处为日本侵略政策辩护的做法，必然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怒与指责。“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不断兴起，抵制日货，反对日本侵略政策的群众斗争风起云涌。不分黑白，颠倒是非的《全闽新日报》更是为中国人民所深恶痛绝，人们纷纷谴责《全闽新日报》的卑劣行径，一般人不订阅它。

没人订阅，这不免使《全闽新日报》在经营上发生巨大困难。日本政府每年要倒贴它相当的一笔钱，这也许是其次的，更重要的还是，出版报纸无人订阅，达不到办报目的，具体讲，日本在厦门的喉舌不再发挥作用了。因此，有人提

出干脆把《全闽新日报》停办，将给它的补助费用于付给日本在厦门的侨民，以改善日本侨民的生活，稳定日本侨民的心，别的事以后再作计议。但是台湾总督府可不同意这种意见，他们认为办报纸不能光看在金钱方面的收益或亏损，重要的要看到金钱以外的“无形的声势”。《全闽新日报》在厦门和闽南各地都有影响，在歌颂日本政策方面“功绩颇大”；特别是在西方列强想以厦门为跳板进入福建时，它发挥出“报道功能”的作用。就因此，尽管办报亏本，仍要照样继续办下去，继续发挥其作用。

到了三十年代，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实施和南进政策调子的升高，台湾总督府更加重视这份报纸的作用。他们要充分发挥这份报纸的作用，利用报社的工作人员去接近中国机关、团体，以搜集各种情报，使之成为华南通的权威机构。这样，三十年代后，《全闽新日报》不光发行报纸，还兼有搜集情报（包括军事情报）工作。这时它已不是什么报社，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厦门的特务机关。这种特务机关，直到日本投降，从而日本的“南支政策”和“对岸政策”彻底破产，才结束他的使命。

注：《闽报》原名《福报》，是福州人黄乃裳主办的福州最古老的报纸之一，1891年12月由日本的台湾总督府收购其发行权。改名为《闽报》，1918年起由“善邻协会”直接经营。日本经营《闽报》的目的在于维护日本政府对福建的侵略政策。因此，该报不受欢迎。福州人很少订它。不但如此，当日本侵略中国时，该报常常成了中国人民抗议行动中所攻击之目标。

厦门沦陷期间的鸦片和赌博

洪玲 叶更新 整理

厦门沦陷初期，日本法西斯先是采用恐怖的高压政策，企图以烧、杀、奸淫的毒辣手段来征服中华民族，镇压厦门人民的抗日意志。及至日寇导演的傀儡政权产生以后，敌人为了引诱难民回归厦岛“繁荣”经济，又积极推行麻醉毒化政策，利用鸦片和赌博这两种杀人不见血的凶器，戕害数以万计的厦门人民，並从中剥削掠夺了千百亿元财富。本文的材料，是曾在日寇推行毒化政策机构里干过事的几位先生提供的。惟因时隔二十多年，他们对有些事情回忆不起来，叙述不可能全面，希望熟知情况的人士，予以补充。

一、公卖局与三个鸦片公司

与厦门伪治安维持会产生的同时，1938年6月，厦门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即指派台奸林济川设立“公卖局”，实行鸦片和食盐的公卖。林济川，台湾台中人，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商科，精通日语。日寇进攻厦门时，奉令随军来厦，协助日寇实施对厦门的经济侵略。

“公卖局”成立后，日寇为了能够更多地推销鸦片，达到毒化厦门人民的目的，还由海军司令部的特务大队长某中佐授意台奸陈长福、蔡培楚出面拉拢一批台奸和汉奸。先后组织福俗、福和、福庆（后改称“福隆”）等三个鸦片公司

于升平路惠通巷七号，即战前“鸦片大王”叶清和“鹭通鸦片公司”的旧址。陈长福战前在厦门任过五年的“台湾公会”会长，除在大元路开设五福钱庄和在寮仔后经营土产进出口的南兴行外，又投资漳浮汽车股份公司，与厦门的士绅，过从甚密。沦陷期间，陈极力巴结日本驻厦门领事水元恒八，把自己寥花路20号的洋房腾出一层，作为水元恒八做公馆。实际上，也就是通过与水元恒八同住的机会，结交更多的日寇长官。由于他深得日寇的信任，他一身兼数要职：日台人合资组织的“金融组合”组合长、日本东亚省厦门出張所顾问，伪厦门市政府参议，伪厦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伪厦门劝业银行理事，厦门台奸组织的“忠诚会”会长，“兴亚报国会”委员，以及伪市商会执行委员、伪厦门海外华侨公会委员等。蔡培楚原籍晋江县深沪乡，入台湾籍，战前由台湾返晋江故里，厦门沦陷后潜逃至厦，勾结日本领事馆，经营国际贸易“通孚行”，代敌搜购军用物资，历任台湾居留民会议员、“经济统制会”理事、“配给组合”副组长、“重要物资组合”理事等伪职，这两个台奸，都是很受日寇倚重的忠实走狗。

“公卖局”和三个鸦片公司虽然同样是日寇推行毒化政策的机构，但任务各有不同。“公卖局”表面上是伪治安维持会和后来的伪市政府的一个局，实际上先是直接隶属敌海军司令部，后来归兴亚院厦门联络部的经济部领导。“公卖局”的任务是供应制造鸦片烟膏的原料，领导、监督三个鸦片公司的生产和推销业务，颁发小批发的“二盘商”和零售的“三盘商”烟馆的营业牌照。“二盘商”、“三盘商”的牌照，每两年换发一次。全市（包括禾山）领有“二盘商”

牌照的有二十家。其中的一部分是三个鸦片公司的董事开设的，如王归的“俗兴”、陈俗乞的“协盛”等；大部分是有功于“皇军”的浪人、汉奸开设的。如充当日寇登陆厦门响导的浪民陈木土，战前“十八大哥”的林猪哥、李良溪，伪禾山联保主任绰号“禾山皇帝”的台奸林身，禾山日军诱导员、伪市府禾山征收处主任的台奸李恭，日本领事馆警察署情报员王文庆、通译高丁财、日海军司令部的警察本部情报员曾荣和（别号黑猫飞），伪市府警察厅情报员高水龙等。

“二盘商”每家每月规定配售六百两，二十家月销一万二千两。领有“三盘商”牌照的，全市有一百三十多家。“三盘商”设铺供应吸者，它不能直接向鸦片公司购买鸦片，只能向“二盘商”转买，受“二盘商”的剥削。开设“三盘商”烟馆的，也都是有功于“皇军”的浪人、汉奸。例如伪商会会长洪奸立勋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派人暗杀后，他的家属就得到照顾，领到“三盘商”的牌照。“公卖局”还秉承兴亚院的指示，办理发给本市汉奸巨头李思贤、金馥生、卢用川等，和南竿塘、白犬岛、乌坵屿的伪“和平建国军”总司令张逸舟等，南澳岛的伪“闽粤边区绥靖总司令”黄大伟等，以及浯屿行政公署署长莫清华等，伪金门行政公署署长王廷植等的特别许可证，名义上是供巨奸交际应酬，实则系发给巨奸的特权烟，使巨奸从中获利，死心塌地为日寇服务。其中伪市长李思贤、伪建设局长卢用川的许可证每月供应一百五十两，伪财政局长金馥生最多，每月有四百两。南竿塘等岛屿张逸舟等伪军每月有三千两，南澳岛黄大伟等伪军每月有五百两，金门王廷植等每月有一千五百两，浯屿莫清华等每月有五百两。李、卢诸奸常将特别许可证转售“二盘商”或

鸦片经纪人，自己不必花丝毫本钱，单凭一张许可证，就可获取巨额利润。金馥生自己有“联昌行”经营交通船，他的许可证都由“联昌行”前来领货。张逸舟等外地伪军和金门、浯屿方面，每月派人前来领取鸦片二至三次，此外，如公开赌场“大千娱乐场”、“兴南俱乐部”每月各供应一百两，鼓浪屿“皇帝”洪文忠开设的“四百号俱乐部”和伪“华侨联欢社”等半公开赌场，以及“台湾桐仔”（妓院），也按月配售鸦片，其领取鸦片许可证，只归“公卖局”颁发。

1943年7月，伪市府隶属南京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厦门升格为特别市，“公卖局”改称“禁烟局”。“公卖局”（禁烟局）内设督察、总务、秘书三股，局长从始至终都是林奸济川。有两名日本人当嘱托，一个叫木佐贯弘，另一个叫大岛旭。督察股股长是个名叫福仔的台湾人，这个股的业务是查缉私烟和督查三个鸦片公司以及“二盘商”、“三盘商”的经营。总务股股长黄松涛，同安人。科员有吴东荣、张彬淮、薛沧江、江茂林（以上均台湾人）、肖再福（厦门人）、郭纯良（又名约拿）等人。这个股负责调运、保管、供应鸦片原料，有个仓库。沦陷初期的鸦片原料，全部是波斯土。波斯土外皮以红色纸包装，长方形，体积如建筑砌墙用的砖块那样大。1940年后改以东北热河土为大宗，间亦有日寇强迫金门、厦门农民种植的土膏。兴亚院有个“兴农会”，即强迫金、厦农民种植鸦片的机构，由日人高田宗男和三个台湾人负责。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波斯土、热河土绝路，全系金、厦的土膏。秘书股主要经管颁发前文提到的营业牌照和特别许可证。

负责生产制造鸦片烟膏的福裕公司，创立于1938年12月，

1939年1月正式投入生产。起先股本旧法币十万元，其中王归股份最多，占四万元。王归又名起模，台湾台北人，战前在思明南路开设裕兴鸦片烟铺和裕兴黄包车行，一向以贩卖鸦片和出租黄包车剥削车夫为职业。南兴烟酒公司（总公司在台北，是个日、台人的股份公司，在厦门出品牡丹牌、椰子牌香烟和万岁牌清酒）投资三万元，陈长福参加一万元，蔡培楚也是一万元；其他一万元由叶炳南等人凑足。

福裕有个董事会，以陈长福、蔡培楚、王归、叶炳南等七人为董事，推叶炳南为董事长。叶炳南人称之叶九舍，战前在大同路开设京康药房，曾任自来水公司和电灯公司的董事。也就凭着这个资历，敌寇才看中他，用他为董事长，以资号召其他资产阶级分子投靠敌人。叶九舍排个空名，坐领干薪，实际掌权的是常务董事陈长福（1941年后换蔡培楚）。福裕公司的业务不断扩展，有过两次增资，1941年第一次增资一倍，全部股金为旧法币二十万元，1942年又再增资一次，资金达三十万元。臭名远扬的厦门鸦片大王陈庆发、陈裕乞父子，拥有巨大资金的台湾林本源兴业公司，是在第一次扩充增资时入股的。随着两次的增资，董事会也进行改组，新任董事有马赓（台湾人，安平酱油厂老板）、高启发（台湾人）、黄鸿翔（伪市商会常务理事、伪中日合办厦门建设有限公司经理）、陈款峰等；陈裕乞、郑国玺、黄植夫任监察。通孚行老板林文访和另一台人张维庆任顾问，陈长福充当常川顾问，左右公司一切。此外，又有所谓嘱托五人，即：江重槐（南兴公司经理）、林子丹（通孚行股东）、蔡植历、谢火生（台人，与日本领事馆警察署以及专卖局长林济川都有关系）、施范其（早期厦门台湾银行的买办，厦

门台湾居留民会首、二、三届会长)；又有常川嘱托，由林济川的妻弟、台人邱坤土担任。这些监察、顾问、嘱托，不但坐领干薪，而且是公司的重要决策者。

从福裕公司开始创办到日寇投降为止，始终是余赞顺任经理。余赞顺又名兴旺，有三、四十年的制造和贩卖鸦片的经验。战前是鸦片大王叶清和开设在升平路的“源兴鸦片行”的经理。福裕的规模相当大，设有营业、会计、总务、保管四股，各股设股长一人。公司全部员工约七十人，其中营业股四人，会计股五人，总务股六人，保管股二人，制造股二十多人。公司里所有的人员，不是与董事、股东有关系的，就是由兴亚院、日领馆或专卖局介绍来的。例如总务股长张玉兔，是陈长福的私人秘书；掌握公司经济大权的会计股长陈思平，是陈长福的长子；其他如会计股的施纯锐是施范其的第二儿子；营业股的王万然是王归的长子、陈云魁是陈裕乞的保鏢、余琪能是余赞顺的儿子；保管股的陈丙申，是专卖局介绍来的；制造股的林文钦，是林济川的弟弟，陈雪是陈长福的侄女，王玫是叶炳南的侄媳妇。王玫，朝鲜人，原是上海虹口某妓院的妓女，叶炳南的侄儿长寿嫖了她，讨回来当老婆。不久长寿病死，王玫就搭上专卖局派到公司的日人监督木佐贯弘，因而在公司里非常吃得开。制造股也有日本女人，其中有个名叫川田叶子。公司初设时期，另有一个查缉私烟的督察队，队长陈金传，是战前横行厦门的日籍浪民“十八大哥”之一，队员二十多人，尽是日籍浪民和本地流氓。督察队存在将近两年才解散，只留下一个督察，名叫孙活水。此外还有一个称为“指导员”的日本人。最早是由台湾总督府的“专卖局”派来的一个年青人，大约三十岁，戴

近视眼镜，名已忘了，此人在职三个月就回台湾去了，改由“专卖局”嘱托木佐贯弘接充，直到日寇投降没再换人。“指导员”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制造和包装，也过问其他事情。还有“专卖局”的技士周清华（台湾人），也每天到公司检验鸦片质量一次。

福裕公司生产制造的鸦片，有“天字”、“福字”、“红狮”等几唛。“红狮”这一唛后来停产，改为出品“特字”。这些唛头的鸦片，都是支装的，象牙膏那样，重量分为一钱、五钱、一两三种。除支装外，也有铜质盒装的，重量一两。合计各唛产量每月约二万两。初期每两成本约旧法币七元多，公售价十一元二角，市价十六、七元；随着通货膨胀，1945年公售价涨到三十多元，市价则近五十元。公售价是按成本加百分之三十的利润定出来的。福裕公司的仓库，经常存有现货成品五、六万两，日本投降国民党接收时，被封存的各唛鸦片达五万多两。

日寇对福裕公司的鸦片生产非常重视，兴亚院和海口部武官府经常派人到公司视察。为什么日寇如此重视它呢？我们只要给它算笔总账，就可以找到答案。福裕月产鸦片二万两，以最初的公售价每两十一元二角和后来步步上升三十多元平均，每两只算它二十元，就是四十万元；每年产量二十四万两，就是四百八十万元，前后实际生产六年九个月，累计起来，就是三千二百四十万元。扣去成本，利润收入达九百七十二万元。如以市面售价七年间平均每两为四十元计算，那么，福裕公司六年九个月制造的一百六十八万两鸦片，产值近六千万元，这数字实在大得惊人。福裕公司的利润百分三十五为股东红利和高级职员奖励，百分六十五上缴兴

亚院，日寇既达到毒化中国人民的目的，又大量抢走了中国人民的财富，真是一箭双雕。

福庆公司的创办稍后于福裕公司约三个月，也有董事会的组织，董事是“专卖局”长林济川、陈长福、马赓、陈裕乞、王归、谢火生（台湾人，厦门日本海军武官府嘱托、日本领事馆警察署情报员），吴克明等人，以战前贩毒起家的鼎美行吴蕴甫的第七儿子吴克明为董事长，马赓为常川董事，余赞顺、黄友钰为监察，张王兔、吴昭泉（陈裕乞的岳父）为嘱托、张金英（台湾人，原姓林）为经理。福庆公司的主要任务是经销福裕公司的产品，凡“公卖局”批准的“二盘商”烟馆的鸦片、兴亚院批准的“交通船”运入闽南各属内地倾销的毒品，都凭营业牌照和特别许可证由福庆公司供应。1941年间，福庆公司因内部陈长福、陈裕乞利益矛盾发生冲突，进行改组，招牌改为“福隆”。改组后的福隆公司由陈裕乞任经理，掌实权，月销鸦片在一万五千两左右。

福和公司虽然对外独立，实际上是福裕公司的附属工厂，专门利用福裕公司的下脚料配制浆料膏。福和内部人事和生产管理，几乎全为陈裕乞所把持。

二、大千娱乐场和兴南俱乐部

日寇统治厦门期间的另一支毒箭，是设立公开赌场“大千娱乐场”和“兴南俱乐部”。和鸦片一样，日寇从公开赌场中掠夺了厦门人民大量的财富，又毒害数以万计的厦门人民。

大千娱乐场是直接秉承厦门日本海军司令官宫田的命令创设的。宫田把这个任务交给驻厦日本总领事馆的经济课长

藤川宽太（后调任兴亚院厦门联络部当经济部长），再由藤川宽太交给他的爪牙台奸何金涂具体办理。何金涂战前就在厦门的日本律师小山的事务所当文书员，与一些地方上的劣绅、奸商本来就有交情。他探知薄具声名的堕落画家吴芾（字硕卿）生活处境不很好，就利诱吴芾出面组织，吴受“宠”若惊，立即表示愿意效劳，但苦于缺乏资本。何金涂素知宫田喜爱中国的山水花鸟画，乃建议吴芾精心作画数幅，恭献宫田司令，果然得到宫田青睐，赏赐他日金数百元，並支持他为大千娱乐场的董事长。

大千娱乐场采取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最初资金订为一万元，分为一百股，每股一百元，但实际收入的资金，大约只有三千元，主要股东有战前日籍浪民“十八大哥”的陈春木（绰号矮仔木）、林清埕、台湾浪民蔡沧州（开设“惠利典舖”），以及奸商李文学（新建成布店老板）、王盛典（顶释仔王府的浪荡子弟）等。

这个公开赌场于1939年6月开始营业，设在思明南路战前的东亚旅社（今大众旅社），它是何金涂勾结伪家屋部，由伪家屋拨充的，原东亚旅社的一切家俱设备，同时被占用。

“大千”只花了一千多元修整、粉刷、佈置。大千赌场内部业务由林清埕、陈春木主持，对外一切事务，概由何金涂负责，全部职工一百多人，男女都有。场内举凡天九、十二支仔、大小、三中宝、番摊、八百存、轮盘、四字，各种赌具，应有尽有。大千以各种手段诱惑劳动人民入赌。因为当时谋生困难，生活费用又高，劳动人民被“一赔十”、“一赔百”的引诱，希图侥幸，就这样堕入彀中。赌客入内，不论你赌那一种，输的当然尽归赌场收益，如果赢了，赌场就

要向他“抽水”。“天九”、“番摊”、“十二支仔”、“大小”、抽百分十，即赌客赢了一百元，赌场要抽十元，其他各式赌博，或抽百分六、或抽百分四不等。七年间赢的赌客寥若晨星。

1940年8月，大千进行改组增资，原因是伪市府财政局长金馥生看到大千盈利正丰，眼睛发红，就以伪府财政支绌为借口，向兴亚院申请将大千归伪府掌握。这个主张遭到过日籍浪民陈春木、林清堃的反对，金馥生乃托伪公卖局林济川斡旋，取消收归伪府掌握的打算，改为改组增资。旧股东原有资金三千元，提高十倍，当作三万元加入新董事会。新董事会以劣绅曾逊臣（化名运城，前清秀才）充董事长，林济川、金馥生、林烘炉、王国绵、李文学、黄启戟、徐惜三、陈嘉成、黄友钰、杨耐、王盛典等为董事，吴昭泉为监察，辛王琮任经理，林烘炉、林宗凯、张维国任副经理，吴在田为场内监督。又增聘台湾人张涛臣、同安人林子川为通译，卢六为文书主任，方建农为会计主任。

为了招徕顾客，引诱更多的市民迷醉于赌场中，大千娱乐场还向伪公卖局申请了鸦片，免费供应染有阿芙蓉癖的赌客吸食；又设有“贩卖部”，内中香烟、咖啡、牛奶、面包、茶水、各式点心俱备，名为“贩卖”，熟悉的顾客，却可享受免费招待。比较高级的赌客如买办资产阶级分子邱世定、苏清岁之流，赌场另备美酒佳肴款待。赌场内还设有类似典铺的“抵押部”，凡赌客现款输光，用首饰、手表、贵重衣服等，都可以随时向抵押部抵押，换取现款再赌。抵押部也由辛王琮、林烘炉掌握，抵押品约估六成（即值百元者只押六十元）入押，期限三个月，逾期由赌场处理。赌场入口

处，雇用战前城内派流氓陈某（名已忘）看守，场内又驻有伪警保镳，也常有日本领事馆警察署的员警到场巡视。

大千娱乐场又是一个敌首巨奸的欢乐所，“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藤川宽太、金馥生、林济川、陈耀琨（伪侨务局科长）等日首巨奸，经常到场饮酒作乐。卢用川、谭培堃等奸，也时有光临。每次有日本各地或其他沦陷区的伪奸组织来厦的什么代表团、参观团，也都由日伪机关带到大千参观，而每次参观后，又都要举行盛宴。尽管类似这种开支每月要三、五万元，但大千的盈余，还是非常惊人的，1941年间上缴伪府的税收，则达八十多万元。到抗战胜利移交国民党反动政府接收时，大千的动产、不动产合计七百多万元，如果以它初设时的资金三千元计算，扣除历年上缴伪府税收和股东的红利、高级职员奖励金，六年间获得净利二千三百多倍。

兴南俱乐部设在晨光路前三山旅社（今晨光旅社），1939年10月开始营业，它以“和平不忘娱乐，娱乐因于和平”为号召，规模比大千娱乐场更大，占用了三山旅社全座四层楼，底层有所谓“通俗教化设备”，二楼有所“社会教化设备”，三楼是赌场，四楼是礼堂，出租供人举行婚礼或其他集会。

起先，兴南俱乐部是由曾文雨（越南归侨、达记柴米商老板）、张添福（南安、开船务行，有一帆船川走厦门、温州间）、张金玉（台湾人）、李钧朝（捷裕钱庄老板、厦门人）、陈世通（惠安人、美利坚皮鞋店老板）、连本素（厦门人、排饼摊）、吴琐云（台湾人、战前厦门地方法院法官郑烈之妾，曾操律师业，沦敌时凭敌势力占用中山路前大华饭店，

改设新南旅社)、吴昭梁(同安人,流氓,在大元路开设“三盘商”鸦片烟馆)、叶青洁(台湾人,饼店老板)、林世品(永春人,大元路瑞记汇兑信局老板)及李思贤老婆的姨母(台湾人,其夫过去系海澄之师爷,人称之为“师爷奶”,名不详)、林本连之妻(与吴琐云关系密切,台湾人)等合资组织的,以吴文雨为董事长,台湾人张金玉为副董事长,张添福为经理,李钧朝为总务主任,管理财政吴昭梁,连本素主持赌场,并由兴亚院派日人渡边忠三郎为顾问,甲斐、纪伊智为联络员,掌握实权。充当日寇汉奸之间的翻译,是个台湾人谢子子。

凡大千娱乐场所有的赌博种类,兴南俱乐部必都具备,而大千所无的麻将、扑克,兴南则兼而有之,另设在三楼。巨奸金馥生、卢用川、谭培桀、杨廷枢等,经常在这里聚赌麻将,输赢动辄数千元,毫不吝惜。大千免费供应赌客鸦片、点心、香烟,兴南也都效尤,但规定免费鸦片,只供应三分定量,超过之数,按照“三盘商”价付钱。兴南的赌客以侨眷居多,同样也设有剥削赌客的“抵押部”和“抽水”制度。它的“刮钱”本领比大千强、花样比大千多,遗害性也比大千大”。因为它底层的“通俗教化”设备了“博奕室”和专门讲述封建、迷信的“七侠五义”、“封神榜”、“火烧红莲寺”等旧小说的“讲古(故事)场”;二楼的“社会教化设备”陈列了替日伪宣传“大东亚共荣圈”、“中日亲善”的“图书室”和供赌客与赌场内女招待(实际上是暗娼)“谈情说爱”的“社交恳谈室”。供赌客吸鸦片的“吸烟室”,供赌客吃点心的“餐厅”也设在二楼,成为“社会教化”的组成部分。兴南俱乐部招徕顾客的另一手段,即举办“星期

六聚餐会”欢迎赌客参加,而参加者只付酒席的百分五十,由兴南津贴百分五十,这也是大千所无的。

兴南俱乐部也进行过改组,原因是各股东常为争分利润发生了纠纷,吵得太不象样,触了日本主子之怒,认为有健全组织之必要。乃于1942年春由兴亚院下令改组,指定伪市商会理事张静山负责改组事宜。

改组后的兴南与大千一样,采用股份公司的形式,董事会改称理事会,定股金为二十五万元,分为五百股,每股五百元。理事会由日寇指定张静山为会长兼正经理,陈世通为常务理事兼副经理,高春荣为理事兼会计。理事分为两种,支薪的叫专职理事,有李文敏、吴克修、林世品等人,只支车马费的叫一般理事,有吴瑞崐(伪劝业银行经理)、陈光明、高标奕等人。又以陈沙(律师)为常务监事、郑有年(永康成百货商场经理、伪市商会理事)等为监事。日本人渡边和甲斐,仍充顾问和联络员。理事会每月开例会一次,通过收支账目及讨论业务事宜。每次会后,都有饮宴。

兴南俱乐部每月结算一次,并造表分别向兴亚院和伪市府财政局报告。它的盈余分配是:先扣除办公费、在勤董事、全体职工薪金和非在勤董事的车马费,剩下之数,抽出百分之四十缴交伪市府为税收,得出净利。净利的百分十分发给一般职工作为奖励金,百分四十充为地方“公益”事业,百分五十由董事会按股分摊发给各股东,作为红利。

除了大千和兴南这两个公开赌场,半公开的赌场,则有大汉路(今中山路)的华侨联欢社和鼓浪屿泉州路的同声联欢社、四百号俱乐部、所谓“中日亲善”机关“共荣会”经营的“共荣会馆”,也附设“麻将室”。此外,如战前“十

八大哥”之一的王仔海开设在水仙路52号，王昌盛开设于棋杆巷的“铁公馆”（同时又是情报机关）、黄菊次郎（日寇创设在厦的《全闽新日报》调查部主任）开设于福茂宫5号、陈宝钦（伪警厅特务股书记）开设于思明北路47号、丁月情（伪鼓浪屿女保卫团队长）开设于鼓浪屿新路头的赌场，那是多得不胜枚举。

总之，一句话，鸦片和赌博，是日寇占领厦门期间进行殖民统治的最恶毒的政策，遭受鸦片和赌博坑害的厦门人民，真是难以计数。

厦门的各角头流氓

· 默 君 ·

回溯台湾浪人的罪行

现在要写厦门各角头流氓的产生，就要先写台湾浪人的罪行。笔者生长在厦门，又因家住局口街，目睹台湾浪人当时的横行霸道，真是罄竹难书。在厦门未开辟马路以前，局口街算是一条交通要道，这条街是台湾浪人陈春木等所割据，也是他们所统治的一角落。住局口街的厦门人，等于是他们的顺民。台湾人的普度，是在蕹菜河举行。局口街的居民，都要接受陈春木所分的纸旗出菜碗，一旗一碗，也要出他们演戏的钱，如敢说一个不字就会倒霉。这是举一个例，其他不必多说。

可是台湾浪人八大哥是怎样产生呢？就是日本占领台湾后，经常受台湾志士的反抗。台湾民间有“二十八宿”等的秘密社会组织、抗日复土运动的不断发生是日本统治台湾的致命伤。日本除采取残酷的镇压外，还搜罗一批流氓组织“武德会”来与“二十八宿”对抗。先则使两派火拼，继则利诱驱遣他们来厦。1913年“二十八宿”的头目柯阔嘴，“武德会”要角郑有义、李良溪、林清埋等第一批来厦。日本台湾总督府，以这些人离开台湾，一则对台湾治安可以无忧，二则指使他们扰乱厦门，以便进一步占领厦门作为南进

基地，诚一举两得。因此台湾浪人纷纷派遣来厦，以日领势力作护符，占据各角头，开设烟馆、妓寮、赌场、放高利贷，形成厦门社会的黑势力。

公元一八九九年日本向清政府公然提出要求自寮仔后（即现在的水仙宫）至虎头山直达厦港沙坡尾一带为日本租界。昏庸无能的清朝政府居然同意。因厦门人民坚决反对，不让政府和日领插界。而驻厦门的各国领事也不容日本独占，因此发生矛盾。日领以公开侵略不能得逞，即指使台湾浪人组织十八大哥捣乱治安。台湾浪人为了扩充势力，除了占据各角头外，对当地流氓及内地亡命匪徒，也网罗作其爪牙。如三大姓的吴崎，（外号狗屎崎）因有一大批爪牙，日领即准其加入日本籍，改名吴通周，列为十八大哥之一。台湾浪人为非作恶达到登峰造极时，就是最后由台湾来的陈粪扫到厦之后。他家住麦仔埕，就在他的家中设立“聚义堂”，纠集十几个浪人和内地来的匪徒饮血酒聚义。他自居山寨大王，令其爪牙在偏街僻巷拦人抢劫财物，甚至公然打家劫舍，掳人勒索。当时厦门抢劫案，几乎无日不有。

公元一九二四年，统治厦门的军阀，是号称闽军总司令的臧致平。他为对付台湾浪人的横行霸道和破坏治安，乃于该司令部设立护大营，委派草仔按流氓好汉李清波为营长；又设立稽查队委北方人刘竹坡为队长；又令警察厅长陈为铤，设侦缉队，以陈尚志、黄昆火为正付队长。侦缉队及稽查队队员都是城内及草仔按的流氓充任。为什么臧致平委李清波为营长？因为李双手都会开枪，百发百中，他破坏治安的祸害，不亚于台湾浪人。臧的收买他，是要使他改邪归正，并想以毒攻毒用他来对付台湾浪人，因李与台湾浪人结有深

仇。过去有个台湾浪人，名叫周友，住溪岸街，无恶不作。但李清波有个爪牙叫坎马根，亦住溪岸街，时与周友因利权发生冲突，每次冲突时，李清波都出面。周友因怕李在溪岸街也就不敢为所欲为了。有一次李因事故逃避青浦，周友认为眼中刺已拔去，就在溪岸街大开赌场，烟馆，妓寮。为了长久利益，竟设计将坎马根害死，埋尸于水鸡腿山脚，因挖土不深，尸被狗拖出，坎马根家属认尸，身有数伤，乃将情哭诉李清波。李大愤，即潜回厦门，率其爪牙蔡必，臭头扬、散魂邦、坎玛老等人，到周友赌场，将周友杀死，把尸身投于斗涵水沟内，因沟通于海，以便海水涨时把尸流出。事被台湾浪人方面知道，遂与李结下深仇。李任职后，台、探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双方各有死伤。

海军统治下的厦门

公元一九二四年四月十六日，海军总司令杨树庄派海军进攻厦门，臧致平败走，臧的败兵枪枝，都卖给台湾浪人。林滚收买最多，使台湾浪人猛虎添翼。海军统治厦门后，以杨树庄任漳厦海军警备司令，林国赓任参谋长，实际上是林代替杨树庄统治厦门。当时厦门的社会秩序混乱，台湾浪人以陈粪扫为首大肆抢劫掳掠。林国赓为维持治安，委林明为侦缉队长，城内流氓矮仔南为副队长，仍以臧致平时对付台湾浪人的一班侦探为队员，归海军陆战队团长马坤贞指挥。马对付台湾浪人采取镇压的办法，下令遇有当街抢劫，便衣带枪者格杀勿论。马在抓到台湾浪人后，即立刻审问，如供认台湾人即加刑，直至浪人承认同安人或晋江人后，始判处斩首示众。为什么马要这样做？因为中国政府抓到台湾浪人

后，日本领事即以不平等条约派人要求“引渡”，“引渡”回去后即行释放，所以马审问时要台湾浪人自己承认不是台湾人后始行处决。当日领派人要“引渡”时马即以同安人的口供给他看，谓我国自己处死不法之徒，与贵国无关。可是台湾浪人的家属认尸拍照，由日本领事再向上级政府提出严重交涉。马坤贞此后即采取灭尸办法，抓到不法台湾浪人后，即令用布袋囊身，坠以石头，用船载至半海填于海中。抓到陈粪扫急先峰名“肚才”的，因他不是台湾人，立即下令斩首，将首级悬在寮仔后示众。旋又捕获厦门人名叫“偷拉鸡福”的，他为台湾浪人开赌场，也被押至玉屏书院门口（玉屏书院后来改为十三中学）斩首示众。因马的严厉镇压，厦门治安始转平静。

但是过了不久，台湾浪人陈晓全又到侦探李有铭所营的妓馆滋事，李有铭及一名矮仔河的均被陈用匕首刺死。马坤贞闻讯大怒，下令侦探队全体出动，包围麦仔埋陈粪扫的“聚义堂”。陈居高临下开枪射击，侦探冲不进去，即用煤油放火焚烧。陈等越屋潜逃，侦探在其跳屋时开枪射击，浪人被击中四人，坠屋而死，又打死一个泉州著名土匪卢剪花，侦探也被击毙一人。事后日本领事即调日舰来厦，派陆战队登陆，提出严重交涉。林国庚怕事扩大，乃派留日学生林振成为代表，到日领署与日领事谈判。日领答应遣送陈粪扫等回台湾，而要求林国庚处死李清波和马坤贞二人。林为处死李清波，仍委李为营长，骗李到司令部议事，当李到司令部时，即被埋伏刽子手击毙。过了不久马坤贞也以酒后中风暴死。消息传出后，厦门人均认为马的冤死表不平，当马的棺材要运回福州时，所经街道，都有市民排香案为马祭奠，认为马

的死是为镇压台湾浪人而死。李马的部属，甚至愤而要为李马报仇，遂自动组织草仔按和城内派角头，以继续对付台湾浪人，厦门各角头流氓派的产生自此开始。后来“有山头就有鸱鸢”。各角头继续效尤，各划疆界，自立为角头流氓大哥者比比皆是。这些大哥都是过去当过侦探队长、组长、侦探的，如宋安在、许宗海、（外号水鸡围），许振润（外号老虎润）。当时台湾浪人十八大哥，因各角头流氓要与他们为敌，也都招兵买马，拳养一批爪牙。这些人不是当地无业游民，就是内地逃厦亡命之徒。每个大哥的爪牙有的二三十人，有的五六十人，其中以林滚、谢阿发的爪牙为最多。林滚以福星旅馆为地盘，他还聘了一个福州人林鹿皋的作为“军师”。鹿皋为林献策，叫他勾官结吏，化敌为友。林滚用他计策，即勾结警察局分局长王宗世、谢绍曾、漳厦警备司令部侦探队长胡震、鼓浪屿工部局侦探队长郑西海、以及大王流氓头子宋安在，关隘内流氓头子许振润等到金鸡亭饮血酒，结拜为兄弟。金鸡亭僧人瑞枝，因接待他们，也被拉入照相。当时林国庚为了治安无事，也让反动官吏与台湾浪人勾结。后有一个警察局长林鸿飞，也与林滚结拜为兄弟，林滚母亲生日，林鸿飞竟为林滚接待客人，真不知世间有羞耻事。当时草仔按派及城内派，因为马坤贞及李清波的关系，不与林滚等往来，但看到王宗世等与林滚结拜兄弟，只要河水不犯井水，各守疆界，也不愿多事生非。

厦门各角头流氓界线

现将抗战前和抗战后，厦门各角头流氓界线调查列下：
厦门抗战前的最早角头流氓有五个大角头：

一、草仔按派。最早的流氓头子是李清波，李死后，头子是陈闯凯。他们活动于虎头山脚、武当分镇、水流崎、金新河、灵应殿、太古码头、宏汉路、同文顶、白厝墓、打铁头刀、小走马路，晨光路、水仙宫一带。

二、城内派（当时厦门古城未折，有城内城外之称）。最早的流氓头子是陈清茂，先住于草仔按，后迁城内墙仔顶居住。他们活动于古城东路、古城西路、墙顶巷、靖山头、石路街、民国路、西庵宫、瓮王、中华路、桥亭、盐溪街、虞朝巷、观音亭、公园南路、妙香路一带。

三、厦港派。最早的流氓头子是柯金钗，（即柯仔钗）。他们活动于沙坡尾、大学路、下澳仔、熟肉巷、水牛埕、民生路、碧山路、配料馆、讲古脚、福海宫、关刀河、打石字、水返上帝一带。

四、大王派。最早的流氓头子是宋安在。他们的活动范围是厦禾路、船坞、大王宫、九条巷、竹树脚、洪本部、磁安路、兴安街、小学路、浮屿角、思明北路一带。

五、关隘内派。最早的流氓头子是许振润（外号老虎润）。他们活动于关隘内，凤仪宫、朝天宫、养真宫、福茂宫、内武庙、棺材巷、后海墘、后营路、箭道、前营路、火烧街、大同路一带。

以上称五大派，还有其他小派。

六、二王派。最早的流氓头子是许宗海。他们活动于二王宫、土地公祖、土堆、麦仔埕、南猪行、开元路、大井脚、赖厝埕，（即现在大元路）一带。

七、美仁宫派。最早的流氓头子是芋头。他们活动于美

仁宫、前保、后保、菜妈街一带。

八、溪岸派。最早流氓头子是坎马根、小如。他们活动于溪岸街、第二市场、将军祠、公园北路、厦禾路一带。

九、鼓浪屿派。最早的流氓头子是洪文忠，人称鼓浪屿皇帝。他先组织廿四猛，活动于全鼓浪屿。

抗战胜利后新产生的有四派，兹将四派活动范围列下：

一、和风宫派。流氓头子是吴在善，后为邓承业、王兆畿。他们活动于和风宫、布袋街、棋杆巷、中山路、镇邦路、升平路、大中路、海后路、人和路一带。

二、山仔顶派。流氓头子是陈来成，（即坎来成）他们活动于山仔顶（即现在思明西路），天一楼、廿四崎、棉袜巷、梧桐埕、大郊墘、十六桐、大中普巷、局口街、南桥巷、大埕头，大中路一带。

三、第六市场派。流氓头子是洪天升。他们活动于第六菜市、打铁头刀、三十六崎，三条巷一带。

四、寮仔后派。流氓头子是曾文炉（外号贼炉）。他们活动于同文路、晨光路、水仙宫一带。

这些角头流氓头子，如陈闯凯、陈清茂、宋安在、许振润、许宗海等过去都是当过侦探队长、组长或侦探。他们的组织动机自称是为对付台湾浪人的横行，可是这些角头流氓组织后，因没有经费，竟效法台湾浪人的办法，干了开妓寮、设赌场、放高利贷等罪恶行径。当时厦门人痛骂角头流氓与台湾浪人是半斤与八两。有的角头发展到与台湾十八大哥猫鼠同眠，如宋安在、许振润等竟和林滚等结拜作兄弟。

各角头流氓罪行

一、城内派的最早流氓头子陈清茂是当时厦门商会长陈瑞清的堂弟，也是海关帮办陈允彩的堂弟，所以他在城内才能坐到第一把椅子。第二头子郭云峰，（别号矮仔南）他曾当过海军警备司令部侦缉队付队长。第三头子谢日本。手下骁将有乌蜃，化成，铁人，培元，陈福仁等二三十人，武器有左轮、曲七、驳壳枪等。陈在桥亭开一酒店，店号“四宜春”，为该派招待宾客及聚会之所。在其范围内的赌场、烟馆、妓寮、都要交纳“看头钱”，中华戏院也要雇他们保镖；还放高利贷，无恶不作。抗战胜利后依靠军统势力，在竞选参议员和立法委员时为军统效劳。解放后铁人、陈福仁被政府镇压，矮仔南早死、陈清茂、谢日本逃往香港。陈因原性不改，在香港作威作福，被当地汕头帮打死。

二、草仔按的骁将有陈皮、鸡母、天原、补鼎等二三十人。武器有驳壳、曲九、左轮枪等。抗战胜利后，头子为龚金水，第二头子为坎振河、苏草包。背景是国民党厦门市党部书记长黄谦若。当时思明区，厦港区警卫队员都是草仔按派流氓充任。对于该派范围内的妓寮、赌场、都要收“看头钱”，也放高利贷，在竞选参议员和立法委员时都为中统拉票，解放后龚等逃往台湾。

三、厦港派的骁将有闯柴、目仁等二三十人，外号叫“三号仔”。他们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武器有左轮、曲七枪等。渔船捕鱼回来，如无孝敬，“三号仔”即于三更半夜将渔船锚索砍断，使其任意飘流。渔民未出嫁女子，头上都缠有红纱髻，“三号仔”手持剪刀将红纱剪去，使渔女痛哭流涕以取乐。不但渔民受其荼毒，厦港人民也莫不受其害。对妓寮、赌场要收“看头钱”，还放高利贷。在厦

市抵制日货时，他们竟敢保镗日本货在厦港起卸，罪恶罄竹难书。当时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第四子林可聊，人称四舍，为厦大英文教师、住在厦门港，目睹“三号仔”横行霸道，乃请流氓洪庆义、骆火营饮酒，鼓励二人持枪去福海宫口与流氓头子柯仔钊比武，有事他负责。洪骆二人到福海宫口时，正遇柯在该处饮酒，洪等即邀柯比武，当时柯因财多身弱，不敢而逃。柯知道洪等是林可聊指使，乃约束“三号仔”不再横行。在林鸿飞任公安局长时，柯包渔税，叶文助，（名矮仔助，也是厦港流氓）叶曾与柯结拜兄弟，因争夺权利，叶唆使渔民抗税，柯大愤，暗中叫人打死矮仔助，凶手破获后供是柯仔钊主使，柯即被林鸿飞捕获依法枪决。而林可聊因为渔民做了一件好事，林病死出殡，厦港渔民都出动为林送殡。

四、大王派手下流氓有北仔都、乌吉宁全二三十人，武器有左轮，曲七、驳壳枪等。在其范围内的妓寮、赌场都收看头钱，也放高利贷，横行霸道。抗战前因与台湾十八大哥林滚在金鸡亭结拜兄弟并照相，被一五七师驻厦时搜获相片，即以汉奸罪名被捕枪毙，同时金鸡亭寺僧瑞枝也被枪决。抗战胜利后，草包乐为流氓头子继续活动，依靠军统，在竞选参议员和立法委员时为军统拉票最力。

五、关隘内派的流氓头子许振润任过侦缉队长，因与宋安在与台湾十八大哥林滚等结拜兄弟。抗战前被蒋介石行营别动队，在厦拘捕，押至闽西龙岩即被枪决。闻别动队当时来厦是要拘捕路政处长周醒南，周以大量金钱托人贡献于该队，得到无事。许被人密报有汉奸嫌疑，遂即被捕，因其家属视钱如命，所以被枪决。许死后关隘内派流氓头子为永吉、柯虾、手下有施乞、乌仁、树根等三四十人，武器有曲七、左轮、曲九

等。抗战胜利后，依靠军统，开赌场、妓寮、放高利贷，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兹将其罪行调查如下：

甲、有一泉州人郑永州在关隘内开设理发店，流氓理发都不给钱，还时常找郑麻烦，直到郑的理发店倒闭。

乙、天德制粉公司，设在郭苞店屋营业，该店后是流氓头子黄永吉住宅，黄认为勒索机会已到，就对郭苞说：咱系近邻，我事先向你善意声明、你厂发动机，振动我的住宅，致使屋漏很厉害和危险，你如不为我修理，就不能怪我对你不客气。郭苞急向各股东言明，流氓是不好惹的，乃雇泥水工把该屋翻盖修理完整，才平安无事。

丙、关隘内米店永年，常被流氓敲诈，有一次不賒米给流氓触流氓之怒，即糊一死人“过山轿”，排在米店门口，路人围观都说流氓恶作剧。越日又糊纸人头写“老瑞年”三字，挂在第七市场电灯柱上示众。

丁、关隘内糖油什货店协德号，每年元宵关隘内流氓就抬虎爷到该店，搬去木炭十多篓，以作跳火之用。店东略有意见，流氓还说是照顾你小店，否则不止十多篓。平时流氓购米要挂账，店东婉言，资本微小恕不挂欠，流氓即抽出手枪放在柜上，声言以此作抵押。店东还要好言请他收回，把米送到其家。

戊、该派还有一个流氓头目名地雷，是全厦扒手头子。扒手扒到财物都到其家分赃。地雷对侦探队警察局都有孝敬。有一次一个有名望的华侨回国，财物及出国护照均被扒手扒去，市长据报大怒，命警察局限期破案。警察局侦缉队责令地雷，当日将财物归还。旧社会的侦探与扒手，是猫鼠同眠，坐地分赃。解放后永吉、柯虾、地雷三人均被枪决，施

乞、乌仁解往劳改。

六、二王派流氓头子为许宗海，手下有骆灶、梅仔等十多人，武器有曲七、左轮枪等。许曾任过侦缉队长，对其范围内妓寮、赌场也收“看头钱”，但对邻人有纠纷，都能为之排难解纷。抗战胜利后曾参加海员特别党部活动，被选为特别党部厦门区党部候补委员，依靠中统，临解放时逃往香港。

七、山仔顶派流氓头子陈来成。这派是抗战胜利后产生的。陈来成人叫砍来成，是水泥匠出身。他的手下有坎长寿、草包等二十多人；武器有曲七、左轮枪等。该派产生原因，是益同人公会承包救济总署难民伙食，叫陈去负责，伙食办结束后，这批人马没有职业，乃扶陈为山仔顶流氓头子。陈依靠军统李素夫等的支持，开设赌场，对其界内妓寮也收“看头钱”，在竞选参议员和立法委员时为军统大出力。临解放时参加毛森的狗腿训练。毛森为警备司令时，他任反共救国军小头目，临解放时逃往香港。

八、和风宫派流氓头子为吴在善，是抗战胜利后产生的。最初是该派流氓仙公豹、陈吉定两人在外轮上贩卖点心，认识吴在善、陈江来、吴清火所组织的三公司。这个公司在和风宫口中山路开设星光行，是专向轮上船员收买私货，在星光行出卖。他们在轮上买货时有一次被海关检查员查获，他们公然告诉检查员，“不要认真都有好处，如果太过不去，你们会有生命危险的”。海关检查员知道他们是陈吴两大姓的人，得罪他们有害无利，便予放行。三公司有利也不独得，经常送钱给检查员，因此结为朋友，发展至大宗走私，还为别人包卸私货。吴在善三人经常在和风宫碰头，并

雇用仙公豹、陈吉定、陈其八、陈其九兄弟四人，在外轮到达时，下轮起卸私货。陈吉定等收入既充裕，就时常到舞场跳舞，因争舞女吃醋打人，就自称和凤宫派。又有一次陈吉定在第七市场为女人吃醋事，与城内派流氓发生打架，也自报为和凤宫派，在报纸刊登后和凤宫派就大出风头。但当时和凤宫并无组织，只靠吴在善帮助，不是城内派对手，陈吉定等乃扶警察局侦缉队组长邓承业为头子。邓以枪枝帮助陈吉定对抗城内派，后经军统人士出面调解，陈清茂也不愿与吴在善、邓承业结怨，双方遂和平解决。适军统特务头子王兆畿迁居和凤宫，吴在善等乃扶王为头子，王也要利用吴在善等，遂狼狈相依。后发展手下二十多人，武器有曲九、驳壳枪等。但此派因在海上走私收入多，没有放高利贷及“看头”妓寮、赌场等行为。在竞选参议员和立法委员时，为军统大卖力。解放后吴在善等都逃往香港。听说陈吉定、陈其九因家眷住厦，特由香港返厦，向公安局自首其过去的罪恶。政府令其坦白交代，重新做人。

九、美仁宫派流氓头子名芋头，手下有十余人，武器有左轮枪等。他们对妓寮、赌场收看头钱。抗战胜利后依靠军统，竞选参议员和立法委员时为军统拉票，解放后逃走。

十、溪岸派流氓头子名小如，手下也有十多人，武器有曲七枪等。他们横行霸道，抗战胜利后靠拢军统，在竞选参议员和立法委员时为军统拉票，对妓寮、赌场收“看头钱”，也放高利贷，解放前逃走。

十一、第六市场派流氓头子洪天升，是抗战胜利后新产生的流氓派，手下有十多人，武器有左轮枪等，横行霸道，专门占人房屋、强奸有夫之妇，对妓寮、赌场收“看头钱”，

放高利贷。他加入海员特别党部，为区分部书记，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枪决。

十二、寮仔后派流氓头子曾文炉。（外号贼炉）此派是抗战胜利后产生的，手下有孩儿狗等二十多人。贼炉是“海鸡母”（专门在轮上偷盗货物名叫“海鸡母”）。出身孩儿狗依靠贼炉无恶不作，勒收妓寮、赌场“看头钱”，放高利贷，依靠军统，在竞选参议员和立法委员时为军统效劳。解放后逃走。

十三、军统特务张静山，抗战胜利后住在浮屿角，利用手下十余人，横行于厦禾路及赖厝埕。（即现在大元路）一带。他终日在鸦片烟盘边吞云吐雾，令手下捣乱舞场、菜馆，还要舞场菜馆老板送礼赔不是，比台湾浪人和角头流氓更坏。警察局对他破坏治安不敢过问。

十四、鼓浪屿派的流氓头子洪文忠，组织廿四猛，横行于鼓浪屿，人称他为鼓浪屿皇帝。他是台湾人，依靠日本领事势力，工部局亦无奈他何。对鼓浪屿妓寮，赌场收“看头钱”，放高利贷，在厦门沦陷日寇时，作日领忠实走狗，组织一佰猛“虎会”，专门与我抗日志士作对头。兆和惨案就是他向日寇立功，使我抗日志士陈清保、林清川等被日寇惨刑而死。日本投降前，他被日寇扣押，后解往台湾。

抗战前厦门各角头流氓头子、效法台湾浪人，各有利权收入，因看到林滚勾官结吏，拉拢部分角头大哥结拜为兄弟，也认为与台湾浪人继续为敌，不是办法，只要井水不犯河水，各守疆界就好，因此暂时相安无事。

当时日本领事也认为利用台湾浪人，拢乱治安，以便占领厦门为日本的南进基地，与各国领事有矛盾，要实现是不

可能。乃改变政策，指使文治派台湾浪人王昌盛等拉拢内地土匪，策划组织“闽省自治”，如果实现，厦门也不能例外。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把十九路军调闽，一九三三年冬，十九路军在闽成立人民政府，蒋为对付十九路军，派杜起云为军事特派员，策动闽西南土匪与十九路军对抗。杜一到厦门即与王昌盛等勾结，阴谋成立“华南国”、事败，杜被蒋枪决。日领又不甘心失败，又策划浪人林火星组织福建省自治，又告失败。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日领即令王昌盛、郑石组织邦人义勇团，要配合日军入侵福建。当年八月廿五日至廿八日台人撤退，王等四十人潜伏鼓浪屿，以便日军进攻时作内应，事机不密，陈龙江、柯阔嘴、柯朝根被我驻军捕获枪决，王昌盛逃往香港。

公元一九三八年日军在禾山登陆，台湾浪人林木土为日军作响导，进入市区，各角头流氓都逃往内地，日寇投降后又纷纷返厦，为非作歹。直至一九四九年厦门解放，各角头流氓始被全部逮捕，有的枪决，有的劳改。厦门社会才真正庆得新生。

“中兴轮”惨案纪实

·许国仁·

解放前，川走厦门、安海线的内河汽船——“中兴轮”，在大嶝海面遭受匪劫全船沉没，无辜旅客死亡一百多人。

“中兴轮”惨案轰动全省，成为一九三〇年以后，本市又一次严重的海难事故。这一大惨剧，暴露了当时匪患频仍，治安不靖，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当年曾亲自看到厦港海沙滩上，陈尸累累，惨不忍睹。至今谈起，犹觉心有余悸！

一九四八年二月廿八日，是二月份最后的第二天；当人们刚度过热闹元宵佳节的第四天，正是农历正月十九日。当天傍晚，市上忽传来“中兴轮”不幸失事，这不祥消息不胫而走，霎时传到了各角落，街头巷尾的人们议论着，关注着。许多人群纷纷涌到第五码头，三五成堆，交头接耳，打听究竟。他们只知道“中兴轮”没有返航，真相无从获悉。

“中兴轮”系本市锦昌船务行所属的一艘内海汽船，该船建造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间，航行仅三年。由于船新，而且船上装有三台60匹马力机器，速度快，深受搭客欢迎。按平日惯例，下午二时从安海港开航，五时左右即可抵达第五码头。这一天到达的时间已超过，船尚未到岸。不久，另一艘从达安海来厦的“顺庆轮”靠岸了，船员谈起曾看到“中

兴轮”在大嶝海面沉没，是否触礁不得而知。船务行负责人正在焦急不安，六时后突接市海军巡防处康肇祥处长打来电话，告知“中兴轮”失事，要船务行速派员前往现场观察处理。经联系后，海军派巡逻艇与官员会同船务行负责人王哲亮等从水仙宫码头前往大嶝。入夜，海上风浪颠簸，船行缓慢，抵达目的地后，天色已昏暗，四周寂静。这时，海军的另一艘炮艇，已将“中兴”沉轮拖起，一些被水淹死的旅客尸体，亦被安放在船舱内，部份海上浮尸，经打捞收拾，男女不分，横七竖八，躺卧舱底。黑暗中，凭艇上探照灯窥见，情景凄凉，真是触目惊心！

兵匪互击 酿成沉轮惨剧

据笔者当时亲往大嶝深入各单位访问生还的船员和旅客，他们谈起“中兴轮”沉没的经过：

当日下午二时，“中兴轮”自安海港满载二百多名旅客驶厦，其中有十多个晋江籍侨眷，手戴戒指，颈佩项链，满身珠光宝气。引起一群劫匪觊觎，他们从石狮方面尾随跟踪，因沿途行旅众多，无法下手，一直到了安海，才知她们结伴来厦游玩。这些侨眷们步下正欲开航的“顺庆轮”，匪徒们随之下船。詎料“顺庆轮”乘客拥挤，难以找到座位。时在后面的“中兴轮”也响起马达准备开航，那些侨眷遂转搭“中兴”。匪徒们不愿放弃打劫机会，紧跟不舍。恰好碰上国民党保安一团第三大队汪大队长偕同指导员杨美景，便衣队长刘寿鹏和第三战区谍报组主任刘钟金，随员蔡庆行；还有便衣队员二人，勤务兵五人，计十二名，大部份穿便服，他们准备来厦转长泰县公干，刚好赶上“中兴”。汪大队长和杨指导员坐在舱面，其余下了舱底。劫匪们看到国民党军

队，有点惊慌，但野心不死，佯装镇静，准备孤注一掷。他们混在旅客当中暗自计议：“只要干掉穿军装的，便可为所欲为，万事大吉”。匪首布置作好洗劫准备。这时船上只听到旅客谈笑声喧，“中兴轮”正随着滚滚绿波前进，航行一个多小时了，船抵大嶝岛夹界中间，靠近洋塘社对面海上，这里距海岸近。匪首认为时机成熟，遂吹起口哨为号，继而鸣枪对准坐在舱面穿着军装的汪大队长。这突如其来的袭击，该大队长猝不及防，随声中弹，子弹从左眼穿过，同时擦伤站在船首操纵轮机的副舵伍歪的左腕，顿时血流如注。匪徒们各执手枪，威胁乘客，大肆洗劫。正坐在舱底的国民党军队睹状，拔枪向劫匪迎击，一时枪声四作，兵匪互击，全船混乱不堪，旅客惊慌奔走，船身左右摇摆，倾斜达四、五次，船失重心，前后仅十多分钟，船身遂告下沉。

在混战中，便衣队长刘寿鹏身中五弹，谍报组主任刘钟金与三名勤务兵皆饮弹身亡，汪大队长负伤挣扎洒出海面，因被击中要害在海上气绝，蔡庆行和一二便衣队员亦被水淹死，国民党官兵死了八人，庆幸生还的仅有杨美景与另一名便衣队员刘朝禄以及二名勤务兵。

“中兴轮”沉没后，大部旅客惨遭灭顶之灾，部分被水冲出和识水性的搭客，极力挣扎浮游海上，被过往的帆船援救，送上大嶝岛。淹死的旅客，尸体在海面上漂流，任凭风吹雨打，厥状至惨。因系晚间，无法进行打捞。至廿九日黎明，市当局雇“飞凤轮”派员会同海军、水警、检查所、轮船公会等单位人员，专程驰往大嶝附近海面收尸。海军巡防处同时指令在石井、莲河一带游弋的炮艇开往大嶝加强巡防，并将捞起死尸，置放“中兴轮”舱内。廿九日晚上由“南安

号”炮艇将该轮拖厦，原停在水警码头附近，后考虑在市内影响不好，翌晨即拖往厦港沙坡尾。“中兴轮”被拖来厦门时，船舱底和甲板上，装满遇难者尸体八十多具。因是夜风势猛烈，受创残轮，经不起浪潮冲击，船身沉没过半，致放置在船顶甲板上的二十多具尸体，复被大浪卷走，虽经极力捞觅，仍有十余具死尸漂游无踪。

无辜罹难旅客死不瞑目

三月一日早晨，海军会同水警驾驶巡逻艇在沿途海面上，继续拾捞浮尸，不少尸体，已在海上漂泊三十多小时，肌肉浮肿，丧失本来面目。当天上午十一时，市水警局局长刘长泗亲自指挥员警在沙坡尾搭起临时篷盖和维持秩序，准备起尸；市慈善机关——益同人公会理事长杨聚才率领会员，担任登记死者编号手续；市地方法院检察处亦派检验员张波澜到现场进行验尸。

三月二日下午三时，在沙坡尾海滩上公开供尸亲认尸。

“中兴轮”惨案不但震动全市，闽南各县的一些死者亲属，闻噩耗，亦从远途赶厦领尸。这时，沿沙坡尾一带，早已堆满人山人海，认尸亲人与许多聚观人群，团团围住，水洩不通。尸体一具具从船里抬上沙滩，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排列成一座人体死尸阵。有的仅穿上内衣、短裤，全身被海水泡肿，面容难辨；有的一家多人同时惨死；亦有一对新婚夫妇，来厦欢度蜜月，不幸双双罹难；其中有三十八具死尸，遇难后漂到大嶼岛，被当地一些坏分子乘危打劫，剥去手表、衣物，再将死尸推到海上，任其漂流，可谓天良丧尽。当家属认到亲人尸体时，呼天抢地，嚎啕大哭。厦港沙坡尾上空，笼罩着一片愁云惨雾。不少群众眼看这些无辜惨死旅

客，眼睛未闭，死不瞑目；还看到遇难后再受抢劫的惨况，莫不心酸垂泪，引起无限的同情和愤慨！

此次海难事件，遇难旅客一百卅八人。另外在编号核对和检查身上衣物时，发现陈伦等三具死尸系劫匪（皆同安人）因身上都藏有子弹。当局将这三匪尸体放置在沙坡上露天处。愤怒的群众，纷纷取起大石块，压在匪尸上，足见民心痛恨之极。死尸收殓后，大部葬在胡里山广东公墓旁边，并由善委会竖立石碑，以誌哀思。（碑现已毁）

成立善委会处理善后

惨案发生后，本市成立“中兴轮”惨案善后委员会。推举市党部、市议会、要塞司令部、海军巡防处、地检处、海员特别党部、冬防指挥部、水警分局、市商会、华侨协会、总工会、侨务局、航政处、轮船公会、社救协会、厦港区公所、市渔会、惠安同乡会、晋江同乡会、南安同乡会、永春同乡会、莆仙同乡会、益同人公会、海员工会等廿四单位的负责人为委员；并推选商会理事长严焰为主委，市党部、市议会、海员党部、社救协会等负责人为常委。下设：总务、募捐、调查登记、捞运收埋、救济等五组开始工作。善后经费由市商会严焰向银行商借一亿元，市益同人公会和惠安同乡会，各捐出数万元，晋江同乡会捐献一亿元。“飞凤轮”经理梁子玉对“中兴轮”惨案深表同情，亲自到善委会，将当日该轮航行客票收入，全部捐出作救济金。一百多具尸体，除亲属认领处理外，无主死尸皆由善委会负责收殓。因尸体众多，需要棺木，除部分到漳州搜购运厦应用外，市寿板公会连夜赶制，益同人公会也购赠一部分；惠安同乡会为照顾乡亲，对无力收殓者，每人发给安葬费二百万元，缺乏墓地

者，由该会的公塚给予埋葬。

事后，市轮船公会召集会员，举行紧急会议，会上决议五点：一、提请市当局迅缉劫匪就地正法。二、请金门县政府严办乘危打劫的桑沪、洋塘等社的不法乡民，並追回被劫财物。三、吁请水上治安当局对内河航线搭客，严密检查並随时加派船艇巡护，以策安全。四、推派蒋文萱、刘清波、黄谷音、阮江汉等代表轮船公会慰问锦昌船务行及遇难生还旅客。五、迅将“中兴轮”被劫情况转报有关当局核办。

惨案发生后当局敷衍塞责

“中兴轮”惨案，很快传到省垣，福建省当局特派保安副司令严泽元负责调查处理。严奉命来厦，先后召开多次会议，最后拟定今后改善意见六点：一、川走内河汽轮，应由航政处重新丈量，限制搭客人数及载重量。（事实上各轮收客皆有定员，“中兴轮”原定员为168人，这次载客超过270人。每一汽轮超载，已成为司空见惯）。二、海关应严格检查，发现超量应及时报航政机关给予处分。三、船上要有自卫能力。四、船上应设置救生设备。五、严密码头检查。六、水上治安当局应增加海上巡逻。严泽元坐镇旬日，未能解决实际问题，仅官样文章，敷衍搪塞了事，回省复命去了。

惨案发生后，除处理善后外，並进行追究各方责任事故。市当局认为“顺庆”、“凯歌”二轮皆经过发生事故地点，看到“中兴轮”沉没，避而不救，增加损失，违反海商法第十二条规定；同时，两轮到厦后都未向有关部门报告，拖延捞救工作，应追究责任，由地方法院侦办。

锦昌船务行的“中兴轮”，确为匪劫致沉，但船没有按

照定员收客而超载，负有一定责任，经地检处检察官郑善祥提起公诉。地方法院传讯生还的船长伍赞，以违反海商法条款，判处拘役六个月。（由锦昌船务行按规定，缴纳科罚金，金圆券伍拾元释放）。其船上死亡水手吴在团一名，船务行负责处理对家属进行抚恤。航政处吊销锦昌船务行执照，给予停业处分。（后变更登记，改为锦祥船务行，一直经营至解放后）。

劫匪全部落网就地正法

抢劫“中兴轮”海匪，经金门、同安等县先后查缉，除陈伦三匪已死外，尚抓获九名计：

纪德水（29岁）同安同禾乡人 纪浮（28岁）同安后厝乡人 陈文珍（34岁）同安同禾乡人 陈奎（30岁）同安同禾乡人 陈志明（33岁）同安同禾乡人 李英（27岁）同安马巷镇人 纪马来（23岁）同安后厝乡人 陈水俊（22岁）同安同禾乡人 陈水晏（30岁）同安同禾乡人

这些劫匪都熟悉水性，当“中兴轮”沉没后，游水逃逸，爬上了大嶂岛。当时，洋塘社一张姓农民瞥见一个廿多岁青年，满身湿漉漉，以为是生还旅客，从家里取出衣服让其更换。该青年走进厕所更衣，插在腰间手枪，不慎坠入粪坑。知为劫匪，被周围几个农民抓获。另一劫匪上岸后，在草地上丢掉手枪，拔腿就跑，亦被发觉追捕。其余劫匪虽未被觉察，过后分散逃匿在后厝、丙洲等地。匪首陈水晏躲藏新圩多时，终被当地刑警拘捕。前后抓到九名解送厦门，经地方法院在文化馆（现歌舞团排练场）开庭公审，全部判处死刑，在凤屿监狱前执行枪决。一直到解放后，尚查到一个漏网的劫匪陈福，长期混在搬运工人队伍中，终被我人民政府

揪出，处以极刑。至此，抢劫“中兴轮”海匪，全部落网，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恶贯满盈，死有余辜，群众闻讯，拍手称快！

当权者乘机大发“死人财”

“中兴轮”惨案善后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即在本市进行募款，海外东南亚各地侨团以及个人获悉发生沉轮惨案后，纷纷汇款来厦救济，全部款项超过四亿元，除支付打捞、收埋、抚恤等费外，尚余巨款。该会负责人对经管帐目讳莫如深，遭到各方非议，社会上啧有烦言。当时正值国民党经济趋向崩溃，金融混乱，物价一日数跳，伪币不断贬值。善委会当权者，竟将余款换购美钞，声称，仅存一千四百八十八元，拟移交社会救济协会，作为其它救济基金，即遭到惠安同乡会及一些社团反对。后来拨给社救会美金六百元，向市调配会购买食米三百市担，作为救济贫苦用粮。未几，善委会以任务完成，宣布解散。

当时本市舆论界认为善委会那些当权者，对募捐数额及支出费用含糊不清，没有详细公布，有上下其手，贪污舞弊之嫌，要求公开宣布一切账目。市各报刊猛烈抨击藉“中兴轮”惨案，大发“死人财”。但在当时的社会，官官相护，彼此勾结，上下征利，只好不了了之。

“中兴”沉轮是继一九三〇年四月九日，川走五通和澳头的“便利轮”惨案后，又一次海难大惨剧。（两轮合计死亡旅客三百廿七人）为什么先后相隔十九年，沉轮事件会一再发生呢？

归根结底，是由于当时的政治腐败，社会治安混乱，盗匪横行，一些不务正业者，铤而走险，抢案时有所闻。而作

为管理海上交通运输的航政机关，置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平时接受请客送礼，任凭轮船不按定员收客，致大批旅客惨遭不测。更令人发指的，是每次事件中，那些达官显贵们，藉着救济名目，办理救济，肥了自己。实际上成为他们捞取油水，大发横财的好机会。至于惨遭死亡的无辜旅客，只能抱恨于黑暗的旧社会，而含冤九泉。

第七辑更正

- 目录页：《前厦门大学萨本栋》改为《前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
《中华第一圣堂——厦门新街礼拜堂》作者“剑波”改为“林仪”
《菲律宾佛教开山者性愿法师》作者“觉醒”改为“觉星”
鼓浪屿为何名鼓浪》作者“丝己”改为“杨纪波”
《厦门大事记》作者“鸿剑”改为“林松、纪波”
第94页：《中华第一圣堂》作者“剑波”改为“林仪”
第126页：《厦门大事记》作者“刘剑学、杨纪波整理”改为“林松、纪波”

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革”前曾家庆同志具体负责政协文史工作时，为了配合有关部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请我和纹藻同志编写《厦门人民反帝爱国运动史话》。我们先后写了十几篇，其中纹藻同志执笔写的有《厦门日籍台湾浪人记述》（已在第二辑发表）和《打番关》等篇，多数是我执笔的。《史话》初稿完成后，由文史工作组的叶更新同志陆续刻写蜡纸，单篇油印，寄送政协和各民主党派领导同志、厦大历史系以及部分中学历史教研组和文史组同志，征求意见，准备作进一步修改。由于当时我们都是所谓“摘帽右派”，不能署名，所以用“编委会”名义。去年，《厦门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准备选刊《鸦片战争中厦门人民的抗英斗争》、《厦门人民反对虎头山划为日本租界的斗争》，第六辑上又有《“五卅运动”中厦门人民的反帝怒潮》，都是我的油印旧稿。

我被错划已于1979年改正了，过去被剥夺的署名权利理应恢复。为此，我要求今后《文史资料（选辑）》如仍将刊载《史话》油印稿文章，请加上署名。并建议编者在第七辑说明上述情况。

“文革”前我编写的《近代厦门重要史事日誌》（1897—1938年），手稿存政协文史组。1980年间，我曾按登记手续向文史组借出手稿抄存一份，这几年来又作了不少补充。没想到几天前看到第六辑刊载的《厦门大事记（续）》，其中的绝大部分是从我的手稿中原文一字不改照抄的，但却没署我的名字。林崧同志编写过一本分类大事记，我是知道的，并向他借抄过。该《大事记（续）》有些部分是林崧同志的

劳动成果，确是事实。但其余大部分几乎抄自我的手稿。

洪卜仁

1985.1.6.

读者反映：本刊个别作者将别人的文稿改头换面，据为己有；有的甚至将别人文稿上的署名抹去，换上自己的名字。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

感谢读者的爱护和批评。

今后作者来稿，如果采用别人的材料，希在文末注明。

编者